



引用格式:蔡继明. 论我国现阶段基本经济制度的属性[J]. 郑州轻工业学院学报(社会科学版), 2017, 18(2): 1-7.

中图分类号:A8;F0-0 文献标识码:A

DOI:10.3969/j.issn.1009-3729.2017.02.001

文章编号:1009-3729(2017)02-0001-07

论我国现阶段基本经济制度的属性

On the attributes of present basic economic system of China

蔡继明

CAI Ji-ming

清华大学 社会科学学院, 北京 100084

摘要:从传统的计划经济体制到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体制、从单一的公有制到多种所有制并存、从单一的按劳分配到按生产要素贡献分配,所有这一切,既反映了我国经济转型过程中经济体制的变革,也反映了我国基本经济制度的变迁。马克思主义经典作家为未来社会所设想的“三位一体公式”,在中国已经被以公有制为主体的多种所有制经济并存的混合所有制结构、市场经济和按生产要素贡献分配所取代。判断我国现阶段基本经济制度的属性,不能套用100多年前马克思恩格斯对未来社会的设想,而应该按照一般与特殊的辩证法和“最一般的抽象总只是产生在丰富的具体发展的地方”这一认识论,从社会主义在中国的实践抽象出来。既然我国现实的社会主义只能是初级阶段的社会主义,那么今日中国社会主义的本质规定也就只能根据其初级阶段的基本特征抽象而成。所以,在当代中国,坚持和发展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就是真正坚持社会主义。

关键词:

经济体制改革;
基本经济制度;
马克思主义政治
经济学;
中国特色社会主义

收稿日期:2017-01-03

作者简介:蔡继明(1956—),男,河北省唐山市人,清华大学教授,博士生导师,博士,主要研究方向:马克思主义政治经济学、西方经济学。

经过近40年的改革开放,中国已经由一个单一公有制和按劳分配的计划经济国家转变为以公有制为主体多种所有制并存和按生产要素贡献分配的社会主义市场经济国家。那么,界定中国现阶段基本经济制度的属性,是应该照搬马克思主义经典作家大约在150年前对未来社会的设想,还是应该根据当代中国改革开放的实践经验重新认识社会主义的本质规定呢?本文拟对此予以探讨。

一、马克思恩格斯设想的未来社会基本经济特征

马克思恩格斯在分析资本主义发展规律时指出,随着资本积累所导致的资本主义社会基本矛盾的不断激化,资本主义生产方式将被一种更高级的经济形态所取代,这种后资本主义的生产方式有时被称作自由人联合体,有时被称作在协作和生产资料共同占有基础上重建的个人所有制,概括起来也即与资本主义生产方式相对应的社会主义生产方式。马克思恩格斯所设想的未来社会具有以下三个基本经济特征。

1. 生产资料公有制

马克思认为,资本主义社会的基本矛盾,即生产的社会化与生产资料私人占有之间的矛盾,只有通过用公有制代替私有制才能解决。所以,未来社会经济制度的基本特征之一就是由全社会共同占有生产资料,即实行单一的生产资料公有制。

恩格斯早在1847年发表的《共产主义原理》中就指出:“私有制也必须废除,而代之以共同使用全部生产工具和按照共同的协作来分配产品,即所谓财产共有。”^{[1]237}随后,马克思和恩格斯在《共产党宣言》中则更加明确地把共产党人的全部理论概括为一句话:“消灭私有制。”^{[1]286}马克思在《资本论》第1卷中“也设想有一个自由人联合体,他们用公共的生产资料

进行劳动”^{[2]95}。

2. 计划配置资源(计划经济)

一旦生产资料由全社会共同占有,私人劳动与社会劳动之间的矛盾就不复存在,劳动者的个人劳动从一开始就具有直接的社会性,商品经济就会消亡,整个社会的生产就会在全社会范围内有组织有计划地进行。所以,在马克思主义经典作家看来,计划经济作为市场经济的替代物,无疑是社会主义经济制度的又一个基本特征。

马克思认为:“在一个集体的、以共同占有生产资料为基础的社会里,生产者并不交换自己的产品,耗费在产品生产上的劳动,在这里也不表现为这些产品的价值,不表现为它们所具有的某种物的属性,因为这时和资本主义社会相反,个人的劳动不再经过迂回曲折的道路,而是直接地作为总劳动的构成部分存在着。”^{[3]20}

3. 按劳分配

根据马克思生产关系特别是所有制关系决定分配关系的原理,一旦生产资料由全社会共同占有,每个社会成员就只能凭借自己的劳动领取个人消费品。所谓按劳分配,就是在生产资料全社会共同占有的条件下,社会总产品在做了各项必要扣除后,以劳动为唯一尺度在社会全体成员之间进行分配。按劳分配是社会主义经济制度的基本特征之一。

马克思在《资本论》第1卷所设想的未来社会的自由人联合体,就是“假定每个生产者在生活资料中得到的份额是由他的劳动时间决定的”。在这里,劳动时间“是计量生产者个人在共同劳动中所占份额的尺度,因而也是计量生产者个人在共同产品的个人消费部分中所占份额的尺度”。^{[2]96}

在《哥达纲领批判》中,马克思进一步阐述了按劳分配的思想,强调:“每一个生产者,在作了各项扣除之后,从社会方面正好领回他所

给予社会的一切。他所给予社会的,就是他个人的劳动量”,“他以一种形式给予社会的劳动量,又以另一种形式全部领回来”。^{[3]21}

马克思进一步指出,按劳分配所通行的是等量劳动领取等量产品的资产阶级权利,这在刚刚从资本主义社会脱胎而来的共产主义初级阶段是不可避免的。“在共产主义社会高级阶段上,在迫使人们奴隶般地服从分工的情形已经消失,从而脑力劳动和体力劳动的对立也随之消失之后;在劳动已经不仅仅是谋生的手段,而且本身成了生活的第一需要之后;在随着个人的全面发展生产力也增长起来,而集体财富的一切源泉都充分涌流之后;——只有在那个时候,才能完全超出资产阶级法权的狭隘眼界,社会才能在自己的旗帜上写上:各尽所能,按需分配!”^{[3]22-23}

公有制、计划经济和按劳分配三者之间有着内在的必然联系:公有制是计划经济和按劳分配的基础,计划经济是公有制的运行方式,按劳分配是公有制的实现形式。可以说,公有制、计划经济和按劳分配是马克思主义经典作家为未来社会经济形态,即社会主义生产方式所设计的“三位一体公式”。

二、中国的改革开放:从体制改革到制度创新

不容否认,苏联、东欧乃至中国最初的社会主义生产方式无一不是按照上述“三位一体公式”构建起来的。然而,撇开苏联解体、东欧剧变,二者均由社会主义转向资本主义不说,发轫于1980年代前后至今近40年的中国经济体制改革,已经使国家传统的社会主义经济制度发生了根本的变化。

1. 计划经济体制向市场经济体制的转变

在马克思主义经典作家看来,计划经济作为市场经济的替代物,无疑是社会主义经济制

度的一个本质特征,而在许多后来的马克思主义经济学家眼中(当然也包括诸多西方经济学家),“计划经济=社会主义”“市场经济=资本主义”似乎已成为一种固定的思维模式。比如,我国著名经济学家卫兴华^[4]指出,计划经济不只是管理国民经济的方式和手段,它首先是社会主义经济的本质属性和特征,是社会主义经济制度即社会主义生产关系中的重要方面;胡乃武等^[5]指出:“计划经济是社会主义的一个基本特征,它与市场经济是根本对立的。社会主义社会不可能实行市场经济而只能实行计划经济,这是社会主义经济的本质决定的。”1984年10月20日通过的《中共中央关于经济体制改革的决定》中指出:“社会主义社会在生产资料公有制的基础上实行计划经济,可以避免资本主义社会生产的无政府状态和周期性危机,使生产符合不断满足人民日益增长的物质文化生活需要的目的,这是社会主义经济优越于资本主义经济的根本标志之一。”但它同时又指出:社会主义经济是“在公有制基础上的有计划的商品经济”。^[6]

正因为如此,当国内一些经济学家提出市场化改革取向的主张时,立即被认定为走资本主义道路。而中国的经济体制改革,不得不起始于对计划经济体制的修修补补:试图把高度的中央集权的计划经济体制,改革为中央与地方分权的计划经济体制;把单一的指令性计划,改革为指令性与指导性相结合的计划。

然而,单纯的计划经济体制改革,并不足以消除现实生产关系中阻碍社会生产力发展和扭曲资源配置的各个因素。在经济体制改革的进程中,很快引入了计划和市场并行的“双轨制”,这在执政党的文献和经济学家的词汇中,被称作“计划经济为主,市场调节为辅”^[7]。当现实中的“市场轨”与“计划轨”旗鼓相当时,官方文件和理论界又出现了“计划经济与市场调

节相结合”的提法^[8]。而当“市场”在配置资源中的作用逐步超过“计划”时,官方文件和理论界又出现了“有计划的商品经济”和“国家调节市场、市场引导企业”的命题^[9]。

总之,发轫于计划经济体制的改革,在实际的进程中,逐步动摇了计划经济制度本身,以至于在1992年的中共十四大上,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体制终于取代计划经济体制,而成为中国经济改革的目标模式^[10]。中共十八届三中全会则进一步强调要让市场在资源配置中起决定性作用^[11],这意味着计划经济作为社会主义基本经济制度的特征之一已经不复存在。当然,按照邓小平的理解,作为资源配置的方式,计划和市场已都不再具有制度的属性,但无论是把计划经济作为一种资源配置的方式从社会主义基本经济制度的规定性中排除出去,还是把市场经济冠以社会主义从而加入社会主义本质规定之中,都意味着原有的社会主义基本经济制度的本质规定发生了变化。

2. 从单一公有制结构向多元所有制结构的转变

传统的社会主义经济理论认为,公有制作为社会主义经济制度的基础是不能有丝毫动摇的,改革只能触及公有制的具体实现形式,比如,把单一的全民所有制改造成全民所有制和集体所有制两种形式,探讨全民所有制的实现形式是国有制还是其他形式,国有制是采取承包制还是租赁制抑或股份制,农村土地集体所有制是采取承包制还是股份合作制,等等。

在上述传统观念束缚下,人们在很长时间内是讳言所有制改革的:因为这很容易被扣上否定社会主义基本经济制度的大帽子。正是在这种意识形态的背景下,一些有胆识的经济学家提出了产权改革的主张,试图通过区分“产权”和“所有制”概念,绕过“所有制”这个烫手的山芋,达到优化所有制结构的目的。而这种主张理所当

然地受到敏感的保守派的抨击,他们指责这种产权改革论是用“产权”概念偷换“所有制”概念,以产权改革为名,行所有制改革之实;以产权明晰为幌子,以推行私有化为目的。

中共十三大首次把社会主义初级阶段的所有制结构描述为公有制为主体、多种所有制形式并存。但从中共十三大到十五大之前,非公有制经济一直被看作是社会主义异己的东西,仅仅作为社会主义公有制经济的一种补充,被排除在社会主义基本经济制度的规定之外。这种认识直到中共十五大召开才有了本质性的变化。十五大报告把非公有制经济确定为社会主义市场经济的重要组成部分,从而将其纳入了社会主义基本经济制度的规定之中,而不再被视为公有制的对立面^[12]。

2002年召开的中共十六大在思想解放的进程中又取得了重大突破。十六大报告提出了两个毫不动摇:既要毫不动摇地巩固和发展公有制经济,又要毫不动摇地鼓励、支持和引导非公有制经济的发展。报告还提出,既要保护合法的劳动收入,也要保护合法的非劳动收入,并进而强调要完善保护私人财产的法律制度。

中共十六届三中全会在十六大已有成果的基础上,强调要大力发展和积极引导非公有制经济的同时,进一步明确“允许非公有资本进入法律法规未禁入的基础设施、公用事业及其他行业和领域”,并规定“非公有制企业在投融资、税收、土地使用和对外贸易等方面,与其他企业享受同等待遇”。^[13]这表明,十六届三中全会为非公有制经济的发展开辟了更广阔的空间。

不仅如此,十六届三中全会还明确指出,“建立归属清晰、权责明确、保护严格、流转顺畅的现代产权制度”,这不仅“有利于维护公有财产权,巩固公有制经济的主体地位”,而且“有利于保护私有财产权,促进非公有制经济发展”,“是完善基本经济制度的内在要求,是

构建现代企业制度的重要基础”,所以,“要依法保护各类产权,健全产权交易规则和监管制度,推动产权有序流转”。^[13]这种“依法保护各类产权”(既包括公有产权,也包括私人产权)的思想,在2004年的《宪法修正案》中得到充分的体现,从而标志着以公有制为主体、多种所有制经济共同发展的社会主义基本经济制度在中国的宪法中得到最终确认。在2007年通过的《物权法》中,私有财产与公有财产得到了平等的保护。而到了2007年10月召开的中共十七大,则进一步强调要创造条件让更多的群众拥有财产性收入^[14]。

3. 从单一的按劳分配到按生产要素贡献分配的转变

在传统的社会主义经济理论中,按劳分配作为公有制在经济上的实现形式,一向被当作社会主义的唯一分配原则,谁否定按劳分配,谁就是否定社会主义基本经济制度。所以,在分配领域的改革,最初仅仅是着眼于按劳分配的实现形式,如到底是国家对劳动者按劳动一次性分配,还是国家先根据企业的整体劳动对企业实行一次分配、企业再根据劳动者的劳动实行二次分配呢?是按活劳动分配,还是按物化劳动或潜在的劳动(劳动力)进行分配呢?^[15]

但是,随着我国计划经济体制向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体制的转变和多元所有制结构的形成,在分配领域也出现了多种分配方式:除了传统的公有制经济中的按劳分配以外,个体劳动者通过合法经营既获得劳动收入又得到一定的资产和经营收入;当企业发行债券筹集资金时,债券所有者就会凭债权取得利息;随着股份经济的产生,还出现了股份分红;在企业经营者的收入中,包含部分风险补偿;在私营企业雇工经营中,企业主会得到部分非劳动收入。所有这些收入分配形式,其收入概括起来,不外乎是劳动收入和非劳动收入。前者既包括公有制经济

中的按劳分配收入,又包括个体劳动者和私营企业中的雇佣劳动者的收入,还包括经营管理者作为劳动者所获得的部分收入;后者表现为企业家收入(利润)、利息(含存款利息、包括红利和股票增值的股息、债息)和地租(土地转租得到的租金),它们本质上都是各种非劳动要素所有者凭借着要素所有权所得到的非劳动收入。正是在这种情况下,中共十三大提出,社会主义初级阶段实行按劳分配为主体、多种分配方式并存的分配制度,这就至少在政策层面上承认了非劳动要素参与分配的合理性与合法性。

时隔10年之后的中共十五大又进一步指出,在社会主义初级阶段,要坚持按劳分配为主体、多种分配方式并存的制度,把按劳分配与按生产要素分配结合起来。这一提法与中共十三大报告相比,对社会主义初级阶段的分配关系做出了更加具体和清晰的描述。

中共十六大则明确提出:确立劳动、资本、技术、管理等生产要素按贡献参与分配的原则。如果说“按劳分配为主、多种分配方式并存”是对社会主义初级阶段收入分配现象的一个总体描述,那么“按劳分配与按生产要素分配相结合”则试图对社会主义初级阶段收入分配关系做出理论概括,但自身又包含了许多不能自圆其说的矛盾。中共十六大把社会主义初级阶段的各种分配方式概括为“各种生产要素按贡献参与分配”。这一新的概括揭示了社会主义初级阶段分配关系的本质规定,克服了中共十五大提法中的矛盾,是对马克思主义的一个重大发展,具有重大的理论意义和政策意义。^[16]

中共十七大进一步提出,要健全劳动、资本、技术、管理等生产要素按贡献参与分配的制度。这意味着按生产要素贡献分配,从2002年作为一个分配原则初步确立,到2007年已经变成了一种分配制度。中共十八大进一步强调要完善劳动、资本、技术、管理等要素按贡献参与分

配的初次分配机制。中共十八届三中全会则进一步明确要健全资本、知识、技术、管理等由要素市场决定的报酬机制。中共十八届五中全会通过的《中共中央关于制定第十三个五年规划的建议》，一方面进一步强调要完善市场评价要素贡献并按贡献分配的机制，另一方面在前述四种要素中又增加了土地这一重要的生产要素。

总之，马克思主义经典作家为未来社会所设想的“三位一体公式”，在中国已经被以公有制为主体的多种所有制经济并存的混合所有制结构、市场经济和按生产要素贡献分配所取代，从中共十三大到十八大所发生的这三个方面的变化，都被当作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基本经济制度的规定性确定下来，并相应地写进了《中华人民共和国宪法修正案》。

三、判断我国基本经济制度的性质究竟以何为准？

有的学者仍然坚持以马克思恩格斯所设计的“三位一体公式”，作为判断当前我国基本经济制度本质属性的标准，认为以公有制为主体多种所有制经济共同发展的社会主义初级阶段基本经济制度，不同于社会主义基本经济制度，因为社会主义基本经济制度只能是公有制，并由此得出进一步的结论：非公有制经济是社会主义市场经济的重要组成部分，但不是社会主义经济的重要组成部分，同样地，按生产要素贡献分配也只是社会主义初级阶段或社会主义市场经济的分配原则，但不是社会主义的分配原则。^[17-18]

这种观点显然颠倒了理论与现实和实践的关系。科学理论的首要功能是建立理论模型或科学假说，从实证的角度说明现实是什么，并通过实践的检验不断修正、补充和完善理论假说，使之对现实的解释力不断增强。从这个意义上说，任何理论都是以现实为基础，来源于实践并通过实践不断完善和发展的。社会主义作为一

种经济制度，其一般属性不是先验地根据 100 多年前马克思主义经典作家对未来社会的设想确定的，而应是从社会主义的实践抽象出来的，应该创造性地运用马克思主义政治经济学的方法论，按照一般与特殊的辩证法和“最一般的抽象总只是产生在丰富的具体发展的地方”这一认识论，根据社会主义在中国的实践经验做出科学的界定。既然我国现实的社会主义只能是初级阶段的社会主义，那么今日中国社会主义的本质规定也就只能根据其初级阶段的基本特征抽象而成。

不仅如此，上述观点也不符合马克思一般与特殊和个别的辩证法。社会主义基本经济制度与社会主义初级阶段基本经济制度是一般与特殊的关系，社会主义初级阶段基本经济制度只能是社会主义基本经济制度的特殊表现，其所有制结构不应该含有社会主义基本经济制度一般规定中所没有的成分。如果我们把社会主义分成初级阶段和高级阶段，两个阶段的基本经济制度本质上应该是一样的，差别仅仅在于发展水平和完善程度有所不同，而社会主义基本经济制度正是包括初级阶段和高级阶段在内的整个社会主义时期的基本经济制度。

如果认为社会主义基本经济制度只能是公有制，那就意味着不论是社会主义初级阶段还是高级阶段，其基本经济制度都必须是公有制，而所谓以公有制经济为主、多种所有制经济并存的初级阶段就不能定义为社会主义初级阶段，至多可以看作是马克思所设想的由资本主义到社会主义的过渡时期。^{[3][31],[19]}反过来，如果我们承认现阶段以公有制经济为主、多种所有制经济并存的基本经济制度就是社会主义初级阶段的基本经济制度，那么，即使到了社会主义高级阶段，这种以公有制为主的混合所有制仍然是社会主义的基本经济制度。

同样的逻辑是，计划和市场都只是资源配

置的方式,本身并不具有基本经济制度的特征,正如邓小平所说,资本主义可以有计划,社会主义也可以搞市场。但无论是资本主义还是社会主义,都不可能脱离一定的资源配置方式抽象地存在。既然伴随着改革开放,社会主义计划经济体制已经转变为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体制,那么,非公有制经济作为社会主义市场经济的重要组成部分,当然也是社会主义经济的重要组成部分。

进一步说,社会主义与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的关系,也是一般与特殊的关系,后者只是前者的特殊表现形式,而离开了社会主义的特殊(具体)表现形式,一般社会主义也不可能存在。^[20]

习近平总书记在2012年11月17日主持中共十八届中央政治局第一次集体学习时指出:“在当代中国,坚持和发展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就是真正坚持社会主义。”显然,习近平总书记这里所说的“社会主义”绝不是一个半世纪前马克思主义经典作家对未来社会预想中的社会主义,而是现实中活生生的社会主义,是中国特色社会主义。这也就告诉我们,离开了中国特色社会主义这种特殊的具体形式,不存在抽象的社会主义一般。

参考文献:

- [1] 马克思,恩格斯.马克思恩格斯选集:第1卷[C].北京:人民出版社,1995.
- [2] 马克思,恩格斯.马克思恩格斯全集:第23卷[C].北京:人民出版社,1972.
- [3] 马克思,恩格斯.马克思恩格斯全集:第19卷[C].北京:人民出版社,1996.
- [4] 卫兴华.计划经济与经济计划[N].光明日报,1986-06-14(01).
- [5] 胡乃武,袁振宇.建立计划经济与市场调节相结合的运行机制[N].人民日报,1989-11-27(06).
- [6] 中共中央关于经济体制改革的决定[M].北京:人民出版社,1984.
- [7] 沿着有中国特色的社会主义道路前进[M].北京:人民出版社,1987.
- [8] 薛暮桥.计划经济与商品经济 计划调节与市场调节[J].改革,198(01):17.
- [9] 厉以宁.第二次调节论[J].财贸经济,1987(01):8.
- [10] 加快改革开放和现代化建设步伐 夺取有中国特色社会主义事业的更大胜利[M].北京:人民出版社,1997.
- [11] 中共中央关于全面深化改革若干重大问题的决定[M].北京:人民出版社,2013.
- [12] 高举邓小平理论伟大旗帜 把建设有中国特色社会主义事业全面推向二十一世纪[M].北京:人民出版社,1997.
- [13] 中共中央关于完善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体制若干问题的决定[EB/OL].(2012-11-05)[2016-11-10].jingji.cntv.cn/2012/11/05/ARTI1352087360703188.shtml.
- [14] 高举中国特色社会主义伟大旗帜 为夺取全面建设小康社会新胜利而奋斗[M].北京:人民出版社,2007.
- [15] 经济研究编辑部.建国以来社会主义经济理论问题争鸣(1949—1984)(下)[M].北京:中国财政经济出版社,1985.
- [16] 谷书堂,蔡继明.按贡献分配是社会主义初级阶段的分配原则[J].经济学家,1989(02):100.
- [17] 卫兴华.有关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经济理论体系的十三个理论是非问题[J].经济纵横,2016(01):1.
- [18] 卫兴华.中国政治经济学蕴含的根本原则[N].北京日报,2016-02-29(02).
- [19] 列宁.列宁选集:第4卷[C].北京:人民出版社,1976:48.
- [20] 周叔莲.非公有制经济是不是社会主义经济的重要组成部分[J].当代经济研究,2000(04):48.



引用格式:姚锡长.“我注六经,六经注我”对重回马克思的借鉴价值[J]. 郑州轻工业学院学报(社会科学版),2017,18(2):8-13,21.

中图分类号:A81 文献标识码:A

DOI:10.3969/j.issn.1009-3729.2017.02.002

文章编号:1009-3729(2017)02-0008-06

“我注六经,六经注我” 对重回马克思的借鉴价值

Reference value of “I note six channels and six channels note me” to the return of Marx

姚锡长

YAO Xi-chang

河南农业大学 马克思主义学院, 河南 郑州 450046

摘要: 诠释经典一直是儒家的一个重要的学术传统。以往人们诠释经典过多地偏重于“我注六经”,这一做法割裂了“我”与经典的深层关联,不免带有主观主义色彩。陆九渊的“六经注我”扬弃了“我注六经”的弊端,极大拓展和提升了儒家对经典诠释的思想深度。其深刻之处在于揭示了“我”与经典之间的本质统一关系,强调研习经典的目的和宗旨是人自身安身立命之需。这一做法对于我们学习和研究马克思主义经典有着重要启示:不能限于“我注六经”,即停留在“为学习而学习”的层面,而应将“我注六经”与“六经注我”有机统一起来。一方面,要充分肯定经典的地位,即重视对马克思主义经典作家的文本和思想的认真学习;另一方面,又要学以致用、知行合一,凸显马克思主义求解中国问题的真理性和科学性。

关键词:

我注六经;
六经注我;
重回马克思;
马克思主义经典著作;
实践

收稿日期:2016-05-25

基金项目:国家社会科学基金项目(13&ZD006);河南农业大学马克思主义研究中心项目(MYZX-2014011)

作者简介:姚锡长(1962—),男,河南省汝南县人,河南农业大学副教授,博士,主要研究方向:马克思主义中国化。

2013年12月3日，在中央政治局第十一次集体学习历史唯物主义基本原理和方法论时，习近平总书记强调要“原原本本学习和研读经典著作，努力把马克思主义哲学作为自己的看家本领”^[1]。顺应时代和实践的呼唤，在重回马克思主义经典和学习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理论体系最新成果的过程中，宋代学者陆九渊主张的“我注六经，六经注我”的经典研读方法重新进入人们的视野，并在东西方文化的交流和解读中获得了新的内涵，凸显了其在马克思主义经典著作解读中的独特价值。今天为什么要重提“我注六经，六经注我”？何谓“我注六经，六经注我”？其内涵是什么？它在今天又有哪些价值？这些是当今马克思主义经典著作解读需要深入思考的问题。

一、“我注六经，六经注我”的溯源钩沉

当人们遇到新问题时，往往会从过去积累的历史经验或教训中获得解决问题的智慧和灵感。经典作为人类文明成果的载体，蕴含着向过去寻求现实问题的答案和预测未来发展趋势的方法，欧洲的文艺复兴运动和孔子的恢复周礼，便是人类遇到新问题时而向历史经验求解的明证。经典的当代价值，不仅表现为它提供了特定问题的解决方案，而且还表现为其独特的解决问题的方式。因为，经典常常会随着人们阅读经典的深入而潜移默化地影响人类的思维方式。陆九渊所主张的“六经注我，我注六经”的阅读经典的方法，在今天重回儒家经典、重回西方经典、重回马克思主义经典的过程中之所以被重新提起，是因为人们看到了它所展现出来的现代价值。

1. “六经注我”和“我注六经”

“六经注我”和“我注六经”，作为研究六经方法的归纳和总结，是由陆九渊完成的。中国

具有5000多年的文明史，中华文化的流传是通过读书得以传承并由科举制度所保证的。“我注六经”的传统自汉代一直延续到宋代，受到了陆九渊、王阳明的质疑，并由他们提出“六经注我”的主张。作为了解和掌握经典思想的必要步骤和基本前提，注疏经书便顺理成章地成为大多数儒者的志业。由于科举制度的导向和封建阶级思想统治的需要，这种注释经典的传统在宋代发展到极致，成为文人孜孜以求的终生事业与最高的荣光。这种做法有其合理性。科举将对六经的注疏作为主要内容和录用的标准，由此决定了以考取功名为取向的大多数文人的治学路径。在这种为名利而陶醉于故纸堆的流弊蔓延于整个社会的情势下，陆九渊却对此不屑一顾，提出了自己的独到见解。当有人问他为何不著书立说时，陆九渊回答道：“六经注我，我注六经。”^[2]他对宋儒大家在注经上的得失给予了恰如其分的评价。在陆九渊看来，韩愈、欧阳修甚至程颐、程颢这样的宋儒大家，都是学文而至道的“我注六经”，唯独他自己则是至道而学文的“六经注我”。在他看来，这两种路径截然相反，相比之下，后者是更高的治学理念和境界。

学文而至道，其潜在前提是认为道是外在的，故需通过学习经典这条途径而通达大道；至道而学文，其潜在前提是认为道是内在的，存在于人的内心，学习经典就是拂拭掉蒙蔽在其上的灰尘而恢复大道的荣光。就学习不是终极目的而是求道的途径而言，陆九渊比那些以经典注疏为圭臬的文人略胜一筹。“我注六经”以己意注经，容易造成曲解，且多有言行相背的流弊。陆九渊的“六经注我”则强调学习六经的关键是将“六经”之道体现在日常行为之中的修身。这也是陆九渊以宏道为己任的有力证明。

2. “心即理”：“六经注我”的命题基础

“我注六经”的学文而至道之法是人们对

待经典的通常做法,古往今来,有大量的历史案例可以证明。而“六经注我”则与传统的注解方式截然不同,这种钻研儒家经书的新的治学主张和方法,指出了“我注六经”的流弊,有充分的学理依据。概而言之,“六经注我”的至道而学文之法是建立在“心即理”的命题基础上的。

陆学直接承接了孟子的“万物皆备于我”的“心学”,认为“宇宙便是吾心,吾心便是宇宙”,“宇宙内事是己分内事,己分内事是宇宙内事”,即大道在外为宇宙,在内则为吾心,心与大道是相通的。既然心与大道是相通的,那么作为大道之载体的六经便与我之心融为一体,因此就产生了二者互注的可能性。基于此,陆九渊认为,人们的心和理都是天赋的即永恒不变的,学习的目的就在于尽除心、理之上的浮尘,从而达到穷此理而尽此心之境。人生在世,难免受物欲的蒙蔽。一旦受了蒙蔽,就会导致心不灵、理不明,因此必须通过师友讲学,切磋琢磨,鞭策自己,以恢复心之本然。修养功夫在于求诸内心、存心养心。陆九渊在读经治学上主张诸心、宇宙、大道、六经是相通的,由此提出“心即理”的命题。“理乃天下之公理,心乃天下之公心”。他指出,诸心“上而千百载圣贤之心,下而千百载复有圣贤”只不过是先后之分,天理以六经为载体,人的本心合乎天理,亦即与六经相合,因此,“六经皆我注脚”,六经不过是印证本心的文献资料,帮助印证自己的本心。

总之,“心即理”这一命题,说明了理的客观普遍性、心的可知性和心与理的相通性,从而指明学习不是目的,只是心与理相通的途径和手段。陆九渊把后天的学习当作恢复心和理本真面貌的途径或手段,确有独到之处,既为“六经注我”的读经主张和方法奠定了基础,又指明了修身养性在沟通心与理中的桥梁作用。

3. 陆派弟子对“六经注我”内涵的阐释

陆九渊的“六经注我”作为当时读经研经方法的一家之言,由于与盛行的“我注六经”方法相左,不为一般人所理解,被世人视为狂妄之说,但继承陆九渊衣钵的弟子常在与人辩论和反驳的过程中阐述其师“六经注我”的内涵。

在祭奠陆九渊的悼文中,其弟子杨简对“六经注我”的含义作了简明扼要的解释:“《书》是先生之政事,《诗》是先生之咏歌,《礼》是先生之节文,《春秋》是先生之是非,《易》是先生之变易。”^[3]这种“六经注我”的读经治经方法,后被心学集大成者王阳明发扬光大。王阳明提出“经学即心学”的观点,明确指出六经是心之常道,并详尽生动地解释了“六经注我”的内涵:“《易》也者,志吾心之阴阳消息者也;《书》也者,志吾心之纪纲政事者也;《诗》也者,志吾心之歌咏性情者也;《礼》也者,志吾心之条理节文者也;《乐》也者,志吾心之欣喜和平者也;《春秋》也者,志吾心之诚伪邪正者也。”^[4]王阳明在这里更为明确地强调了心与六经的相通性与表现形式的多样性。由于陆学为王阳明所发展,故该学派世称“陆王学派”,以《象山全集》行世。

在“我注六经”被奉为时髦风尚的时代,“六经注我”无济于科举功名的考取,故常常为世人诟病。陆九渊与同时代的朱熹常相互辩难:朱熹主张先博览而后归之于约,认为陆九渊的教法太简易;而陆九渊主张先发明人的本心而后使之博览,认为朱熹的教法支离破碎。朱熹提倡的博览而后约的读书方法,确是读书治学的一般程序和经验总结,就治学而言他褒贬陆的教法简易,也算是一语中的;但先博览而后约的道理与读书人的关系往往被忽视,其读经之见也只是流弊的表现而已,终究逃脱不了世俗的偏见。陆九渊主张先明白人的本心、弄明白读书的目的之后再博览,抓住了读书与做人的关系这个关键问

题,因此他指责朱熹的教法由于偏离做人的目的而显得支离破碎,倒也干净利索地道出了朱熹精致学问下治学方向的迷失。

把朱熹作为辩难对手,且“六经注我”之说能够为其所基本认同,由此足见陆九渊“六经注我”一定有他的洞见。实际上,治学到朱熹的层次,也必然会引发对治学之终极目标的追问,故朱熹认同陆学亦属必然。只是当时许多人治学尚未达到朱熹的境界,更难理解陆九渊“六经注我”的高雅意趣,因此便入不了陆九渊的“法眼”。在陆九渊看来,只有朱熹才有与自己辩难的资格。朱熹晚年曾劝学者兼取两家之长,并对陆学表示敬意。陆王的“六经注我”,颠覆了“我注六经”的传统和权威,开辟了一条崭新的治经思路,具有一定的积极意义。辩证地看,“六经注我”是以“我注六经”为前提、为基础的,“六经注我”一旦脱离“我注六经”,便会流于空泛和狂妄。正因为割裂了二者的辩证关系,“六经注我”后来竟成为一些治经者不用读经、空谈心性的借口,从而消解了它的正面影响。

二、“我注六经”与“六经注我”之异同

中国经学研究一直存在重文本诠释和重义理阐发的两条路径,陆九渊把其简约地归纳为“我注六经”与“六经注我”。“六经”在这里泛指所有历史上出现的各种经典著作。为了弄清楚经典的本意或原意,“我注六经”需要阅读许多著作,进行系列考证,确定时间、地点、人物、事件。对于思想,则需要训诂、注疏方面的知识,经过综合考察,尽量恢复事物的本来面目。汉学以训诂考证、字句解释为主,“我注六经”就是汉儒继承孔孟之道的办法。这是经学的基础,是语言学家、历史学家所从事的工作。

与“我注六经”相对的是“六经注我”。宋学以阐发义理为主,通过阐释六经的方式建构

起自己的理论体系。“六经注我”使得文人对论著每每采取注疏形式。六经之中充满大道,六经所有内容都是大道的注脚。这是从思想是否与六经相通的角度而言的,是哲学家研究经学的途径。因此“六经注我”实质上就是借六经阐发自己的思想,但这里有个必要条件:不论是否引用六经上的语句,其精神都必须符合六经的本意和实质。

作为中国古代对经学的解读方法,“我注六经”与“六经注我”具有各自的特点和优势,但如将其各自的特点和优势单方面地发挥到极致,就会忽视其他治经方法的合理性而犯片面性的错误。“我注六经”,讲究的是尊重原典,训诂考证、章句解梳都要忠实于原典,以原典为依据,用通俗的语言还原文本,其目的在于使阅读者通过阅读经典了解经典;而“六经注我”,讲究的是心解与自得,就是要利用六经的本义,反复体悟其中的道理,以阐释自己的学术理念,来与古人之心相契合。

这两种治经的立场或方法虽有明显差异,但也有内在联系。在阅读经典文本的过程中,对经典文本的理解与由此而产生的对义理的阐发,往往是兼而有之,有时甚至是同时发生从而呈现出研经者与文本双向互动的态势。“我注六经”把读懂经典作为基础,但不应止于此,应以达到“六经注我”即阐发经典义理为目的,这“既合于古,又适乎今”。当然,在实际研究中,读懂经典与对义理的阐发,往往又是同时进行的。义理的阐发常发生于读懂经典之时,阐发义理之时就是真正读懂经典之时。陆九渊视野里的学问是指学而成人的过程,而不是简单的注疏类的学习,学习只是使人至善的手段而不是目的。正如张文修^[5]所指出的那样,以“止于至善”为皈依的“六经注我”,体现了一种大解释学的观念,凸显了诠释者在创造性、实践性、超功利性等多个方面的主体性。

儒学能够在百家中胜出并被打造为封建社会的主流思想文化,长期成为与封建制度相适应的意识形态,一定程度上是与其“我注六经,六经注我”的治学主张和方法分不开的,它合理地借鉴了道家和佛家的思想。儒学对当下现实性的执着,与道家的“无为而治”相融合而多了一份以“出世之心度入世之事”的洒脱和大度,与佛家的“慈悲为怀”相契合而又多了一份法治与德治的平衡。“我注六经”既是对文本的坚守,又是对儒学家国天下情怀和中国政治道德伦理化的坚守;“六经注我”则是在此基础上对社会现实问题的拷问和求解。学问如果不与人的道德的至善和社会的改良相结合,终会止步于“我注六经”的低层次;只有把学问设定为人的道德的至善和社会改良的手段与途径,才能达到“六经注我”的主境界。

三、“我注六经,六经注我”对研究马克思主义经典的启示

“什么是马克思主义,怎样对待马克思主义”始终贯穿于马克思主义中国化的整个过程和各个方面。“重读经典”这个“重”字更强调研究者的新的时代眼光。马克思主义是一个博大精深的理论体系,关乎改造旧世界、建设新世界这个伟大的系统工程。习近平总书记指出:“新形势下,坚持马克思主义,最重要的是坚持马克思主义基本原理和贯穿其中的立场、观点、方法。这是马克思主义的精髓和活的灵魂。”^[6]认识世界是为了改造世界,这是马克思主义有别于其他学说的实践特征。因此,随着革命、建设和改革实践主题的展现和转换,马克思主义理论体系中的某些原理自然会成为重读马克思主义经典的研究重点。

重回马克思主义经典文本首先需要注意方法论问题。按照马克思的说法,“问题就是时代的口号,是它表现自己精神状态的最实际的

呼声”^[7]。实践主题规定的理论主题的转移,向人们提出了重回马克思主义经典文本的要求。重回马克思主义经典文本蕴含着一个方法论问题。对此,学界有人借用中国儒学经典研究的范式即“我注六经,六经注我”,来概括马克思主义经典文本研究的方法和路径。马克思的研究方法、叙述方法的基本内容及这两种方法之间的辩证关系,丰富了对马克思的辩证法思想内涵的理解^[8],大体上与“我注六经,六经注我”的方法相类似。

陈先达^[9]曾把精读经典著作、学习马克思主义基本原理视为学习马克思主义的两种基本方式。中国的仁人志士接受马克思主义大多是从学习马克思主义基本原理开始的,特别是从接受马克思主义的唯物史观和阶级斗争学说而开始信仰马克思主义并走上运用它解决中国问题的道路的。在没有机会阅读马克思主义经典作家著作的革命战争时期,学习马克思主义基本原理是当时可行而又便利的途径。中国革命的胜利和马克思主义中国化理论成果的形成也从理论和实践上充分证明了这一点。新中国成立后,大部分中国人也是通过马克思主义教科书所阐释的基本原理来学习和掌握马克思主义的,但也出现了严重的教条主义和实用主义的错误倾向。鉴于此,在学习马克思主义基本原理的同时,学界适时地提出了“重回马克思”的时代要求。西方学者则从相反的路径,即无视基本原理而追求对文本的不同解读,人为地制造出“青年马克思”与“中年马克思”“老年马克思”的对立、“马克思”与“恩格斯”的对立。无论是国内忽视经典文本研究,还是西方脱离经典文本的任意解读,它们都不可取。它们既是对“六经注我”方式的不正当使用,又没有克服西方解释学的片面性。

对待马克思主义,我们既要防止不思进取的“我注六经”,也要力避自以为是的“六经注

我”^[10]。我们决不能止步于“我注六经”，决不能把马克思主义看做某种一成不变的和神圣不可侵犯的，决不能到马克思主义经典著作的字里行间去找什么九鼎之言，或用马克思主义经典作家在某时针对某事所作的个别结论教训他人。同时，我们也不能搞自以为是的“六经注我”。在马克思主义中国化的过程中，面对现实中出现的理论与实践之间的冲突和矛盾，必须谨慎辨析，既要站在巨人的肩膀上进行理论创新，又要善于用理论指导实践。在传统的马克思主义哲学的研究成果的叙事中，“六经注我”是中国学者普遍采用的方式。他们不是从马克思主义经典文本中为自己先入为主的观点寻找佐证，就是把现实的理论观点强加给马克思主义经典作家。严峻^[11]认为，这种方法缺乏自我批判的精神，推进马克思主义哲学的发展，需要以现实发展的实践为根本立足点，只有这样才能做到真正丰富马克思主义哲学。

今天学习和研究马克思主义需要将“我注六经”与“六经注我”有机统一^[12]。首先应通过研读原著达到对马克思主义的正确理解，把握马克思主义的实质和精髓，把握马克思主义的基本原理，深刻认识马克思主义及其各组成部分的内在逻辑。马克思主义基本原理蕴涵于马克思主义经典作家浩如烟海的原著之中，应在深入研究和正确把握其思想精髓和与时俱进的时代精神上下功夫，后在系统学习和全面把握其在风云激荡的历史岁月成功地把自已的理论诉诸党、诉诸人民的宝贵历史经验上下功夫。^[13]只有把握以读原著为主原则、针对新的实际原则、发展创新原则，把经典文本研究、基础理论研究、时代课题研究有机结合起来^[14]，才能真正实现“我注六经”与“六经注我”的有机统一，系统掌握和创造性地运用马克思主义。

马克思主义经典著作是马克思主义的载体和根源，其所蕴含的马克思主义基本原理始终

是马克思主义中国化的理论基础。学习和研读马克思主义经典著作，是我们党长期以来形成的一个优良传统。在今天，由于新的马克思主义文本的面世，学习和研读马克思主义经典著作也具备了更为良好的文献基础和条件。学习借鉴“我注六经，六经注我”的阅读经典文本的传统方法，就是要将“我注六经”与“六经注我”有机统一，而不是仅仅“为学习而学习”，一方面，要充分肯定经典的地位，即重视对马克思主义经典作家的文本和思想的认真学习；另一方面，又要学以致用、知行合一，凸显马克思主义求解中国问题的真理性和科学性。这样更有利于我们理解马克思主义基本原理，掌握马克思主义的立场、观点、方法，为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理论体系的最新成果进教材、进课堂、进头脑，为实现中华民族伟大复兴的中国梦，提供坚实的理论保障和行动指南。

参考文献：

- [1] 习近平. 推动全党学习和掌握历史唯物主义更好认识规律更加能动地推进工作[EB/OL]. (2013-12-04)[2016-05-20]. hews. xinhuanet.com/politics/2013-12/04/c_118421164.htm.
- [2] 陆九渊集卷三十四. 语录上[C]. 中华书局, 1980.
- [3] 陆九渊集卷三十六. 语录上[C]. 中华书局, 1980.
- [4] 阳明全书卷七[C]. 上海: 泰东图书局, 1925.
- [5] 张文修. 陆九渊“六经注我”的生命实践诠释学[J]. 湖南大学学报(社会科学版), 2007(02): 19.
- [6] 习近平. 在哲学社会科学工作座谈会上的讲话[EB/OL]. (2016-05-18)[2016-05-20]. politics.people.com.cn/n1/2016/0518/c1024-28361421-2.html.



引用格式:方兰欣. 论马克思主义的大众维度[J]. 郑州轻工业学院学报(社会科学版), 2017,18(2):14-21.

中图分类号:A8 文献标识码:A

DOI:10.3969/j.issn.1009-3729.2017.02.003

文章编号:1009-3729(2017)02-0014-08

论马克思主义的大众维度

On the public dimension of Marxism

方兰欣

FANG Lan-xin

中共中央党校 研究生院, 北京 100091

摘要:大众维度是理解和把握马克思主义精神实质的重要视角,它十分契合马克思主义的理论宗旨,因为马克思主义的根本使命就是解放无产阶级和大众人民,从而解放全人类。这一解放运动牢牢将人民大众作为主体力量,充分肯定他们是历史创造者的地位,认为只有人民大众才能担当起推动历史发展的重任。同时,人民大众还是评价主体。马克思主义政党的理论和实践工作干得好不好,得由人民大众来评判。马克思主义的大众维度对于当代中国马克思主义研究意义重大。我们必须直面“中国问题”,自觉地对重大的现实问题和时代课题展开研究,给出马克思主义的解答。惟其如此,人民大众才能信服马克思主义,才能坚定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的道路自信、理论自信、制度自信和文化自信。

关键词:

马克思主义;
大众维度;
大众立场;
实践主体;
评价标准;
问题关切

收稿日期:2016-11-06

作者简介:方兰欣(1987—),男,河南省南阳市人,中共中央党校博士研究生,主要研究方向:马克思主义理论。

马克思主义不是书斋里的学问,而是人民大众批判旧世界的武器与解放自己的学说。作为一个开放的且不断发展着的理论,马克思主义包含着多个层面的思想内涵。吉林大学教授、我国著名哲学家高清海等^[1]曾指出,改革开放以来中国逐步出现了“讲坛哲学”“实践哲学”“论坛哲学”三足鼎立的局面。“讲坛哲学”——属于政治宣传、思想理论教育领域;“实践哲学”(包括多种不同性质和形式的“实用哲学”)——属于经济生活、日常社会生活领域;“讲坛哲学”——属于学者专业活动的学术生活领域。这“三类哲学”的划分标准是马克思主义哲学的表述方式与指涉主体的不同,对应今天的说法就是哲学的政治维度、大众维度与学理维度(学术维度)。马克思主义哲学是马克思主义的理论基础,因此,马克思主义哲学的三个维度实质上反映了马克思主义的三个维度。“大众维度的马克思主义是适应时代发展的要求从人民大众的生活实践中自然形成的思想观念和生活样式,最具群众基础”,“大众维度表达‘为谁立言’的问题,是‘本位’”。^[2]马克思主义致力于探索大多数人的解放与自由全面发展之路,为大众立言,为人民大众谋利益。惟其如此,大众维度是马克思主义的内在理论品格,突出反映了马克思主义的立场、观点与精神,是我们加强意识形态战线工作与推进马克思主义中国化、大众化的一个重要切入点。本文拟从马克思主义的理论主旨、实践主体、评价主体和问题关切四方面对马克思主义的大众维度予以解析。

一、大众立场是马克思主义的理论主旨

劳苦大众的解放,是马克思主义作为无产阶级革命学说的根本宗旨。长期以来,人们习惯于将马克思主义分为哲学、政治经济学与科

学社会主义三部分。在我们看来,马克思主义是一个有机统一的整体,其宗旨就是追求人的解放即实现人的自由而全面的发展。马克思恩格斯所处的时代,欧洲工业革命快速推进,资本主义社会的生产方式创造出以往任何时代都无法比拟的巨大物质财富。恩格斯指出,随着资本主义的发展、企业的扩大,资产阶级的猥琐伎俩减少了,商业道德水平也有所发展,甚至“过去带头同工人阶级作斗争的最大的工厂主们,现在却首先起来呼吁和平与和谐了”,开始“对正义和仁爱的让步”。^{[3]367-368}然而,贫穷与绝望依然笼罩着人民大众,“他们的穷困和生活无保障的情况现在至少和过去一样严重”。^{[3]375}生产的发展、竞争的加剧,越来越多的人口变得更加赤贫,被无情地卷入资本主义的生产链条中。资本主义大工业迫使大量的人口只能靠出卖自己的劳动力来谋生。工人的处境越来越糟糕,“一个个战战兢兢,畏缩不前,像在市场上出卖了自己的皮一样,只有一个前途——让人家来鞣”^[4]。在这种社会中,资本逻辑独大,资本家成为资本增值的人格代表,工人成为资本增值的工具,人人都处在一种异化的、分裂的、非本质的状态。造成这种异化问题的原因归根结底不是资本家的道德堕落,而是资本主义生产方式及其社会制度本身。这种社会制度存在一种难以克服的结构性弊病,造成“无产阶级是集体不自由的,是一个被囚禁的阶级”^[5],进而决定了无产阶级与资产阶级矛盾的不可调和性。因此,马克思主义强调,要实现人的自由全面发展,既不能诉诸单个穷人同单个富人之间的斗争,也不能诉诸犹太民族与其他民族之间的斗争,更不能寄希望于资本家的道德觉悟与良心发现,只有超越资本逻辑,创建新的人类社会文明发展形态。这种新的社会文明发展形态否定并超越了资本主义与前现代社会中一部分人的发展以另一部分人的不发展、欠发展甚至是牺

牲为代价的模式。这种新的社会不但要实现劳苦大众的解放,也要把社会从私有制的奴役中解放出来,因而追求的是全人类的解放与发展。因此,马克思主义站在大众立场上主张“把连同资本家在内的整个社会从现存关系的狭小范围中解放出来”^[3]³⁷⁰,这是马克思主义作为无产阶级的解放理论之题中应有之义。

大众立场是深刻认识和揭示当代资本主义社会本质的根本立足点。第二次世界大战后,西方资本主义国家经济社会快速发展。在此条件下,社会保障与社会服务水平也迅速提升,白领工人与中产阶级的出现,政治民主化、程序化、法制化的发展,在一定程度上缓解了资本主义社会不同阶级、阶层之间的矛盾与冲突。从表面上看,好像“旧时王谢堂前燕,飞入寻常百姓家”,原先属于权贵和富人专享的东西普通大众也可以消费了,大家在社会发展、国家强大的过程中普遍受益,阶级和阶层的根本差异消解了,似乎历史已经终结了。但是,透过物质繁华与大众消费的表层我们会看到,“现在世界许多地方,阶级身份仍然是非常明显、毫不含糊的。在大多数当代国家中,不同阶级的生活方式差别不会减少也不会消失。实际上,随着当代名流享受的奢侈品和服务日益增多,有钱有势的人与农村及城市贫民窟的人在生活方式上的差距已经达到从未有过的悬殊程度。经过最近几个时代的工业进步,世界各地的统治阶级已经从坐轿发展到坐高级小轿车、乘私人飞机,而平民百姓中有人却甚至没有驴和牛代步。上层人物能在世界第一流的医疗中心享受最好的医疗护理,而大多数人只能接受普通医疗,有许多人连病菌能致病的理论都没有听说过,更不用说有现代医疗技术给他们治病了”^[6]。美国文化人类学家哈里斯 30 年前的这段话,对于我们分析当下西方社会的现实依然有效。只要不刻意地闭上眼睛,我们就能看到发达国家对

发展中国家的剥削,就能看到发达地区对落后地区的剥削,就能看到资本主义企业对工人的剥削。随着市场经济与世界历史的发展,传统的国家内部的阶级对立在很大程度上已经成为发达国家与落后国家、发达地区与落后地区、社会强势群体与弱势群体之间的对立。因此,坚持马克思主义的大众立场,对于我们深刻认识资本主义世界新变化,准确把握资本主义社会实质,具有重要的方法论意义。

大众立场就是中国共产党的阶级立场。为大众代言,全心全意为人民服务,是中国共产党的根本宗旨。在革命年代,中国共产党是占人口绝大多数的劳苦大众的代表,带领群众推翻帝国主义、封建主义、官僚资本主义三座大山,实现了劳苦大众的政治解放;在社会主义建设和改革开放时期,中国共产党是各行各业劳动群众的代表,为实现人民群众物质生活水平提高而艰难探索。改革开放初期,人民大众的物质生活急需改善,中共中央进行了经济体制改革,极大地解放和发展了生产力,人民群众生活水平得到普遍提高和改善。不发展的时候问题集中在温饱上,发展起来以后,温饱解决了,其他的问题就会多起来。随着改革开放的不断深入,中国社会阶层结构、利益结构发生重大调整,贫富差距持续扩大。一部分人奋斗一辈子到头来终无立锥之地,而有的人却坐拥豪车、豪宅,掌控数十亿、数百亿的财富。资本逻辑所体现出的市场经济负效应已经在中国社会凸显。针对这些问题,中共中央从实际出发,提出科学发展、以人为本、更加注重公平的发展理念。特别是以习近平总书记为核心的新一届中央领导集体,坚持人民主体思想,以“四个全面”战略布局与“五大发展理念”来进一步深化社会政治、经济体制改革,打破利益固化的藩篱,让发展的成果惠及每一个劳动者,让人人有梦、敢做梦、能圆梦,让辛勤劳动的每一个人的人生都有出

彩的机会。这是马克思主义大众立场在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新阶段的集中体现。

二、人民群众是马克思主义的实践主体

人民群众是社会历史的实践主体,马克思主义始终把全人类的解放作为自己理论的主旨。空想社会主义和形形色色的宗教虽也都把解救大众作为自己的旨归,但是,由于他们不是停留在高尚的道德热忱层面就是局限于消费和分配领域,不能深入社会生产方式从而把握社会发展的基本矛盾,因而也就不能认识到劳动群众在社会历史中的实践主体地位。马克思主义之所以能够成为全人类的解放学说,其根本原因在于它揭示了人类历史发展的内在动力,肯定了人民群众的实践主体地位。恩格斯曾说马克思的一生有两大发现,即唯物史观和剩余价值学说,前者发现了人民群众在历史发展中的实践主体作用,后者揭示了资本家剥削工人的奥秘。马克思主义认为,生产力与生产关系之间的矛盾是人类社会发展的基本矛盾和根本动力。社会实践创造了人本身,劳动者作为社会实践的主体创造着人类文明。因此,人民群众才是历史的真正创造者,是推动历史发展的主体力量。任何一种理论,如果忽视了人民群众的主体地位,就会沦为自欺欺人的空洞说教;任何政权一旦脱离了人民群众的拥护与认同,也就成了无本之木。

人民群众是马克思主义理论现实化的实践主体。众所周知,唯物史观和剩余价值学说,使社会主义从空想变为科学。科学理论不但要从根本上揭示现实的本质,而且还得具有推动不合理的现实趋向理想的力量。马克思主义理论作为一种革命的、批判性的学说,不仅仅追求科学地“解释世界”,更在于强调有效地“改变世界”。这种改变现存世界的学说包含着对现实

的哲学批判、政治经济学批判与社会批判。对旧哲学和对资产阶级经济学的批判,直指现存的社会政治体制,我们应当把“批判和实际斗争看做同一件事情”^[7]。在剥削阶级看来,这种批判挑战了其合法性、破坏了其统治秩序,是不可容忍的。然而,从实际上来看,这“只不过是人民生活的直接的、自然的的表现的东西”^[8]。马克思主义对现实社会的批判性与革命性改造,使自身产生了一种价值立场、理论预设和未来期待,而要使马克思主义理论的价值立场、理论预设和未来期待都转化为一种现实,转化为一种政治变革、社会变革的运动和过程,都必须通过人民群众的社会实践来实现。因此,马克思主义理论、马克思主义政党和马克思主义者无论何时都不脱离人民群众、背离人民群众。

只有群众相信马克思主义,马克思主义才有力量;理论只有掌握群众,才能形成稳定秩序或者变革世界的力量。马克思主义立足于资本奴役人的社会现实,力图破解人的异化危机,实现人的自由全面发展。然而,资本主义异化本质的消除,并不能仅仅通过人们头脑里的观念运动来实现。理论只有掌握群众,才能将精神转化成物质,从而产生实际效用。所谓“精神变物质”,也就是说群众掌握了理论并以此为指导从而进行物质生产与创造。马克思主义改变现实的力量存在于无产阶级和人民群众身上。人民群众一旦同自身解放的思想武器相结合,就能够产生无穷的变革力量,从而打破自身的枷锁。只有承认、尊重人民群众的实践主体性地位,才能真正变革世界。历史的发展早已证明了这一点。马克思在《法兰西内战》中指出,法国的中产阶级与小资产阶级在历史上破天荒地第一次公开团结在工人的旗帜下,正是因为他们感受到了“工人阶级的宏伟志向和巨人般的力量”,感到“只有工人阶级才能够把他们从僧侣统治下解放出来,把科学从阶级统治

的工具变为人民的力量,把科学家本人从阶级偏见的兜售者、追名逐利的国家寄生虫、资本的同盟者,变成自由的思想家!只有在劳动共和国里面,科学才能起到它真正的作用”^[9]。因此,归结起来,变革现实世界、推动社会发展和实现人的自由和解放的力量主体是人民群众。他们的政治解放、经济解放与思想文化解放实际上就是人类自身的解放。

马克思主义传入中国后,以毛泽东为代表的中国共产党人坚持工农联盟,不断扩大统一战线,争得了广大贫苦劳动群众的拥护与支持,实现了中国革命、建设的节节胜利,同时也形成了中国化的马克思主义理论成果。改革开放以来,我们党更加尊重人民群众的首创精神,解放思想、实事求是,实现工作重心转移,千方百计调动起亿万劳动群众的生产和建设积极性,开创了中国特色社会主义伟大事业,形成了马克思主义中国化的最新成果——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理论体系。历史唯物主义的群众观点与中国共产党的奋斗历程告诉我们:马克思主义必须服务大众、相信大众、依靠大众,只有把马克思主义的普遍真理同人民群众追求解放和幸福的实践相结合,相信群众、依靠群众,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才会具有活力,马克思主义才会不断焕发新的生机。

三、人民群众是马克思主义理论与实践的评价主体

马克思主义既然将人民群众的解放作为自身的理论宗旨,那么,人民群众就不仅是其实践主体,同时也是其评价主体。马克思主义作为科学的世界观与方法论,它“始终是围绕一个主题进行的,这就是‘破解资本占有劳动的秘密与实现无产阶级解放和人的自由全面发展’”^[10]。马克思主义的理论与实践能在多大程度上带来人的解放与发展,人民群众感受最

清楚也最有发言权,自然也就最有资格评价。马克思主义从观念转变为大众的生活现实、由理论转变为大众的政治实践过程,离不开无产阶级政党的政治中介作用。“工人阶级在它反对有产阶级联合权力的斗争中,只有组织成为与有产阶级建立的一切旧政党对立的独立政党,才能作为一个阶级来行动……工人阶级这样组织成为政党是必要的,为的是要保证社会革命获得胜利和实现这一革命的最终目标——消灭阶级。”^[11]无产阶级政党是工人阶级的主心骨,其宗旨是为人民群众的解放与发展而谋利益。但是,人类毕竟还没有达到庄子所谓的“无待”境界,无论是个人或者集团围绕自我向外延展时都会形成价值、利益、情感上的差序格局。特别是在无产阶级专政的社会主义社会中,无产阶级政党作为执政党一方面要同现实的各种反对力量进行斗争以维护自己的统治地位,另一方面又要继续革命以保持自身的党性本色。二者之间必然存在着一定的紧张关系,这种紧张关系会给无产阶级政党和马克思主义带来风险与考验。无产阶级政党所实行的路线、方针与政策在多大程度上代表了人民群众的利益,如何实现执政目的性与历史合规律性的统一,这都有待历史和人民来检验。人民群众是历史的创造者,人民群众最有发言权,凡是糊弄和欺骗人民群众的最终必将被人民和历史所抛弃。因此,对马克思主义理论在实践中的得失进行评价,必须贯彻人民主体思想,坚持让大众满意的标准,倾听群众的心声。

无产阶级政党是工人阶级的先锋队,是人民群众的代言人,与人民群众在根本利益上具有一致性。对此,马克思恩格斯在《共产党宣言》中明确指出,共产党人“没有任何同整个无产阶级的利益不同的利益”,共产党人始终代表着无产阶级自身解放这一运动的整体利益与发展方向。^[12]中国共产党自成立之日起,就自

党担负起为大众代言的责任,把人民群众是否满意作为自身工作的评价标准。《中国共产党章程》强调,“党除了工人阶级和最广大人民群众的利益,没有自己特殊的利益”。^[13]只有坚持权为民所用、情为民所系、利为民所谋,实现好、维护好最广大人民群众的眼前利益与长远利益,无产阶级政党才能够长期执政。新民主主义革命期间,毛泽东在悼念张思德时强调,中国共产党完全为人民解放、彻底为人民利益而奋斗;在《论联合政府》中指出,“中国共产党是中国人民的最忠实的代言人”,共产党人要关心人民群众的生产和生活,坚持全心全意为人民服务的宗旨^[14]。改革开放后,邓小平把毛泽东同志关于为人民服务的思想和党同人民群众的情感态度相结合,提出了“三个有利于”的标准,并把“人民满意不满意、人民高兴不高兴、人民赞成不赞成”作为评价党和政府工作得失的实践标准。在新的历史条件下,胡锦涛同志反复强调,要继续坚持“立党为公,执政为民”,“做到心里装着群众,凡事想着群众,工作依靠群众,一切为了群众,坚持权为民所用、情为民所系、利为民所谋”。中共十八大以来,以习近平为核心的中央领导集体强调要更加关注人民群众的幸福感和满意度,强调“人民对美好生活的向往,就是我们的奋斗目标”,改善民生就是治国理政的最大政绩,要求党和政府的各项工作都要考虑人民群众的利益与感受。

四、面向“中国问题”是马克思主义大众化的必然逻辑

关注现实世界,关注时代和实践提出的重大现实问题,既是马克思主义的本性,也是它的出场逻辑。马克思从思维与存在不相一致的物质难题出发,研究政治经济学,思考哲学与时代的关系问题;从资本奴役人的现实出发,探寻解决异化劳动与人的依赖问题,在理论自我批

判中探索理论的进一步完善和发展。正是在解决理论问题和现实问题的过程中,马克思和恩格斯创立了马克思主义。马克思主义普遍真理与不同国家和民族的具体实际相结合,由此产生的带有各个国家和民族特色的马克思主义,是马克思主义的多样化现实形态。马克思主义的大众化彰显和深化了马克思主义的真理性,而马克思主义的真理性在于其科学性。问题逻辑和问题意识是马克思主义出场的逻辑起点,奠定了马克思主义坚实的科学基础,也为马克思主义理论发展及其现实化提供了前提。在当代中国,要想不断提高和彰显马克思主义的大众维度,推动马克思主义理论与实践的发展、创新,就必须直面现实问题。

如何才能发展面向“中国问题”的马克思主义?答案是必须面向中国社会的实际问题。惟其如此,马克思主义才能够真正实现中国化、大众化。再好的理论如果只将其束之高阁、不接触群众生活、不解决中国实际问题,对社会来说也是没有意义的,反而会使其本身逐渐失去生命力。之所以要发展面向“中国问题”的马克思主义,一方面是因为中国问题的解决离不开马克思主义这一科学理论的指导,另一方面是因为马克思主义理论自身的生长和发展也离不开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的实践与当下的具体环境。所谓问题,就是没有解决的矛盾,不同时空环境下要面对和解决的矛盾不同,问题也就不同。“中国问题”有暂时性问题和长远性问题,有表面问题与深层次结构性问题,有国际问题与国内问题。就当前国际形势来看,世界力量大转移、经济结构调整、国际局势与地区形势不稳定,为我国的和平发展增加了诸多不稳定因素,带来了挑战。从改革开放以来的国内社会变化来看,全面深化改革、产业结构调整所带来的利益变动、思想分化与普遍性的精神焦虑,一定程度上正在消解着我们的核心价值与梦想共

识。同时,生态环境持续恶化、高致死性疾病蔓延(艾滋病、癌症等)、楼市泡沫与虚拟经济畸形发展,给中国人的身心带来了双重伤害,从整体上影响着中国的可持续发展。面对这些问题与风险,我们应当立足于日常生活与国际社会现实,用马克思主义理论武装头脑、认知世界、指导实践、谋划生活,既要讲好中国故事,又要唱响中国声音。马克思主义只有关注人的现实境遇,只有去指导解决困扰改革与发展的各种矛盾、问题,勇于回应挑战,才能够让人民群众真信、真学、真用。只有直面现实问题、解决现实问题,让人民群众在实际生活中真正感受到马克思主义的科学性,才能凝心聚力,坚定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的道路自信、理论自信、制度自信和文化自信,更好地化解矛盾与问题,扩大马克思主义的话语权与影响力。因此,关切中国社会现实问题,既是马克思主义彰显其大众维度的内在逻辑必然,也是马克思主义作为我国指导思想的客观现实要求。

中国共产党人干革命、搞建设、抓改革,从来都是为了解决中国的现实问题。也正是在解决一个个现实问题的过程中,我们才取得了一个个的胜利,中国特色社会主义道路才越走越宽广,马克思主义理论才越来越完善。中国共产党的奋斗历史表明,将马克思主义的普遍原理同中国具体实际相结合,党的事业就兴旺发达,人民群众就能得到实惠;反之,认识不到中国问题的复杂性、特殊性,简单套用书本理论或者照搬照抄别国经验,我们党的事业就会走弯路、犯错误,人民群众就会遭受巨大的损失与代价。实践一再证明,马克思主义不是教义,而是一种方法,是一个不断发展着的理论和进一步研究的起点。改革开放30多年,社会发展日新月异,新情况、新问题不断涌现,这就需要我们更加大胆地进行理论与实践上的探索和创新。正是因为我们坚持和发展了马克思主义,中国

共产党才摆脱了历史上所有政治力量追求自身特殊利益的局限性,这是马克思主义自我革命的本性使然。这一革命本性使其成为一种变革现实世界的科学理论,其所固有的实践性特质本身就蕴含着重要的大众维度。新形势下,面对世情、国情和党情的新变化,习近平总书记提出要“发展21世纪中国的马克思主义”和“发展21世纪马克思主义”,为中国共产党人在新的历史条件下坚持和发展马克思主义点明了主题,提出了任务和要求。要不断开辟21世纪马克思主义发展的新境界,让马克思主义在当代中国放射出更加灿烂的真理光芒,就必须以更加宽阔的眼界审视马克思主义在当代发展的现实基础和实践需要,坚持问题导向,坚持以我们正在做的事情为中心,聆听时代声音,更加深入地推动马克思主义同当代中国发展的具体实际相结合。^[15]只有面向“中国问题”,把马克思主义同中国社会实际和实践相结合,马克思主义才能不断展现自身的科学性与革命性,也只有直面中国社会现实问题,不回避、不逃避、不畏惧,马克思主义才能真正代表大众立场,为大众代言。

五、结语

马克思主义的大众维度,充分体现了解放人民群众是宗旨所在,人民群众是历史的创造主体和评价主体,面向“中国问题”是马克思主义大众化的必然逻辑。因此,基于实践并不断在实践中发展而为人民群众谋利益的大众维度,是马克思主义最为本质的特征。发展21世纪的中国马克思主义,应当立足当代世界发展新变化与国际国内发展的实际矛盾、问题与挑战,继续坚持大众立场与人民主体思想,发展和推进中国特色社会主义伟大事业。特别是针对当前意识形态斗争日益复杂化的现实,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的政治实践与理论研究,只有时刻

关注社会大众所思、所想、所求,才可能把马克思主义的立场、观点、精神真真正正地融入到社会大众的日常生活中,引领社会政治批判与政治革新,在政治、学术与大众的互动交流中,推动中国马克思主义的实践创新、理论拓展与大众认同。

参考文献:

- [1] 高清海. 找回失去的“哲学自我”——哲学创新的生命本性[M]. 北京:北京师范大学出版社, 2013:25.
- [2] 尹占文, 苟国旗, 邓淑华. 马克思主义关联中国问题的三重维度[J]. 社会科学研究, 2011(5): 59.
- [3] 马克思, 恩格斯. 马克思恩格斯文集: 第1卷[C]. 北京:人民出版社, 2009.
- [4] 马克思. 资本论: 第1卷[M]. 北京:人民出版社, 2004:375.
- [5] COHEN G A. History, Labour, and Freedom[M]. Oxford: Clarendon Press, 1988:264.
- [6] 马文·哈里斯. 文化人类学[M]. 北京:东方出版社, 1988:276-277.
- [7] 马克思, 恩格斯. 马克思恩格斯文集: 第10卷[C]. 北京:人民出版社, 2009:9.
- [8] 马克思, 恩格斯. 马克思恩格斯全集: 第18卷[C]. 北京:人民出版社, 1964:509.
- [9] 马克思, 恩格斯. 马克思恩格斯文集: 第3卷[C]. 北京:人民出版社, 2009:204.
- [10] 韩庆祥, 邱耕田, 王虎学. 论马克思主义的整体性(上)[J]. 哲学研究, 2012(8):3.
- [11] 马克思, 恩格斯. 马克思恩格斯全集: 第17卷[C]. 北京:人民出版社, 1963:455.
- [12] 马克思, 恩格斯. 马克思恩格斯文集: 第2卷[C]. 北京:人民出版社, 2009:44.
- [13] 中国共产党章程[M]. 北京:中国法制出版社, 2016:18.
- [14] 毛泽东. 毛泽东选集: 第3卷[M]. 北京:人民出版社, 1991:1004-1087.
- [15] 习近平. 在庆祝中国共产党成立95周年大会上的讲话[J]. 党建, 2016(7):6.
- (上接第13页)
- [7] 陈先达. 马克思主义哲学的当代性与文本解读[J]. 中国社会科学, 2007(05):30.
- [8] 俞吾金. 论马克思的研究方法和叙述方法之间的关系[J]. 马克思主义与现实, 2000(06):16.
- [9] 陈先达. 马克思主义基本原理、文本及其解读[EB/OL]. (2015-08-15)[2016-05-20]. www.qstheory.cn/politics/2015-8/12/c_11162-22472.htm.
- [10] 辛鸣. 马克思主义始终是主心骨[N]. 中国青年报, 2011-05-18(02).
- [11] 严骏. 当代马克思主义哲学的发展问题——对于“六经注我”范式的思考[J]. 思想政治理论教育新探索, 2011(04):81.
- [12] 李春华. “回到文本”: 科学对待马克思主义[EB/OL]. (2010-04-21)[2016-05-20]. theory.people.com.cn/GB/11422186.html.
- [13] 程恩富. 学好《马克思恩格斯文集》《列宁专题文集》的四点意见——在“《马克思恩格斯文集》、《列宁专题文集》与当代中国”学术研讨会上的致辞[EB/OL]. (2010-04-21)[2016-05-20]. theory.people.com.cn/GB/11422175.html.
- [14] 王东. 论文本研究理论与理论创新的关系[J]. 学术月刊, 2003(01):8.



引用格式:李本松. 社会有机体理论视角下社会发展动力新论——兼论对“五大发展理念”的理解[J]. 郑州轻工业学院学报(社会科学版),2017,18(2):22-26.

中图分类号:A81;B03 文献标识码:A

DOI:10.3969/j.issn.1009-3729.2017.02.004

文章编号:1009-3729(2017)02-0022-05

社会有机体理论视角下社会发展动力新论

——兼论对“五大发展理念”的理解

A new explanation of social development power under the perspective of social organism theory

—And a discussion about the understanding of “the five concepts for development notions”

李本松

LI Ben-song

河南工业大学 马克思主义学院, 河南 郑州 450001

摘要:社会有机体是思想家们关于社会的形象化比喻,科学的社会有机体理论是马克思创立的。在马克思看来,社会有机体是各种社会关系同时存在又相互依存生成的社会关系总合体;社会发展动力是社会各种构成要素、结构、关系和合而生成的动力。当前我国进入“十三五”时期,创新、协调、绿色、开放、共享是主导我国“十三五”时期的“五大发展理念”,其思想和方法论基础是马克思社会有机体理论与生成发展动力思想。树立“五大发展理念”有助于改变利益固化的社会关系,实现社会协调健康发展,统筹国内外资源,激发人民的创造力,由此生成社会发展动力,这是在新常态情势下实现我国快速、协调、可持续发展的保证和条件。

关键词:

社会有机体;
社会发展动力;
五大发展理念

收稿日期:2016-11-02

基金项目:河南省社会科学规划决策咨询项目(2016JC07);河南工业大学教研项目(27510002/16)

作者简介:李本松(1969—),男,河南省光山县人,河南工业大学副教授,博士,主要研究方向:唯物史观、政治经济学。

关于社会发展的动力,不同的哲学流派有不同的理解。唯心主义要么是从存在于人之外的客观精神中去寻找,把上帝、绝对理念等看作社会发展的动力;要么是从人的主观精神中去寻求,把人的心理、意识、理性、意志看作社会发展的动力。旧唯物主义试图从物质、经济、技术等方面来寻找社会发展的动力,将地理环境、人口、物质生产、科学技术等看作社会发展的动力。唯心主义和旧唯物主义对社会发展动力的认识,总的说来都是错误的,尤其是旧唯物主义对社会发展动力的机械理解遮蔽了社会的本质、社会发展动力的本真内涵。本文拟从马克思社会有机体理论视角,对社会发展动力进行新的解读,以求教于学界。

一、马克思的社会有机体思想

马克思的社会有机体思想零散地分布在其众多的著作和文章中,只有对其进行系统梳理和深入挖掘,才能获得其完整的内容。在《哲学的贫困》中,马克思指出,一切关系在其中同时存在而又互相依存的社会机体就是社会。^[1]在《1857—1858年经济学手稿》中,马克思指出:“社会不是由人构成,而是表示这些个人彼此发生的那些联系和关系的总和。”^[2]在《致巴·瓦·安年柯夫》的信中,马克思进一步指出:“社会——不管其形式如何——究竟是什么?是人们交互作用的产物。”^[3]

基于对这些文本深入系统的研究,我们可以将马克思的社会有机体思想简要概括为:社会是一个类似生命有机体的另一种有机体,社会有机体不是单个人的集合体,而是人通过交互作用形成的关系的总合体。换言之,社会有机体就是社会关系总合体。^[5]这里的“总”是指人们通过交互作用形成的相互依存的全部社会关系,是社会总的关系;“合”是指通过和合生成新事物的机制和过程,是新事物的生成;

“体”指的是实体性与整体性的结构和状态。

马克思社会有机体思想是理论与思维方法的统一。从理论上讲,它表明社会不是单个人的集合体,而是社会关系的连结体,就像一张立体结构的网状体;从思维方法上讲,它是一种有机思维方法和整体方法论,是一种关系思维和生成论方法。惟其如此,其对创新发展理念和制定政策意义重大。

二、社会有机体理论视角下社会发展动力新认识

社会关系是现实的人通过总体性社会实践形成的,社会有机体是各种社会关系同时存在又相互依存而生成的社会关系总合体。基于社会有机体理论,社会发展的动力应该是一种和合动力论,即社会发展动力是由社会各构成要素、结构、关系和合而生成的。“和”是指社会有机体的要素、结构、关系的和;“合”是指构成社会有机体的多种要素、结构、关系的综合、总和。社会发展的动力是和合动力,表现为旺盛的社会活力和肌体生命力。社会发展的动力源于人的社会需要和利益追求,生成于社会诸要素的和合。马克思这种社会有机体理论视角下的社会发展的“和合动力说”,与恩格斯关于社会发展的“合力论”在本质上是是一致的。

社会发展动力的“和”,既表现为社会结构的各部分之间的互相适应和有机配合,又表现为社会结构与其结构对应下的功能之间的互相适应和有机配合。社会发展动力的“和”,还表现为社会构成要素的结合和相互作用上的“和”。社会发展动力的“和”更是一种最能实现有机体结构和功能的有机配合和互相促进的“和”,是一种能形成社会有机体活力的、具有健康生命力的结合形式,是社会有机体要素发挥功能和结构配合上的“和”。社会发展动力的“和”也表现为社会结构和社会功能的互相

适应和有机配合。社会有机体的构成要素有多种,每一种都有其特定的功能,当它们通过总合生成社会活力时,社会的结构和功能是互相适应、相互配合的,社会发展的动力就生成于这种适应和配合之中。

社会发展动力的“合”是社会各种构成要素、前提和条件的总和、综合、总合,是生成新事物的过程。与人的生命机体等一样,社会有机体也是由细胞、组织、器官、系统等构成,但是这个整体一旦形成,就具有超越部分的性质和功能。总合会形成社会整体与新质,这种整体和新质的内容之一就是产生社会发展的动力。总合是一个生成与合成的过程,既表现为社会机体活力和生命力的生成,也表现为社会有机体发展动力的合成与生成。

总的说来,“和”侧重于社会有机体动力结构的“关系”上,是社会构成要素的关系和谐;而“合”则表现为社会各种构成要素之间的互相配合、合成与生成,侧重于社会有机体的功能及其发挥,亦即侧重于社会发展动力的生成机制和合成过程。社会发展动力植根于社会的生命活动中,社会的生命活动就是社会的新陈代谢,贯穿于社会总体运行过程。社会总体运行是两种统一的总合:一是物质、信息、能量在社会有机体内外部交换的统一;二是满足物质生活需要的生产、人口、社会关系再生产的统一。因此,社会发展的动力是通过综合、总和与总合而生成的和合动力,具有自生成性,是自我生成、自我发展进化的过程。

三、社会有机体理论视角下“五大发展理念”新解读

发展的理念是动态的,社会发展动力是社会机体由于社会关系的和谐与良好适应所展现的旺盛生命力和机体活力。从马克思社会有机体思想与生成发展动力视角来审视“五大发展

理念”,“五大发展理念”是有其内在逻辑的,那就是以改革为动力、以协调为要求、以绿色为特征、以开放为条件、以共享为目的。虽然每一部分都自成体系、相对独立,但是它们之间是相互连接、环环相扣、紧密依存、互为条件、互为目的的。因此,只有按照马克思社会有机体与生成发展动力的思想和方法论要求,才能很好地理解“五大发展理念”的内涵、要求和实现途径,才能实现新常态下我国经济社会的新发展。

“五大发展理念”强调坚持创新发展,而创新与改革是连在一起的,创新与改革是新常态下实现新发展的动力来源。当前制约我国经济社会发展的因素有很多,仅从经济领域来看,传统的“需求侧”管理模式下的投资、消费、出口“三驾马车”拉动经济增长说在逐渐失去作用,尤其是投资拉动经济增长的成效显著减弱。例如,2015年以来中央银行5次降息降准,发改委新批基建项目规模超过2万亿元,但投资依然萎靡,这表明“需求侧”管理增强经济增长的动力模式正在失去作用。一方面,需求旺盛,国民海外购物热浪一浪高过一浪;另一方面,我国产能过剩,产品库存积压严重,国有企业效率低下、缺乏活力、腐败严重、国有资产流失惊人、公有资产私利化、国资被一些国企“硕鼠”淘蚀等,国民经济结构转型艰难,经济下行压力增大。这表明当前阻碍我国经济增长的一大障碍来自于“供给侧”的错配、低效与无效,来自于社会生产全要素的生产效率不高。要改变这一状况,我们就必须通过“供给侧”结构性改革来实现“供给”和“需求”的双侧拉动,以推动经济增长。在马克思社会有机体与生成发展动力视角下,坚持改革发展,就要通过改革的手段与方式来改变社会有机体中的各种结构僵化与利益固化的社会关系,由此形成和谐关系,然后和合生成社会良性运行与协调发展的动力。

“五大发展理念”强调协调发展,不仅要实

现城乡协调发展,还要实现区域协调发展。要实现城乡协调发展,就要建立健全城乡一体化机制,注重城市反哺农村,在加快推进城镇化建设的同时推进新农村建设,使城市有城市的强项,农村有农村的优势,实现两者互补互动、相互促进、共同发展。要促进区域协调发展,就要通过国家政策扶持、地区援助等形式,形成中西部落后地区的跨越式发展的体制机制。促进协调发展还要坚持物质文明、精神文明、政治文明、社会文明、生态文明的联动发展,这是我国实现协调发展的重要内容。基于马克思社会有机体与生成发展动力视角,协调发展就是要把把握中国特色社会主义事业的总体布局,正确处理发展中的重大关系,在实现协调发展中形成社会发展动力。当前我国要实现协调发展,关键在于要增强强项,补差项、弱项、缺项、短板,以此实现社会有机体的结构、功能的协调。

“五大发展理念”强调绿色发展,这就要求我们必须坚持以尊重自然生态规律、保护生态环境为前提的可持续发展的发展观^[4],走保护生态、可持续增长的发展之路^[5]。在粗放式发展模式下,我国所取得的发展成就是以资源大量消耗、破坏生态、污染环境为代价的,这是造成我国当前生态环境严峻形势的根本原因。少数企业无视法制、道德沦丧更是加重了这一情况。这种发展方式及其所造成的生态环保灾难,已经严重破坏了社会良性运行与协调发展的要素关系,正越来越造成各种关系的不和谐,导致社会机体的病态,影响社会进一步持续健康发展。而基于社会有机体与生成发展动力视角,坚持绿色发展就要实现人类发展与自然资源和生态环境相适应、相协调,坚持增长和发展以自然、资源、生态、环境承载能力为限度,实现“天人合一”的和谐发展。人类社会的发展依赖于自然生态环境,依赖于从自然界中获取生产和生活资源,如果人类社会活动造成自然生态

环境破坏,就会导致自然生态环境与人类社会之间关系的恶化,带来灾难性后果。因此我们必须走绿色发展的道路。

“五大发展理念”强调开放发展,这就要求我们必须通过对内和对外开放,充分利用国内和国外两种资源,实现自身更好发展。通过对外开放,以积极的和海纳百川的胸怀主动融入世界,充分吸收和大胆借鉴一切人类优秀文明成果,顺应世界发展潮流和趋势,使我们自身发展与世界发展紧密相连、相互促进。全球化时代,世界上的每一个国家都会因为科技快速发展与进步的巨大推动、经济与生产上的相互依存、人员交往流动的频繁、文化与文明的交融等多种因素,卷入全球化的浪潮之中,成为全球化的一部分,整个世界越来越成为一个超大的社会有机体。全球化时代,任何国家的发展都不可能离开人类文明大道而独自前行,中国近代闭关锁国政策造成落后被动挨打的教训已经充分证明了这一点。坚持开放发展也包括对内开放,这是充分利用和盘活国内资源、提高全要素生产率的必要条件。在社会有机体与生成发展动力视角下,坚持对内和对外开放是形成我国发展所需要的全面、丰富、和谐关系的条件,是社会作为一个有机体的必然要求。

“五大发展理念”强调共享发展,这是发展的最终目的和落脚点。坚持共享发展,就是要更加注重人民群众分享发展成果、更加注重发展为人的目的^[6]。只有共享,才能使人民群众真正得到现实的利益,享受发展带来的实惠;只有共享,才能激发和保护人民群众的创造性与积极性,持续地为社会发展提供动力源泉。社会发展出现两极分化,就会形成社会关系的对立和分裂,甚至会导致社会发展的倒退。因此,我们要从解决人民群众最关心、最直接的利益问题入手,以解决好民生问题为抓手,在兼顾效率中突出社会公平,实现全体人民共同迈

入小康社会的目标。正如习近平总书记所指出的：“让老百姓过上好日子是我们一切工作的出发点和落脚点。”^[7]实现共享发展的关键和重点在于对低收入群体、困难群体进行兜底保障,既要保障每个人的基本生存和生活,又要防止福利养懒。同时,要着力培育和壮大中产阶层,发挥其社会稳定器的作用。在社会有机体与生成发展动力视角下,只有实现了共享才能实现利益的和谐,这是和谐关系的根本和基础。和谐关系是社会协调发展、良性运行、富有活力的前提和基础,共享是通过利益的协调来实现的。所以,坚持共享发展就要通过分享发展成果来实现。

“五大发展理念”是我国经济进入新常态后引领和指导我国“十三五”规划的发展理念。从社会有机体与生成发展动力视角来看,坚持“五大发展理念”是实现我国经济社会快速、协调、可持续发展的保证和条件。

参考文献:

- [1] 马克思,恩格斯.马克思恩格斯选集:第1卷[C].北京:人民出版社,1995:143.
- [2] 马克思,恩格斯.马克思恩格斯全集:第46卷(上)[C].北京:人民出版社,1979:220.
- [3] 马克思,恩格斯.马克思恩格斯选集:第4卷[C].北京:人民出版社,1995:532.
- [4] 李本松.论习近平绿色化思想的方法论[J].邓小平研究,2017(1):120.
- [5] 李本松.绿色化的经济学向度[J].理论视野,2015(6):25.
- [6] 李本松.论新常态下“包容性增长”的价值考量和世界历史意义[J].江汉论坛,2015(3):79.
- [7] 中共中央宣传部.习近平总书记系列重要讲话读本[C].北京:学习出版社,人民出版社,2016:213.



引用格式:张羽,马兰兰. 孟子的道统建构论及其对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建设的启示[J]. 郑州轻工业学院学报(社会科学版),2017,18(2):27-32.

中图分类号: 文献标识码:A

DOI:10.3969/j.issn.1009-3729.2017.02.005

文章编号:1009-3729(2017)02-0027-06

孟子的道统建构论及其 对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建设的启示

Confucian orthodoxy of Mencius and its enlightenment of constructing the view of socialist core values

张羽¹, 马兰兰²

ZHANG Yu, MA Lan-Lan

1. 大理大学 马克思主义学院, 云南 大理 671000;
2. 河北大学 政法学院, 河北 保定 071002

摘要:儒家道统传承中,人以德为圣,理以道为尊。以性善论推导王道,并以道为治理国家的至高原则,期望以道统约束政统,使王权按照儒家之道有序运行,这是孟子对儒家道统的建构之功。孟子的道统建构论对践行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具有重要启示:一是可以借鉴孟子重视主体心性的道德修养工夫,发掘主体自身的自觉与自愿力量,从而达成对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的真心认同;二是从孟子以民为本旧传统中开掘社会主义新民主,从传统社会以仁心推仁政的理路开启社会主义“新王道”,使国家真正担当起国家富强、人民安居的道义责任。

关键词:

孟子;
道统;
王道;
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

收稿日期:2016-11-02

基金项目:2016年度全国学校共青团研究课题(2016LX016)

作者简介:张羽(1992—),女,黑龙江省穆稜市人,大理大学硕士研究生,主要研究方向为:学校德育教育;马兰兰(1988—),女,河北省廊坊市人,河北大学博士研究生,主要研究方向为:中国哲学。

“道”的概念虽并非儒家首提和独有,但“道统”是儒家独有的道学传承谱系。所谓“道统”,是指儒家以圣人之道为核心内容,围绕载道、传道和明道的文化使命而建构、发展与演变的思想传授系统。儒家的道统上可追溯到尧舜圣王,经过文王行德政与周公制礼乐,再到孔子提出仁道,孟子继承孔子仁道并进一步将其发展成仁政论与王道说,建构了一个较为完整的思想体系。作为战国时期儒家代表人物,孟子不仅远承尧舜之道,近接周孔仁德,而且确立道尊于势,贯通心性与天道,以心性之学开启后世。孟子的道统建构论虽有其局限性,但对于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建设有重要启示和参考价值。

一、政道分离:孟子道统建构的时代背景

自三代至西周,道统与政统彼此合一、相互关照,官师治教合于一,王道载于,道王一体,诸如黄帝、尧、舜、禹、汤、文、武即是。春秋以降,道统与政统逐渐成为两个不同性质特征的运行系统,现实中诸侯假力而霸,道与王独立而存,士志于道而权势在君王。儒家将弃道而独存的诸侯以力割据的现象称为天下无道,在“道术将为天下裂”之际,诸子百家各持己道,各自为还道于天下而争鸣。孟子身处战国之时,七雄并立,战争频仍,礼乐隳毁愈加彻底,周室权威几乎荡而不存;与此同时,诸子各持己道,是己而非人。为了使诸侯君主重回圣君施王道,为了捍卫先王圣道而止“邪说暴行”,孟子高扬道尊于势的道统意识,与诸侯君主所代表的政统形成分庭抗礼之势。

1. “好辩”以拨乱反正

战国时期,诸子之中儒家并非最具辩才的学派,名家辩言远在其上。在名实概念分析方

面,惠施或公孙龙更具逻辑技巧,而孟子并不以争辩而胜人之口为能事,却以善辩形式来履行儒者批判社会、反思现实、建构价值的道学使命。可惜的是,时人只看到孟子好辩的表象,却多不能领会他以有道理想批无道现实的文化使命。孟子自居圣人之徒,能言距杨墨者,以“欲正人心,息邪说,距诐行,放淫辞,以承三圣”^{[1]155}为使命,欲拨乱以反其正,使天下重回三代盛世。

对孟子而言,建构道统与善辩以言其志这二者具有内在统一性。首先,与告子辩性善以明成圣根据。孟子以杞柳栝椹为喻驳斥告子仁内义外之说,并以人生而即有爱亲敬长之心和恻隐之心论证良心人皆有之,进一步界定人心先验本有的良心善端为性,以此否定告子生之谓性的论点。孟子不同意告子在人生而即有的自然属性层面界定“性”的概念,而是超越生理本能以人之为人的道德意识为人性本质,进而将其扩充为仁义礼智之君子四德。孟子的良心性善上援天道为形上根据,成为道德内烁己心而君子自律自反不证自明的前提。这不仅为孔子为仁由己式的道德修为找到了依据,而且以仁义界定心性与人道,为其息邪说、拒杨墨提供了理论注脚。

其次,拒杨朱而止邪说暴行。孟子将道德意识看做人之所以为人的根本特质,并在此前提下对“性善”进行价值判断,认为仁义礼智既然为人所特有、作为人之所以异于禽兽的根本区别,理应成为人人自觉践行的道德要求。五伦八德作为规范君臣、父子、夫妇等关系的人伦之道,依于性而顺乎情。舜王明于庶物,察于人伦,皆是由仁义行,而墨翟兼爱的无君无父之论有悖人情正道,与禽兽无异,会使天下人心有失伦常之义。

再次,与国君辩王霸以言王道理想。孟子

认为,“亲亲而仁民,仁民而爱物”^{[1]322},对于血缘之亲与百姓之仁乃至禽兽草木之爱惜的层次与差等,是由其仁爱对象本身的差异自然产生的,这本是顺其自然的合理性与正当性。孟子进一步将这种有次序分别之仁爱提升为君主行仁政的核心理念。孟子向梁惠王辩明“未有仁而遗其亲者,未有义而后其君者”^{[1]1},上下交征利则国危,以君主先行仁义而后全其利向君主申明,争城掠地式的称霸无异于率兽食人。孟子告诫齐宣王,王者之乐应当与民同乐,君主以民与天下之忧喜视若己之忧喜,以不忍之心推仁政,天下之人必会翘首以迎王师犹如久旱而盼时雨,从而王道行而天下归服。

2. 诸侯争霸的现实使孟子的王道理想遇冷

孟子之时,天下无道愈甚,七雄并争,诸侯国君多热衷齐桓晋文之事。魏用吴起使魏武卒无敌于天下,魏霸西河近百年;齐以孙子兵策与国交战,使诸侯东面朝齐;秦以商君之法而富国强兵,迫使五国联合以抗强秦。天下方务于合纵连横,大揽强国之士,孟子以圣人之门羞言管晏事,乃与国君述三代圣德,欲说君主行王道,而诸侯皆以为其迂阔终不肯用。

就战国大争气力的现实而言,孟子崇尚仁义之志实乃不合时宜。孟子期望以不忍之心启发君主道德意识,以圣贤人格范导君主作为,甚至以仁者无敌的必胜信念激励国君行王道,然而终究被国君认为其迂阔而远于事情,大而无用。孟子是一位心怀道德理想且具有批判精神的儒者,他并非不明白,诸侯君主首要谋略的是天下诸国政治格局的变动、土地疆界、人口赋税等诸多关键事宜,绝非仁义理想一般简单纯粹。但是社会无序、民生疾苦、战争残酷等诸多不合理现象,始终促使着孟子坚守对政治失道与价值失当的批判立场。

然而,即使君主能行“五亩之宅,树之以

桑”^{[1]5}的王道之始,仁君圣主的美名对于攻城掠地的虎狼之军并无任何抵抗力量,春雨润物般的道德教化终究抵挡不住来势汹汹的攻伐军队。天下皆为急功近利而熙熙攘攘,诸侯皆以兵强马壮为武力威慑而行逐鹿问鼎之事。在此情况下,孟子对君主所言的三代盛德、仁义教化或与民同乐的王道理想,对有志于争霸天下的诸侯君主来讲,也只得顾左右而言他。孟子虽面临王道不行于当世、遭受诸侯国君冷遇的现实困境,但这并不能抹杀其王道设想对于儒家道统理论建构中承前启后的学理价值与思想意义。

二、政道合一:孟子道统建构的王道理想

面对势炽道衰的社会现实,孟子心怀“圣而王”的理想主张,坚持以“道”论“势”的价值原则,致力于使儒家道统与现实政统之间相得益彰,即儒家之道行于世,而政治之君泽加于民,此谓孟子主张君主以仁心推仁政的王道理想的真正落实。孟子不仅致力于有德者必有位的王道追求,更是着眼于有位者无德的现实状况,高扬道尊于势的价值原则,力图匡扶君主失德之弊,以承担致君尧舜、淳化风俗的使命感与责任感而践行王道。

1. 有德者必有位的理想状态

在儒家道统中,自上古三代至商周,政道合一,有德者居高位,君主既是国家执政者,还是道德教化者,善政与美俗定于一。因此,圣人居王位以施仁政,自然就成为儒家道统建构的政治理想。春秋以降,政道分离,仁德不再是衡量人主居君位的必要标准,诸侯各行其是,国君掌控国家政权,文化士人负责社会教化。于是,儒家道统传承谱系中孔子作为有德无位的圣人始列其中,而此后再无现实君主能位于其间。战

国之时,天下愈加无序,诸侯肆意妄为,孟子期望以圣人之道范导君主执政,凭借尊道崇德对现实政权给予价值规范,尽力使王有圣德、政以道尊。

孟子生世之大弊,承道之至衰,作为儒家道统中的承启环节,而欲救人心、息邪说、拒谀行,续存先王之道而不绝;当强势凌弱之理横行于世,孟子绍述尧舜之德,黜霸功而崇王道,后世称其功不在禹下。孟子建功于道统见其后世,在于提出本于内圣而开启外王的王道理想。王道理想以仁心为本,强调有德者应配其位,有位者应配其德。君主正人先正己,自身垂范,然后善推其所为,推恩以保四海,以全己之心而全民之老幼,薄赋省刑,治民之产,申孝悌之义。此外,君主修圣德、行王道还需以民为本。民心作为衡量君主圣德的根本标准,是孟子王道理论的题中之义,因为“天视自我民视,天听自我民听”^{[1]219}。在民、社稷与君主的价值次序上,民居首位。孟子坚信“得乎丘民为天子”^{[1]328},若为君者德行不修,荒淫无道,无视百姓疾苦,那么有人效汤武放伐诛就是顺天应民的正义之举。

2. 使有位者尚德的现实努力

在儒家道统中,孟子对后世的影响仅次于孔子。针对圣与王并立而行的现实,孟子一方面以行王道遂其志劝说诸侯君主,另一方面又以有道伐无道的批判态度警戒居君位而无君德的现实君主。

孟子认为,为臣者要有臣德,为君者亦要有君德,君臣双方权利义务相对而存在,“欲为君,尽君道;欲为臣,尽臣道”^{[1]165}。孟子在继承孔子君君臣臣主张的同时,又对君臣双方的义务做出界定。孟子认为,君臣各尽其道皆是法尧舜之举;反之,“不以舜之所以事尧事君,不敬其君者也;不以尧之所以治民,贼其民者

也”^{[1]165}。这不仅强调君臣双方对等关系的条件性与原则性,而且也对国君不修君德、专苛臣民、宽己严人的无理行为进行了道义限制。如果君主无视为臣者屡谏而不予采纳,孔子的态度是为臣者“以道事君,不可则止”^[2]。孟子对“君有大过则谏,反复之而不听”^{[1]251}的情况,区分贵戚之卿或异性之卿,认为前者会易君位,后者则会弃官去职。至于臣事君的态度,则视君主个人德性及其对臣者的态度具体而定,“君之视臣如手足,则臣视君如腹心;君之视臣如犬马,则臣视君如国人;君之视臣如土芥,则臣视君如寇仇”^{[1]186}。孔子早有君以礼使臣而臣以忠事君的主张,孟子对此作了进一步发挥,更为深入而具体地分析了君行其是而臣事之从权的正反相对的不同情况。从孟子对君主的态度可知,君权并非无原则的无限扩大,君德也并非不受任何限制,若小德不修,从谏改之则可;若大德有亏,行有损其国家与百姓利益之举,社稷之臣应该“抗君之命,反君之事”^[3]。

3. 道尊于势的制衡原则

孟子对君臣关系作了对等性规定,认为臣之所以能够与君分庭抗礼,是因为臣事君以道为最高原则。道统与政统的分离虽导致君主权势与圣王之道并立存在,然而在有德者与有位者之间,儒家坚持以道为尊占据了道义制高点,而现实君主虽得位却并非合道。可见,先秦儒家始终坚持道高于君、德尊于位。

孟子认为士应当志道据德,作为文化价值主体与君王保持师、友或臣的关系言理论道,按照自己的价值观念视听言动,并非屈服于象征政治主体的君主个人。如果君主不能依道而行,抑或是君主有不合道义的行为,面临道之不行、士处穷困的处境,子思认为与其屈己以要富贵,不如抗志而处贫贱,因为“屈己则制于人,抗志则不愧于道”^[4]。天下诸侯若能使道

伸于世,自然是儒家所愿,但如果需要士人为此降志而屈、枉道从君,这绝对为儒家所不能接受。孟子认为,担负行道使命的士阶层断不能为悦君而沦为被君主挥呼来去的奴仆。孟子将公卿大夫的官阶称作“人爵”,将忠信仁义之道德称为“天爵”,并认为天爵高于人爵,道义价值高于官阶地位。通过评判二者的价值轻重,孟子认为修天爵自能统摄人爵,而要人爵弃天爵则绝非士所当为。士之受人尊重,其根本在于以身载道,载道之士在处理道与君的关系时自当重道而轻势。坚持以道驭势原则使君主屈己而从道重德,是孟子致力实现的理想政治状态。此后,道统辖摄政统,现实政权以道为价值依据确立运行,一直成为后世历史上儒家道统中的价值准则。

三、返本开新:孟子道统建构论对践行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的启示

君子作为主体自觉与自我完善的一种修为目标,其存在的价值依据与终极追求何以可能?孟子以人性善作为君子人格的重要理论前提,重视反求诸己式的主体自觉在君子人格修中的作用。爱国、敬业、诚信、友善是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在个人层面的要求,如何让社会上每一主体都能做到道德意识觉醒,提升道德理性认知,儒家君子人格修为目标和孟子重视主体自觉的道德意识为其提供了有益借鉴。

1. 以孟子重视主体心性涵养激发社会主义公民主体性的自觉发挥

孟子重视主体心性的道德修养工夫可资借鉴。孟子注重主体心理情感,强调主体道德行为的内在动机,区分“由仁义行”而“非行仁义”。道德是主体行为的目的,而不是作为谋取其他功利目的的工具或手段。注重主体道德行为的自觉自愿,不仅体现了孟子的仁道原则,

同时也是其对主体力量的确证,他强调主体行为在情感上的自觉自愿。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贯彻以人为本的根本理念,情系民用,利为民谋,在公民层面提出爱国、敬业、诚信、友善,这是从根本价值上与公民利益相互契合的基本价值。公民对自己祖国的热爱是一种血浓于水的心理寄托与情感依赖,敬业、诚信与友善不仅涉及公民自身,还关涉到个人与他人、个人与所从事行业的群己关系的价值选择与行为取舍,主体诚心于内方能使人信己于外,将自己愿得他人友善相待之心推及他人。可见,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是以国家作出规定的外在形式,表达出公民个人的自觉意愿,其目的是启发与引导公民个人主体性自觉,使公民遵守规定于外但诚意于内心的基本价值公约。在当代中国,倡导践行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理应从主体自身寻求内在心性根据,发掘主体自身的自觉与自愿力量,从而达成对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的真心认同。

2. 从孟子以民为本旧传统中开掘社会主义新民主,从传统社会以仁心推仁政的理路开启社会主义“新王道”

孟子道统建构作为先秦儒家孔子之后的关键环节,其最重要之处便是提出“民贵君轻”的价值判断,以及倡导君主“以不忍人之心推不忍人之政”的王道理论。但是孟子忽略了一点,正处战乱时局、诸侯争霸之际,君主大多认为孟子的“仁政”迂阔而不切实际,不愿按照孟子建议而此般作为。退一步讲,即使有君主愿意一试,但是社会时局与政治体制也未提供实行“仁政”的外部环境。然而,孟子对王道理想的批判与超越的价值却未过时,对于今天建设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而言,孟子的民本思想与王道理想依旧可资借鉴。

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在国家与社会层面提

出的相关价值要求,表达出国家富强、社会民主、依法治国的文明理念,不仅是对先秦儒家民本思想合理因素的继承与发掘,而且根据时代要求进行了创造性的转化。中国传统社会,对于责任与义务的承担主体并未作出明确界定与区分,因此,孟子将王道理想的实现寄托于统治者一人之身,不免落于空想。但是,在现代国家理念中,国家作为承担相关责任、尽其应尽义务并且享有相关权力的独立主体,是有能力且有义务发挥其自觉担当起国家富强、人民安居的道义责任的。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在社会层面倡导的相关价值理念,使主体意志自由与人格平等的实现延伸至社会领域,于是社会作为公共领域便成为公民社会性发挥、公民社会价值和自我价值实现的场所,其相关权力的实现便得到了相关法律与制度的保障。如此一来,和谐社会与依法治国便能从理想变为现实。

四、结语

孟子所建构的以内圣启外王的王道理路,为后世儒家批判君权、以伸民本提供了理论依据。孟子在儒家道统中既往圣而开后学的承启之功,主要着眼于平治天下的社会批判与政治

作为。但“(一千五百年来)其间尧、舜、三王、周公、孔子所传之道,未尝一日得行于天地之间”(朱熹)^[5]。后世君主多是冒圣贤之名而行盗跖之事,随着专制君权的加强,官僚群体说理论道对君权的监督与批判似有实无。孟子对主体人格的培养与尊重,对民贵君轻的议论,以及对王道理想的价值提倡,虽然在当时及后世传统专制社会环境下不曾实现,但其批判与超越的价值理念,对于今天我们践行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建设社会主义和谐社会、实现依法治国,依然具有借鉴价值。

参考文献:

- [1] 杨伯峻. 孟子译注[M]. 北京:中华书局,1988.
- [2] 杨伯峻. 论语译注[M]. 北京:中华书局,1980:124.
- [3] 王先谦. 荀子集解[M]. 北京:中华书局,1988:250.
- [4] 王钧林等译注. 孔丛子卷十·抗志[M]. 北京:中华书局,2009:124.
- [5] 朱熹. 晦庵先生文集卷三六·答陈同甫书[M]. 北京:北京图书馆出版社,2004.



引用格式:苏丽珍,陈鹏.传统儒家“即世”而“超世”境界理论的历史流变[J].郑州轻工业学院学报(社会科学版),2017,18(2):33-39.

中图分类号:B222 文献标识码:A

DOI:10.3969/j.issn.1009-3729.2017.02.006

文章编号:1009-3729(2017)02-0033-07

传统儒家“即世”而“超世”境界理论的历史流变

The historical evolution of state theory of mundane and supramundane world of traditional confucianism

苏丽珍¹, 陈鹏²

SU Li-zhen, CHEN Peng

1. 大理大学 马克思主义学院, 云南 大理 671000;

2. 河北金融学院 社科部, 河北 保定 071051

摘要:先秦儒家思想是关照人的生活与生命的文化,此生生之道以人性为存在依据,通过伦常日用而逐步展开人之为人的过程,确立人生价值选择的标准,提升人的道德境界。孔子于“即世”之乐中以体仁,孟子通过尽心知性以体“超世”,宋明儒者在日用即道中得圣贤气象。从先秦儒家孔孟知命乐天,到宋明儒学诸子体悟天道至诚与大公,儒家通过辨析人道良心与性理,不断地将儒家道德精神深度开掘,及至晚明后期,在王阳明以心学改造传统道学的思想运动中,“境界”概念成为思想家对主体真性情与自由精神的价值追求。历代儒家学者将先圣缅怀与国故情思、时局动荡与个人遭际诉诸文思哲理,以境界提挈思想,将境界拓宽到人生意义与文化义理层面,提升至个人主体人格的精神修为,随之,人世关切与生命关怀的价值命题便在境界视野中得到深层开掘。

关键词:

传统儒家;
道德;
圣贤;
境界理论

收稿日期:2016-11-28

基金项目:2016年度全国学校共青团研究课题(2016LX016)

作者简介:苏丽珍(1990—),女,福建省漳州市人,大理大学硕士研究生,主要研究方向:马克思主义中国化与中国传统文化;陈鹏(1980—),男,河北省沧州市人,河北金融学院副教授,博士,主要研究方向:中国哲学。

儒家以关照主体生活与生命为主旨,提出了曾点气象、居仁由义、孔颜之乐、内圣外王之道等一系列思想,由此确立了别具一格的境界理论。儒家立足于人伦日用以“即世”使命感关怀生命价值,同时并不囿于现实俗务,在道中庸中体悟极高明的“超世”情怀,在现实与理想之间若即若离,努力实现“即世”而“超世”的独特境界。在境界语境下对传统儒家思想进行探讨,一方面可以揭示中国传统文化的价值理性,另一方面也可阐释儒家学者对仁、义、圣的崇高人格追求。本文拟通过阐述传统儒家“即世”而“超世”境界理论的历史流变过程,以明辨传统儒家对主体人格境界一以贯之的理想追求:以天道为本体立论人性善恶;通过变化气质以道德涵养功夫体察生命;经由穷究天人关系之途最终达到人生与天地境界的合一。

一、孔子于“即世”之乐中以体仁

相对于西方的罪感文化或日本的耻感文化,中国儒家文化的特质则是“乐感文化”^[1]。李泽厚认为,儒家文化的乐感性,关键就在于其对此世间的把握,即不设定脱离人世间的彼岸世界,以实用理性为思维方式来把握情感本体,于日常人伦中追求人生归宿。因此,儒家往往通过提升自身境界或精神修养把握人生之乐,追求君子乐道之仁。以乐见仁在孔子那里体现得非常明显,《论语》中曾多次提到君子之乐。《论语》首章前三句便涉及到儒家教人为学、交友、处事的乐观心态。孔子认为,经常习行自己所学,与远道而来的朋友相见,抑或与人相处,人虽不知却见君子,自己心中有所洞见,从而收获生活之乐,并于此世俗平凡中剥去肤浅而见伟大。那么,孔子究竟教人所学何事、所习何道、遇良友所得何益,又为何人不知而不患却从中得见君子之德?孔子教人所学者,是学做人,与求道,其标准是成君子,君子以求仁道。至于

习行所学之道、与朋友论修道涵养,更是浸透着怡然自得的心境追求。快乐既是一个求道过程,同时也是得道之精神所在。正因如此,即使面对道之不行而不被人理解的困窘之境,儒家也不会自感颓败、也不会自降道之高远,因此得见君子乐道境界。

孔子以乐感文化为支撑而求君子仁道之境界,除了为学与交友之外,还通过践行礼乐与乐天知命而展开。在孔子看来,周公通过制礼作乐成就了周的绚丽文明。他以复兴周礼为己任,将仁之本质赋予礼乐之中。礼与乐不仅仅是玉帛与钟鼓这些流于表面的形式规定,更代表着内在于人的本质之“仁”之规定。孔子认为,个人从仁心出发而做出的行为,不仅体现人的自由意志,而且也符合社会伦理原则的规定。也就是说,外在形式之礼与内在本质之仁相互贯通,人正是通过自律自觉做到克己,从而使视听言动皆合于礼,最终实现天下归仁。在孔子看来,克己复礼归仁并非一个刚刻严毅的苦行过程,而是一种内心从容、心安理得的乐感体验,正是这种乐节礼乐的“夫子之道”造就了儒家坦荡的君子胸怀。人有了这种胸怀,就不会因眼前的穷通荣辱而患得患失,而是视功名利禄如烟云,衣食锦玉之时不以为意,缁袍敝衣时不降其志,贫而无谄,富而不骄,以里仁为美者,方可以长处乐。孔子以君子比德于玉,以山水之乐比附君子仁厚的道德修养。此外,孔子对君子道德修养的要求还体现在力求尽善尽美的正乐过程中。与西方审美追求“真”与“美”不同,中国儒家审美境界力求达到“美”与“善”的统一。孔子盛赞《韶》尽善尽美,听闻《韶》乐,陶醉其中而三月不识肉味,厌恶《郑》声乱雅乐,且志愿以礼乐治天下并躬行实践,于是从卫返鲁,使乐正,“《雅》《颂》各得其所”^[2]。何谓乐之正?在孔子看来,理想的礼乐制度既表现为以礼约人,同时还表现为以乐成人;礼要求人

严谨以待,乐使人享中和之美。孔子认为,人若成人以达到仁者境界,需要不断进行道德修养,这个过程即学诗以言、学礼以立、成人于乐,人之为人,最终进于礼乐的君子会在中和之乐中达到美与善统一的仁者之境。

总之,孔子的仁者之乐关注此世间而又不陷溺于此世间,总能于俗物庸常间显示其不凡境界,这种精神境界源于对仁道的坚守与不懈追求。这种仁道操守于君子而言,是一种以仁为己任、死而后已的道义担当。在这方面,孔子为后人做出了很好的榜样。他学道、乐道,其志在于无关富贵、乐天知命的君子之德,使其不惧桓魁之困、不屈阳虎之畏,即使在厄于陈、蔡之际,依然弦歌不辍,此为懂得穷通之道皆由天命时运因而遇难不惧的仁人之大勇。而知天命的君子不会因个人穷通荣辱甚至是生死而戚戚,道之将行与废得见天命而无损君子之乐。孔子的仁者之乐境在社会维度中展示开来则表现为“与点之乐”,这既是孔子作为仁者的个人志向,也是其安老怀少的天下情怀。曾皙的理想是天人同乐、社会和谐,孔子对此喟然而叹,深表认同。“与点之乐”表达一种天地同流、万物并生的仁者气象,代表了孔子所追求的同天之乐的最高境界。

二、孟子通过尽心知性以体“超世”

按照现代新儒家冯友兰先生的人生四境界理论,儒家的圣贤君子如孔子是处于道德境界中的人,而处于天地最高境界中的人在中国历史上只有老子和孟子。孟子的精神境界何以能超越道德直至上下与天地齐之境?叶朗先生认为,孟子的审美思想主要体现在人格美与养气说。对此,我们可以将其理解为孟子其人精神修养所至之天地境界,这种境界正是主要通过养气等道德涵养工夫所达到的理想人格与终极价值追求。孟子对理想人格的设定,是以人性

的应然状态为出发点的。在他看来,仁义礼智自有其天然善端,作为人皆有之的先验道德意识,为人之为善的实然状态提供了可能性,并为进一步成就自己仁义礼智的道德行为提供了先天根据。但是先验善端并非指人性本善,先验道德并不意味着就是实存的现实道德行为。惟其如此,孟子突出强调道德修养工夫的必要性和重要性,这种修养工夫的核心就是存养良心本心。在孟子看来,人由于受到外物环境与物欲的影响,其良心善性会遭物欲陷溺而被放下,因此,良心善端需要时时扩充涵养,将所放失之心重新求回。扩充和涵养的道德工夫离不开居仁由义、知言养气、切身自反、心无愧怍这四个原则。与孔子坚持仁礼并重、尚中和之道有所不同,孟子居仁由义且多浩然之气,认为“仁,人之安宅;义,人之正路也”^[3]。仁义因此成为孟子教人把握众善的出发点与判断是非的根本标准。

另外,孟子强调,“由仁义行”是一种自觉自愿的道德行为,是道德行为的自由选择,是一种道德理性自觉,而不是迫于外在压力,也并非出于某种功利动机。培养此种精神境界的方法就是知言与养气。所谓知言,是指培养道德意识的自觉性,对错误的道德言论或观念形成自觉的批判性;所谓养气,是指通过道德修养与意志磨练所呈现出来的一种精神修养状态。至于这种气的具体形态,孟子虽曰“善养”,但也承认难言也。这种气既然是一种精神状态,自然与勇气或士气有所相通。很显然,浩然之气已经超越世俗的道德价值,而是“塞于天地之间”,关系到人与天地和宇宙的关系,因而体现一种超验的道德价值,即人与天地万物相感通而超越具体形骸与天地同流之气。孟子将养浩然之气的方法归结为“配义与道”即“知道”,知晓提升精神境界的道;还需“集义”即自觉存养内心之仁并外化于义。如果一个人能够“知

道”并长期行仁义,那么浩然之气就会自然而然地产生;若内心生成这般天地正气,那么人就不仅自觉到自己是社会中的公民,还会自觉到自己是宇宙中的天民,由此觉察到自己在天地宇宙间的担当,那么他的精神境界便是天地境界。

儒家认为“天道远,人道迩”,在将极高明的天道确立为提升精神境界的终极价值追求之后,通过反求诸己的方式诉诸道德主体自身,并依靠道德理性的自律达到心无愧怍的精神状态。于是,孟子便将心、性与天地勾连,从而确立人之安身立命的根据。在孟子看来,主体人心和道德理性与天地宇宙一体贯通,人道来自天道,通过切身自反,反省道德主体之心,人不仅可以知良知之性,还可以知绝对价值之天,从而超越作为感性主体,与道德主体的自我实现天人合一。

在先秦儒家看来,人与天地本就是一个生气和谐的整体,人与天地万物之间本就不是对象性的主客二分的关系,这就为中国儒家凭借圆融整体性的直接体悟,将尚中和的天人合一作为最高境界的理想追求奠定了思想前提。以此为根据,儒家不仅有把握身、心情理关系的慎独之道,有维护人与人之间伦理结构的道德修养,还有关照人与宇宙关系的天人之道。儒家的精神涵养工夫不仅需要修己安人、继善成性,还需要克明峻德、开务成物,最终达到“穷理尽性以至于命”的天地境界。

三、宋明儒者在日用即道中得圣贤气象

及至宋,儒释道三教会融,理学由此诞生。理学以儒家道德人本主义和道德理想主义为价值内核,批判吸收佛与道的哲学思辨命题与精神修养方法,更加注重建构形上本体的抽象思辨性,提升理想人格境界,以此为社会提供一个

安身立命的意义世界。理学的精神修养方法和圣人人格境界的提升,与释家之佛学尤其是禅宗影响密切关联。

冯友兰将禅宗界定为静默的哲学,认为静默体现了禅宗的基本特征,禅宗六祖慧能将空宗体无的境界奉为第一义即不可说。^[4]因为对于“无”什么也不能说,如果强行将其定义为“什么”,这就给了它一种限制,用禅宗自己的话就是“落了言筌”。因此,禅宗便以静默表示“无”。既然禅宗以“无”为第一义,为了达到这种无知之知,禅宗采取的最好修行方法便是不刻意做任何修行,因为一切有修之修,便是有心的作为,而一旦用心便会着相,就会限制于某一有限而不会达到绝对与大全。担水挑柴,穿衣吃饭,并未修行的俗世人在做,依此修行的禅师们也在做,二者之间只是境界不同。扫洒应对极其寻常,但是平常人在做这些事情时不见得完全是无心以应,因而没有任何执着。禅师们强调修行无需另起行为,而只需在日用常行中无心而为,毫无滞障,从而达到一定境界,即抛却有心和努力而修行。这种不修而修的修行是一种修为,它不同于原初状态的自然自在;禅师们最终达到的顿悟见道,也不同于原始自然的混沌与无明,这种与道合一、消解世间一切差别对立的状态,是一种精神上的创造。此番玄妙很难用语言确切形容,如人饮水冷暖自知,也许只有经验者自身与被经验对象冥会合而为一之时,才能真正体会到其中的玄妙之义。禅宗的这些主张,即强调心灵宁静与大人格境界及主静无欲的修为方法,对宋明理学者的精神修为与人格培养乃至圣贤气象的涵养影响甚深。

作为北宋道学奠基者,周敦颐通过《太极图说》提出大化流行的宇宙创生原理,再三置论“天地之大德曰生”,并将“诚”作为贯通主体心性与天道本体的道德形上学依据,思辨地整合了佛老信仰与修为理论,为回应佛老之说而

独创主静、无欲而立人极的精神,并最终为士人寻得一个安身立命的精神境界。在周敦颐看来,孔颜乐处是一个涉及读书人境界与情怀的问题。读书人学做人,应以圣贤人格为理想,而不应以世俗富贵定格人生终极价值。周敦颐说:“天地间有至贵至爱可求异乎彼者,见其大而忘其小焉尔,见其大则心泰,心泰则无不足。”^[5]人生处世,必然要处理经验世界与价值世界的关系问题,对于经验世界而言,处于现实世界之人总会受到来自外部环境具体条件的限制,对于功名富贵这种需要外求的东西,一时取舍得失存在很大程度的偶然性,并不由自己完全掌控,读书人若以世间富贵为人生目的,则不免会为身外之物所累而终究不得自在。价值世界则与之完全不同。精神境界的提升只需诉诸价值主体自身,并不受任何外在于己的限制,人只需反求诸己,向内用心,虔心体道,便会超然物外而自得其乐。周敦颐认为,读书人的胸襟与境界应该超越世俗的有限追求,以世俗富贵为小而以体道者为大,应该见其大而忘其小,“道德有于身”超越有限而追求永恒,从而达到与道合一的精神境界,此实则为孔颜之乐。这一命题之所以被称为理学的精神修养纲领,不仅在于周敦颐借孔颜之乐开启儒家道学致思内圣的精神路向,而且明确了儒家精神境界与人格理想的最高追求。此后,“寻孔颜乐处”成为宋明理学家们的重大人生课题,对“二程”启示尤甚。

程颢与程颐对孔颜乐处自有体会。在程颢看来,孔颜之乐不会如周敦颐所视价值世界是大而经验世界是小,从而在两者之间择大弃小。人总是生存在现实层面而追求终极价值,这种自然与应然的双重属性往往是交织合一,而非对立与分裂。脱离现实条件而追求理想价值不啻于道家的羽化登仙,物而不化;耽于现实富贵而一任精神荒芜,更绝非儒家圣贤之教义。由

此可见,周敦颐教人见其大而忘其小,反倒是张裂了现实世界与价值世界的和合,即使如颜回这般圣贤境界也会在现实中遭遇人所不堪之忧,但是所见道之大、境界之高与现实之忧的张力终究不是周敦颐一个“忘其小”抑或是“道德有与身”所能圆融无间的。按照“二程”的致思理路,孔颜之乐应该不是在权定现实与理想价值的轻重而择重弃轻,而是基于人性情与理的二重性而试图融合二者的张力,努力使情理合一。在宋明理学家看来,天理只有一个,人性乃受之于天命,无善无恶的天命之性只存在一个可能世界即天理中,一旦与现实世界之气杂糅构成现实的人性,即人的气质之性,由于理与气、理与情的糅合,导致价值世界与现实世界的分裂,“人之情各有所蔽,故不能适道,大率在于自私而用智”^[6]。因此,程颢认为,沟通这两个世界需要诉诸变化气质,其方法就是“识仁”与“定性”。对此,程颐也提出持敬与致知的修养工夫:一是“敬以直内”,以诚敬涵养心性,保持心灵平静专一;二是“义以方外”,以进学致知培养道德理性的明觉,通过涵养进学的工夫最终实现内与外的统一。前人对“二程”学问致思风格已有定论,认为程颢温然和气注重体验圣贤气象,程颐治学严谨而长于名理分析。因此,程颢对于儒家“孔颜乐处”的境界命题领悟较深。当仁体呈现时,浑然与物同体,没有内外之分,现实世界和价值世界一体同仁,此仁在天体现在自然时序为春夏秋冬,彰显于天道大德为元亨利贞,下贯于人道则是义礼智信。现实世界的万事万物都蕴涵在价值理想之中,主体内心体验万物一体,并将此万物一体的生命体验以诚敬存之,从而体悟性无内外且浑然无间的“至乐”。所谓“定性”指在识得仁体之后无需刻意用意念把持,而是让万物一体的生命体验自然呈现。如果说“以己合彼”尚有刻意把持痕迹,那么“反身而诚”则完全泯除内外区

别而纯为天然状态,在此天然境界中没有物与我的对立、内与外的区分,人、事、物、我,一切浑然天成。依照“二程”的思路,孔颜之乐就是乐此浑然天成的境界。

张载广涉佛老之书又潜心于六经之道,在本体论与境界说方面扬弃佛老而自成理论。首先,张载认为,佛家本体虚无寂灭,以现实世界为假象,以人生为虚妄,以此观念洞察世界与人生,定不能穷神知化,既不能知人更不能知天。于是,张载在本体论上提出“太虚即气”的气本气化论,揭示了世界存在与变化的根据。至诚不息既是天道必然之理,也是人道所当然之则,人应该本天道而立诚,尊天命而成性,从而进达人生至善之境。对于如何穷理尽性,张载提出心性之辨与变化气质。在他看来,太虚之气清虚湛一,作为先验理性是超验的善,是人之为人的道德形上根据,此为天地之性;太虚之气与气之刚柔清浊的属性结合构成现实的人性,此为气质之性。与天地之性中正至善不同,气质之性因主体对先验道德理性的自觉程度而千差万别,因此,只有克服气质之偏而反于性命之正,才能达到性天合一之境。张载的性气合一论,为道德价值的绝对性及道德修养的必要性作出了完满的解释。张载对人性的照察兼顾人的现实性与理想性,程颐对此评价甚高,“论性不论气,不备;论气不论性,不明”^[7],故张载有功于圣门。张载通过照察人性与变化气质,最终达到大心体物、民胞物与的圣人境界,从而深化了理学对精神生活的追求。超越耳目感官的闻见之知而以心灵自证,从而体悟人并非孤立个体,也不只是社会群体成员,而是天地宇宙的一部分,人的个体生命与气化流行的宇宙生命息息相通,于是就实现了自我超越,从而进入了天地为父母、人类为同胞、万物为朋友的无私无我境界,在这种天人关系中,人与万物皆为天地所覆载。人的道德天性成为主宰天地之间大化流行

的主导力量,人的道德境界大公至诚,人对天地宇宙意会到自己作为天民的责任,对人生社会自然更有一份社会担当与历史使命。张载的大伦理观念,对宇宙整体和人类社会给予了更深沉的道义关怀:为天地立心,为生民立命,为往圣继绝学,为万世开太平。天地本无心,然而人类生命来自宇宙,人心至公便是天地覆载无所私心的彰显,实则赋予天道以终极价值意义,并将此天理与心性相沟通,确立人安身立命的形上根据;人生于父母,长于社会,弘扬孔孟道统、拒斥佛老异端责无旁贷,唯有如此,方能继往圣绝学、开万世太平。张载思想出入佛老而终归儒学,其所自我期许的社会责任与历史使命,正是对传统儒家道德理想主义的性命关怀。

明中后期,王阳明察朱子理学将天理外在于人心的绝对伦理主义和析心与理为二而支离决裂的修养工夫的弊病,扬弃朱子学,将外在天理内化为主体人心,建构起以良知为本体、以致良知为工夫的心性之学,从而将天理与人心有机统一起来。“龙场悟道”使王阳明惊觉天理不在人心之外,于是不厌其烦地确立主体良知的绝对地位,突出主体道德意志自由,从而把握住了确立道德理想人格的主动与自觉。王阳明确立本体良知之所谓“良”,突出了主体之心的道德理性内涵,包含着道德意识与道德意志的真知,不仅剔除了主体之心的私欲和与善相对的恶的成分,而且保证了天理与主体良知的绝对至善性,从而成为人从事道德行为与构建理想人格的本体依据。既然良知与天理直通无间,那么道德修养工夫就极其简易而人人可得,即只需诉诸良心,向内用功致良知而无需外求,这是本体与境界的合一。王阳明早年研习朱子理学,以亭前格竹的工夫学做圣人终究不得,而后于龙场悟道始得真解,于是内心彻悟,游南镇见山中自开自落之花,便知晓花寂花明皆由心生。王阳明认为,若人人潜心致良知而为善去

恶,则道德理想人格由此构建,圣人境界借此达至,外在人为道德规范已内化为内在人心主动自觉,于是,从本体良知出发进行的道德实践,不再是迫于外在天理的被动行为,而是真正体现主体人心的自由行为。王阳明理想道德境界的建构,既合于形而上不证自明的天理,同时又是本心使然,这是主体自觉自愿即意志自由的选择,从而达到本体与工夫乃至境界的内在统一。

四、结语

传统儒家在对人生与人性话题给予历史性哲理思考的同时,将主体个人人格修为提升到存神过化的境界,给予更多的超越性思考。于是,境界理论在儒家关照人生活与生命的内圣外王之道的诸多命题中一以贯之。从先秦儒家孔孟知命乐天,到宋明儒学诸子体悟天道至诚与大公,儒家通过辨析人道良心与性理,不断地将儒家道德精神深度开掘,及至晚明后期,在王阳明以心学改造传统道学的思想运动中,“境界”概念成为思想家对主体真性情与自由精神的价值追求。历代儒家学者将先圣缅怀与国故

情思、时局动荡与个人遭际诉诸文思哲理,以境界提挈思想,将境界拓宽到人生意义与文化义理层面,提升至个人主体人格的精神修为,随之,人世关切与生命关怀的价值命题便在境界视野中得到深层开掘。

参考文献:

- [1] 李泽厚. 论语今读[M]. 天津:天津社会科学院出版社,2007:19.
- [2] 杨伯峻. 论语译注[M]. 北京:中华书局,1980:97.
- [3] 杨伯峻. 孟子译注[M]. 北京:中华书局,1988:102.
- [4] 冯友兰. 中国哲学简史[M]. 北京:北京大学出版社,1996:220.
- [5] 周敦颐. 通书颜子第二十三[M]. 北京:中华书局,1990:31.
- [6] 朱熹. 四书章句集注[M]. 长沙:岳麓书社,1985:460.
- [7] 李振纲. 中国古代哲学史论[M]. 北京: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2004:213.



引用格式:艾昆鹏,徐雅杰.公共资源治理困境与治理模式选择[J].郑州轻工业学院学报(社会科学版),2017,18(2):40-46.

中图分类号: 文献标识码:A

DOI:10.3969/j.issn.1009-3729.2017.02.007

文章编号:1009-3729(2017)02-0040-07

公共资源治理困境与治理模式选择

The dilemma of common resources governance and the choice of governance mode

艾昆鹏, 徐雅杰

AI Kun-peng, XU Ya-jie

河南师范大学 政治与公共管理学院, 河南 新乡 453007

摘要:公共资源的公共性、稀缺性、非排他性、效用综合性等特点,导致其在实际治理过程中会遭遇诸多障碍,从而形成资源危机和一系列社会问题。实践中形成的政府治理、市场治理和自主组织治理等单一主体模式在一定范围和程度上可以避免“公地悲剧”的发生,但都难以有效应对现代社会利益分化与多元交织所形成的日益复杂的公共资源治理难题。近年来逐渐发展和兴起的公共资源治理多元主体模式——协同治理模式,以其适用范围广泛、形式灵活多样、实践中弹性空间大、更能适应公共资源治理的复杂性等优势,为解决这种复杂性问题展现了一种令人期待的前景,对于推动我国公共资源治理模式的创新具有重要参考意义。

关键词:

公共资源治理;
公地悲剧;
协同机制

收稿日期:2016-12-30

基金项目:国家社科基金项目(13CZZ012)

作者简介:艾昆鹏(1975—),男,河南省确山县人,河南师范大学副教授,博士,主要研究方向:中外政治思想、现代治理理论与实践;徐雅杰(1991—),女,河南省济源市人,河南师范大学硕士研究生,主要研究方向:中外政治制度。

随着现代工业文明的日益发达和全球人口的增加,人类对自然资源的需求及开发利用急剧增长,资源短缺和生态危机日益成为一个全球性的问题。寻求一种更为合理的方式,以提高对有限的公共资源进行保护与可持续发展的效果,同时实现公平、公正的分配与利用,一直是国外学术界十分关注的课题。近年来,由于我国经济社会发展中遭遇到的资源紧张、环境污染等问题越来越突出,国内学术界对公共资源治理问题的讨论也逐渐增多,并积累了不少成果。概括来说,有代表性的相关研究主要集中在三个方面:一是对国外相关理论的介绍,主要涉及集体行动理论^[1-2]、自主治理理论^[3-4]、协同治理理论等^[5-6];二是对各种治理方式的讨论,比如多元治理、网络治理与相关机制^[7-9];三是结合具体案例分析公共资源治理中的问题与对策^[10-12]。这些研究对于深化对公共资源问题的认识、推动我国探索合适的公共资源治理模式与机制发挥了积极作用。本文拟在上述研究成果的基础上,结合公共资源的特点与治理困境,着重分析、比较几种治理模式的特点与局限,为寻求适合我国现实情势的治理模式提供参考。

一、公共资源的特点

宽泛地说,人类群体在社会生产和生活中公有共用的基本资料来源都属于公共资源,它既包括自然界自然形成的自然资源,也包括社会中通过人类活动而形成的各种公共设施、公共物品,如各种公共教育、卫生、文化设施与服务,以及国防、司法、行政资源等。限于篇幅,本文所提到的公共资源仅指由国家和地区共有产权的自然资源,如水、空气、森林、矿产、渔场、牧场等,以上资源在经济学中,一般被称为公共池塘资源。这类公共资源既具有自然资源本身的特点,也具有公共物品的特性。公共资源的提取、开发和利用过程,常会受到来自这两方面

因素的共同影响与困扰,从而导致资源的滥用、浪费、污染、枯竭等问题,甚至带来灾难性的后果。作为一种公共资源,其具有以下几种鲜明的特点。

1. 系统性

自然资源是自然界自发演化的结果,在漫长的演化过程中,各种资源形成了一个相互联系、相互依存、相互影响、相互制约的生态系统。人类在开发利用自然资源的过程中,如果不谨慎,很容易破坏这个系统,从而导致自然资源生态圈的失衡。比如过度砍伐会导致水土流失,过度放牧会导致草场沙化等。当然,如果得到良好的治理,也可以带来正面的外部效应。

2. 不均衡性与稀缺性

自然资源在全球各地的分布很不均衡,有的地方丰富,而有的地方贫瘠。即使某地自然资源绝对总量很丰富,但若不平衡也很容易导致相对的短缺和纷争。并且,绝大部分资源都不是取之不尽、用之不竭的,即使一些可再生资源,如果过度开发利用也会出现再生能力锐减等问题。这一特点无疑会加剧公共资源分配中的困难和矛盾。

3. 非排他性

公共资源不同于私人资源,私人资源产权明晰、归属明确,具有较强的排他性,而公共资源产权界定极为困难,作为共有共享的资源,在使用和消费上具有非排他性,即一定区域或时间内,群体中的所有成员都可以对其进行使用。之所以具有这一特点,有的是因为受产权界定技术或成本的制约而不可取,有的则是因为出于公正、公益目的而无需排他。

4. 效用综合性

公共资源并不专属任何个人和组织,它是社会成员共有的资源,其开发利用的最终目的是要维护公共利益,增进公共福利。要实现这种公共目标,在效用,公共资源也不应仅仅满足社会成员的单一目的,而是要兼顾经济发展、

社会公正和生态效益。只有做到这些,才能体现它的公共属性。

二、公共资源治理中的困境

各种公共资源是维系人们日常生活和生存的必需品,是人们从事各类经济活动的重要资本,而它的稀缺性又决定了人们必须合理地、节约地利用这些宝贵资源。如果人们对此缺乏认识,过度开发或浪费严重,就会导致资源危机的发生,最终会威胁到人类的生存与发展。但由于具有非排他性、产权不明晰等特点,公共资源治理面临着重重困难。

1. 公地悲剧

早在两千多年前,亚里士多德就曾指出,“凡是属于大多数人的公共事物常常是最少受人照顾的事物,人们怀着自己的所有,而忽视公共的事物;对于公共的一切,他至多只留心到其中对他个人多少有些相关的事物”^[13]。这深刻地表明人们在面对公共物品时所具有的先天性缺陷。1968年,美国学者加勒特·哈丁在《科学》杂志上发表论文 *The tragedy of the commons*,对这一问题进行了更为系统深入的思考,提出了著名的公地悲剧理论。哈丁假设了一个对所有人都开放的公共牧场,他基于理性人的假设对此进行了分析,认为每个放牧人即使认识到过度放牧的后果,也会毫不犹豫地不断增加自己牲畜的数量,因为过度放牧的后果是由大家共同承担的,而其收益则全部归为己有。这是一个理性人进行理性选择的必然结果,也是一个悲剧结果。原因在于,“在这样一个人人都被理性规则锁定的系统里,每个人都被驱使在一个有限的牧场上无节制地增加自己的牲畜,结果是每个人都在追求自己最大利益的道路上走向共同毁灭”^[14]。与亚里士多德的总结式论断不同,哈丁的这个理论以一种清晰确定的推理向人们证明:只要人们共同使用一种稀缺性的自然资源,不加节制、顺其自然,结果必

然导致这种自然资源的衰竭或毁灭。

2. 囚徒困境

囚徒困境理论最先由美国兰德公司的梅里尔·弗勒德和梅尔文·德雷希尔于1950年提出,后来由艾伯特·塔克以囚徒方式阐述,故称之为“囚徒困境”。该理论指出,假如有两个共谋犯罪的人被关入监狱,警方给出如下条件:其一,两个人若都不揭发对方,则会由于证据不确定,每个人都坐牢一年;其二,若一人揭发而另一人沉默,则揭发者会因为立功而立即获释,沉默者会因不合作而入狱五年;其三,若两人互相揭发,则会因证据确凿都判刑两年。在不能相互了解或确证对方想法的情况下,两个囚徒都会选择第三个条件。但这并不是一个最优的选择。该理论运用博弈论对哈丁的公地悲剧理论进行了支持性的解释。运用到公共牧场中就是,如果放牧者都选择合作(限制自己的牲畜数量在合理范围内),大家就会获得最优的结果,即牧场利用的可持续性。但实际上放牧者并不会这样选择,因为在没有外部条件约束的情况下(顺其自然的情况下),正如两个囚犯不能了解和确信对方的想法而去选择背叛一样,所有的放牧者也会选择背叛(不合作)。因此,那个糟糕的悲剧结果也就不可避免了。

3. 集体行动逻辑

曼瑟尔·奥尔森在1965年出版的《集体行动的逻辑》一书中对传统的群体理论提出了质疑和挑战。传统的群体理论一般倾向于认为,具有共同利益的个人会自愿为促进集体利益而行动。但奥尔森指出,“除非一个集团中人数很少,或者除非存在强制或其他某些特殊手段以使个人按照他们的共同利益行事,有理性的、寻求自我利益的个人不会采取行动以实现他们共同的或集团的利益”^[15]。他同样也是基于理性人的分析,认为一个理性的个体如果不被排除在集体物品的收益之外,他就没有动力去为集体物品的供给自愿贡献力量。因为,在这种

情况下,搭便车是理性人的合理选择。奥尔森对集体行动困境的分析同样也在一定程度上解释了为什么公共资源容易被滥用和破坏。

这些理论使人们对公共资源的治理难题在理论上有了更多的认识,同时也影响了人们在实践中对公共资源治理模式选择的偏好。

三、公共资源治理单一主体模式及其局限

现代社会日益严重的资源危机和生态问题,要求人们必须有效破解公共资源治理中的难题。但如何才能避免“公地悲剧”、实现公共资源的有效治理呢?加强制度供给,通过外部约束条件来克服人们在公共资源消费中的内在理性缺陷,是一种普遍认可的解决途径。基于不同的治理主体,人们从理论上概括了以下几种有代表性的治理模式。

1. 政府治理模式

公地悲剧理论、囚徒困境理论和传统的群体理论三者关系非常密切,并且在核心立场上能够相互支持和佐证,共同预示了人们依靠自身解决“公地悲剧”的灰暗前景。正如埃莉诺·奥斯特罗姆所言,“通过把自然场景称为‘公地悲剧’,‘集体行动的问题’,‘囚犯的困境’,‘自由享用的资源’,或者甚至是‘公共所有的资源’,观察者经常希望激起一种想象:一群无助的个人陷入了毁灭他们自己资源的残酷进程之中”^[16]。这些理论的合力效应使很多学者在治理途径上,无奈而坚定地选择了中央政府控制方案。比如,Ophuls等曾说,“我们只有悲剧性地把利维坦作为唯一手段时,才可能避免公地悲剧”^[17]。Hardin后来也指出,“如果人们想要在这个混乱的世界上避免毁灭,就必须对外在于他们个人心灵的强制力(霍布斯意义上的‘利维坦’)表示臣服”^[18]。与这两位观点相近的学者有很多,这为实践中增强中央政府对公共资源实行集中控制和管理政策提供了

理论支持。

在单纯的政府治理模式中,由中央或地方政府集中控制和管理公共资源是治理的唯一途径。政府一般通过制定法律、颁布命令、制定政策等进行制度供给,然后通过建立一个科层制的组织机构来负责有关执法与监管事务。这种模式保证了约束条件的一致性和执行的外在强制力,理想状态下能够避免“公地悲剧”的发生。如同埃莉诺·奥斯特罗姆所分析的那样,这是以政府拥有对称的信息、监督得力、制裁及时有效和极低的行政成本为前提条件的^{[16]24}。但由于科层制自身存在的弊端,以及信息获取、监督和制裁的复杂性,加之成本因素,上述条件的实现很难保证。所以,政府治理模式在实践中经常会遭遇效率低下、成本高昂、信息不足等困难,使治理的有效性大打折扣。

2. 市场治理模式

也有不少学者基于对政府的过度警惕和对市场的充分信赖,认为通过市场机制来解决公共资源治理难题是一种最优的选择。要借助自由市场机制,就需要把私有产权制度引入公共资源领域。这些学者相信,只要把公共资源进行私有化处理,就能实现良好的利用和治理。正像Smith所认为的那样,“在自然资源和野生动植物问题上,要想避免公地悲剧,其唯一方法,就是创立一种私有产权制度来取代资源公有制度”^[19]。按照这些学者的设想,只要产权明晰,在利益激励和风险约束下,利用市场交换和价格机制来分配公共资源,就能实现对自然资源的最佳管理与利用。

在实践中,一些国家虽然通过私有化的方式对诸如牧场、农场、渔场等公共资源进行治理,收到了良好的治理效果,但由于这种治理模式有很多局限性,并不能成为所有公共资源治理的通用方案。因为有很多公共资源很难进行产权划分,如河流、大型湖泊等;有的即使可以进行产权划分,但在保证排他性上也面临技术

上或成本上的巨大障碍。还有一些资源由于自身的动态性、生态相关性、公益性等诸多特点,私有化处理之后会产生诸如社会不公、生态失衡等负面效应。因此,市场治理模式在实际上也只能解决一小部分公共资源的治理难题,对于其他很多公共资源来说,单靠这种模式无法应对。

3. 自主组织治理模式

鉴于前两种治理模式存在的问题,埃莉诺·奥斯特罗姆在大量实证调研的基础上,提出了一种替代性方案,一般称之为“自主组织治理模式”。埃莉诺·奥斯特罗姆并不完全赞同“公地悲剧”假设,认为“个人把他们自己从各种不同的困境中解脱出来的能力因环境的不同而不同”^{[16]31}。根据她的分析,在一个共享资源的群体中,即使政府的强制式管理没有介入,也没有通过私有化方式来引入市场机制,但只要群体成员意识到合作的必要性,借助彼此之间的密切关系,以及共同的价值、信念,再加上社会中实际存在的声望、信誉、舆论等约束因素,从内部形成一个具有有效约束力的合作机制在实际上是可能的。并且,这种从内部自发产生的管理机构和运行机制,不但成本低、效率高,而且可以避免前两种模式存在的政府失灵或市场失灵问题。因为,规则的制定、执行和监督者都是直接利用这些资源的成员,他们不但能够清楚地洞悉实践中存在的真正问题在哪里,据此制定有针对性的规则,而且能够直接进行监督和制裁。这些优势在政府模式和市场化模式下很难体现出来。

实践中,一些地区的公共资源利用自发形成的群体组织进行自主治理,确实取得了非常好的治理效果。埃莉诺·奥斯特罗姆在其著作中通过大量的案例和数据对比令人信服地证明了这一点。不过,实践表明,这种治理模式与市场化模式一样,在某些类型的公共资源治理中能够发挥独特的作用,而在另外一些公共资源

治理中却失灵。原因在于,这种模式有着严格的适用范围,按照埃莉诺·奥斯特罗姆的研究,只有在农业灌溉系统、水利系统、中小型渔场等类型资源的治理上,这种模式才有效。并且,对自发形成的自主组织及其运行过程也有着严格的要求,并不是所有类型的公共资源都具备那样的组织条件和运行环境。

总之,公共资源的上述三种治理模式,其有效性的发挥都有着严格的条件与环境制约,且其有效性也只局限在特定的领域,公共资源治理的困境并没有得到真正解决。在这种背景下,协同治理模式应运而生。

四、公共资源治理多元主体模式——协同治理模式的优势与适用性

“协同治理”概念的出现得益于自然科学中的协同论与社会学中的治理理论的交叉、结合。与“协同治理”相近的概念表达有多中心治理、网络治理等,从实践指向上来说,这三个理论具有很多相似的立场,不过多中心治理偏重于对多元治理主体的强调,网络治理则侧重于表达治理过程中不同组织和要素之间的网状化的复杂关系状态。

现代治理理念与协同论中的自组织原理相结合形成的协同治理理论,能够对复杂的公共资源治理问题提供优于依靠政府或市场等单一主体进行治理的实践方案。概括来说,协同治理理论具有几个显著特征:一是摆脱对单一主体的依赖,主张治理主体的多元化,除了中央和地方政府机构外,企业、社会组织、地方团体、公民个体等都可以作为主体参与治理;二是注重各主体之间的协同性,每一个参与主体都可视为一个子系统,各自都掌握着一定的知识、信息和资源,在集体行动中要达成共同目标,子系统之间必须相互依赖,进行协商谈判和资源交换;三是重视社会自组织的发展和协同能力的培育,自组织作为协同治理过程中的重要主体之

一,必须拥有足够的自主范围才能保证其作为协同一方的意义,这就需要在减少政府对其控制的同时培育组织自身的自治与协同能力;四是治理过程的全面参与,其他非政府主体并不是停留在决策咨询阶段,而是广泛参与治理政策的制定、执行、监督、评估等全过程;五是对规则意识和信任的强调,协同治理作为一种集体行为,在实践中必须以相互信任和共同认可的行动规则作保证,这二者是实现良好治理的基础。

尽管协同治理理论尚处于兴起阶段,有些基本问题和要素还有待进一步探究,以形成更广泛的共识,但其在实践中的应用价值已经得到广泛重视。在一些西方国家,实践中运用协同治理方式解决那些日益复杂的公共问题已经取得了不少成效。特别是在牵涉各方利益和具有多重价值目标的公共资源治理中,协同治理方式更受人推崇。例如,美国的水资源规划、联邦森林和土地管理局对有关资源进行的治理,正在主推协同治理方案^[20-21]。如果把协同治理模式运用到公共资源治理中,作为一种与政府治理模式、市场治理模式和自主组织治理模式相对应的治理模式,我们会发现,其与前述三种单一主体治理模式明显不同。前述三种单一主体治理模式都是以治理主体的不同进行区分的,协同治理模式则具有多元主体,它突出的不是某个主体,而是侧重于主体之间的合作。与前述三种单一主体治理模式相比,协同治理模式的优势主要体现在以下几个方面。

其一,适用范围广泛。协同治理强调包容性,“广泛的包容性不仅反映了协同治理开放、合作的精神,它还是协同治理合法性进程的核心”^[14]。这种特点使协同治理模式可以适应任何种类的公共资源治理,因为政府治理、市场治理和自主组织治理方式都可以被包容进来,彼此之间可以取长补短。政府治理的弊端和缺陷可以通过市场治理和自主组织治理来克服,市

场失灵的地方则由政府和自主组织的治理来补充,自主组织难以形成或无法应对的时候,可以由政府提供制度供给或帮助为其创造条件。

其二,形式灵活多样,实践中弹性空间大。面对不同的社会条件、地区状况和资源种类,可以建立不同的协商平台和运行机制。既可以建立完全平等的协商平台,也可以建立以政府为主导的协商平台。并且,协商平台和具体运行机制也可以随着经济形势、资源状况和社会的发展变化而呈现动态的自我调整。

其三,更能适应公共资源治理的复杂性。公共资源效用的综合性特点,决定了其治理目标的综合性:既要体现其社会性与生态性,以维护人类生存,社会可持续发展、生态环境的需要,也需要考虑到经济性价值。但在实际治理过程中,如果各治理主体不能做到有效协商和协同行动,往往会相互冲突,顾此失彼。协同治理则能够突破部门主义和科层制组织的弊端,化解不同部门和机构之间的隔阂,调动社会、企业、各类社会组织参与公共治理的积极性,有助于促进公共资源综合效用目标的实现。

当然,协同治理模式在实践中也存在不少制约性因素和困难,这恰是直到今天这种模式并没有被普遍采用的原因所在。在不同的社会条件、地区差异和资源特点面前,建立协同治理机制所遇到的困难也不一样。在法治发达、制度完备、社会组织成熟、民主发展程度高的社会,协同治理模式的推行相对要容易些,但也会面临一些实际操作上的困难。比如,参与主体拥有各自不同的目标和利益,在具体协商和行动中会不可避免地遇到各种困难,从而影响协同治理的效果,不但体现不出协同优势,反而导致协同惰性^[23]。这些问题的解决既依赖协同治理理论的深入发展,也需要在实践中不断积累经验,创新形式。

在我国,长期过于依赖政府治理模式所形成的惯性,以及存在法治完备程度不够、社会组

织不发达、公众参与意识不强等因素,运用协同治理模式会面临更多的困难。但这绝不是拒绝该模式的理由,环境问题和资源危机迫使我们必须探寻更加有效的公共资源治理方式。因此,如何在现有制度和社会条件的基础上,充分利用协同治理模式的灵活适应性来循序渐进地推进协同治理机制因地制宜地发挥作用,以应对公共资源治理难题,已成为一项十分紧迫的任务。

参考文献:

- [1] 李炜. 奥尔森的集体行动理论[J]. 青年研究, 1999(1):44.
- [2] 郭景萍. 集体行动的情感逻辑[J]. 河北学刊, 2006(2):81.
- [3] 朱广忠. 埃莉诺·奥斯特罗姆自主治理理论的重新解读[J]. 当代世界与社会主义, 2014(6):132.
- [4] 蔡晶晶. 诊断社会—生态系统:埃莉诺·奥斯特罗姆的新探索[J]. 经济学动态, 2012(8):106.
- [5] 李汉卿. 协同治理理论探析[J]. 理论月刊, 2014(1):138.
- [6] 田培杰. 协同治理概念考辨[J]. 上海大学学报, 2014(1):124.
- [7] 张劲松, 杨书房. 论区域公共资源管理的政府多元治理[J]. 学习论坛, 2012(1):42.
- [8] 唐兵. 公共资源网络治理中的整合机制研究[J]. 中共福建省委党校学报, 2013(8):13.
- [9] 李胜. 公共资源利他合作治理及其制度完善[J]. 社会科学家, 2016(8):75.
- [10] 谭江涛, 彭淑红. 农村“公共池塘”资源治理中的集体行动困境与制度分析——基于安徽桐城市青草镇黄砂资源过度采集问题的个案研究[J]. 公共管理学报, 2013(1):79.
- [11] 温铁军, 兰永海, 杨帅. 组织创新与租值社会化——新常态下杭州公共资源治理的案例分
- 析[J]. 国家行政学院学报, 2016(2):51.
- [12] 周海炜, 范从林, 张阳. 流域水资源治理内涵探讨[J]. 科学决策, 2009(8):59.
- [13] 亚里士多德. 政治学[M]. 吴寿彭, 译. 北京:商务印书馆, 1983:48.
- [14] HARDIN G. The tragedy of the commons[J]. Science, 1968(162):1244.
- [15] 曼瑟尔·奥尔森. 集体行动的逻辑[M]. 陈郁, 郭宇峰, 李崇新, 译. 上海:生活·读书·新知三联书店, 1995:2.
- [16] [美]埃莉诺·奥斯特罗姆. 公共事物的治理之道——集体行动制度的演进[M]. 余逊达, 陈旭东, 译. 上海:上海三联书店, 2000:20-21.
- [17] OPHULS W. Leviathan or oblivion[M]//DALY H E. Toward a steady state economy. San Francisco: Freeman Press, 1973:229.
- [18] HARDIN G. Political requirements for preserving our common heritage[M]//BOKAW H P. Wildlife and America. Washington D C: Council on Environmental Quality, 1978:314.
- [19] SMITH R J. Resolving the tragedy of the commons by creating private property rights in wildlife[J]. CATO Journal, 1981(1):467.
- [20] INNES, JUDITH E, DAVID E, BOTHER. Collaborative policy making: governance through dialogue[M]//HAJER M A, WAGENAAR H. Deliberative policy analysis: understanding governance in the network society. New York: Cambridge University Press, 2003:89.
- [21] CALLAHAN R. Governance: the collision of politics and cooperation [J]. Public Administration Review, 2007(2):290.
- [22] 蔡岚. 协同治理:复杂公共问题的解决之道[J]. 暨南学报(哲学社会科学版), 2015(2):110.
- [23] 田培杰. 协同治理:理论研究框架与分析模型[D]. 上海:上海交通大学, 2013.



引用格式:关小克,王秀丽,李乐. 农村居民点演变分异与分类调控研究综述[J]. 郑州轻工业学院学报(社会科学版),2017,18(2):47-54.

中图分类号:F301.2 文献标识码:A

DOI:10.3969/j.issn.1009-3729.2017.02.008

文章编号:1009-3729(2017)02-0047-08

农村居民点演变分异与分类调控研究综述

Review of research on differential evolution and classified management of rural residential area

关小克¹, 王秀丽², 李乐³

GUAN Xiao-ke, WANG Xiu-Li, LI Le

1. 郑州轻工业学院 社会发展研究中心, 河南 郑州 450002;
2. 河南农业大学 资源与环境学院, 河南 郑州 450002;
3. 山东省东营市土地综合整治服务中心, 山东 东营 257091

摘要:研究农村居民点用地的演变分异规律,既是调控农村居民点用地的前提,也是实现农村土地可持续利用的关键。经济发展和社会转型所诱发的人口变迁和地域重构,使得农村居民点在地理空间上呈现出错综复杂的异化特征。综合查阅相关文献资料,在明晰农村居民点演变分异内涵、界定农村居民点分类概念的基础上,从农村居民点的演变分异与转型发展、农村居民点系统分类与调控两个方面进行归纳和总结,提出以下研究亟需强化:(1)农村居民点形态演变分异特征的识别;(2)农村居民点演变机理探索与趋势的预测;(3)农村居民点的系统分类与整治调控;(4)多学科融合下的成果应用。

关键词:
农村居民点;
演变分异;
分类调控

收稿日期:2016-11-15

基金项目:国家自然科学基金青年基金项目(41501189);国家自然科学基金河南联合基金(U1504707);教育部人文社科项目(14YJCZH004);郑州轻工业学院博士基金项目(2013BSJJ077)

作者简介:关小克(1981—),男,河南省汝州市人,郑州轻工业学院讲师,博士,主要研究方向:土地资源评价与规划。

农村居民点是一个历史自然体,是自然条件与经济社会发展综合作用下的产物;其作为我国数亿农民聚居和生存发展的地域空间,是满足农村居民日常生活、农业生产需求而形成的。目前,我国正处于由以农业为主的传统乡村社会向以工业和服务业为主的现代城市社会转变的历史进程中,区域间的要素重组和产业重构十分激烈:传统的农耕经济正在接受工业的革命性改造,农村经济产业结构、社会结构与城乡空间结构赖以生长和延续的根基开始动摇;乡村聚落在农业经济时期的单一功能结构,逐渐呈现出复杂、多样和不稳定的局面;区域间人口变迁、社会转型和地域重构也呈现出明显的分异特征,致使不同区域内的农村居民点在用地结构、产业结构、建筑形式等方面也呈现出错综复杂的异化特征。

在政府主导下,各地纷纷开展有关农村居民点的调控与管理工作,其出发点大多是节约、集约用地,但在实践过程中往往用简单化的空间集聚来处理多样化和复杂化的村庄发展问题。新农村建设虽然促进了资源禀赋优越村庄的发展,但是缺乏全方位的整合性考虑,村庄发展的基础设施重复建设、乡村景观消失等系列问题频繁出现,甚至出现今天的新建村成为明天的拆旧村等不良现象,与中共十八大报告提出的“优化国土空间开发格局促进资源节约利用”的顶层设计相冲突。鉴于此,众多学者分别选取不同的案例区,对农村居民点的演变特征、调控模式进行了广泛而深入的研究^[1-6]。但是土地利用变化具有很强的区域性,现有研究对居民点演变规律把握不准,不能有效指导农村居民点规划管理工作的开展。提升农村居民点的用地效率,优化农村居民点的用地结构,必须深入辨析不同区位农村居民点用地的演化分异特征,揭示农村居民点演变的历史规律,通过对其进行科学有效的分类调控,实现土地资

源的可持续利用。本文拟在明晰农村居民点演变分异内涵、界定农村居民点分类概念的基础上,从农村居民点的演变分异与转型发展、农村居民点系统分类与调控两个方面对相关研究予以综述。

一、概念内涵界定

农业与游牧业、工业不同,它是直接取资于土地的。游牧的人逐水草而居,飘忽不定;做工业的人择地而居,迁移无碍;而种地的人却搬不动土地,因为乡村人口是附着在土地上的。^[7]以农为生的人,世代定居是常态,自然形成起来的村庄、农民住宅与农田的距离不会太远,这既是工作的需要也是为了安全、容易防卫。因此,作为农民聚集居住载体的农村居民点是自然环境与经济社会发展综合作用的产物,既是农村居民日常生活、生活的主要场所,也是农村社会空间的重要组成部分;农村居民点演变既是农村社会结构在居住空间上的投影,也是社会转型中推动城乡统筹发展的关键节点。^[8]

1. 农村居民点演变分异的内涵

分异是指在某种条件下,原本性质相同或相近的事物向不同方向演替、变化,在形态特征上体现出从一般到特殊、从整体化到个体化、从均质到异质的演变过程。^[9]农村居民点的演变分异就是指农村居住空间从均质到异质的变化过程。具体地说,随着我国政治、经济、文化等因素交织的社会转型,农村居民的就业方式、生产方式和生活方式都发生着改变,收入显著提升,生活习惯与消费观念也发生了变化,对住房改善的需求被激发出来,驱动着农村聚落的利用格局进一步异化。^[10]

从分异概念来看,农村居民点的演变分异呈现出显性分异和隐性分异两种形态。显性分异是指一段时间内与经济社会发展阶段转型相对应,农村居民点在地理空间上表现出的外部

分异特征,从物质形态来看包括数量(面积、比重)、空间(位置、结构)、景观(宏观、微观)等属性;隐性分异是指依附于显性分异、通过调查分析才能获取的居民点形态特征,是农村居民点内部不同社会群体的物质形态及其所反映的社会关系,如功能结构(生产、生活、生态)、产业构成(农业、非农)、社会文化(教育、价值信仰)等属性。总而言之,农村居民点演变的显性分异是农村居民点在地理空间上演变的外部表现,而农村居民点演变的隐性分异则是农村居民点演变过程中农村社会空间里所发生的社会关系的变化。

2. 农村居民点分类的内涵

分类是指按照一定的标准对特定的事物或研究对象进行分类,把性质类似的归为一类,以便于统计分析与分类管理,从而达到正确认识客观事物的目的。^[11]土地利用现状分类是国家制定国民经济计划和有关政策,发挥土地宏观调控作用,合理利用土地资源的重要手段。^[12]农村居民点分类是指按照自然、经济属性,对农村居民点用地的利用方式和覆盖特征进行综合性的类型划分,以便合理利用土地资源,进而对其进行有效管控。作为一个重要土地利用类型的农村居民点,通过对其进行类别划分,可为不同的责任主体做好相应的规划管理工作,为其进一步融入当地居民的生产生活提供概括性、直观性的信息。

一切分类都是认识事物的有效武器^[13],对于客观事物,如果不予分类、不立系统,人们则无法认识、难以利用。分类的目的在于方便人们深化对客观事物的认识,进而对其实施有效的管理。土地分类是区分土地利用空间的重要环节,其贯穿于土地利用过程中的计划制定、组织管理和调节管控,是行政管理者制定和选择土地政策的重要手段,对于实现土地管理目标发挥着举足轻重的作用。土地利用分类作为土

地管理的起点,其地类设置方式取决于土地管理的现实需求。^[14]改革开放后,基于建设、管理的需要,我国土地、建设、农林等主管部门相继制定了具有部门色彩的土地调查分类系统,这些分类体系为推动土地利用、研究和管理发挥了巨大作用,在一定程度上满足了经济社会发展的需要。但是,由于我国国土面积广大,区域自然条件与社会经济差异显著,区域经济要素流动迅速,土地利用格局在持续发生着系统性的变化,土地利用分类系统所面对的现实难题并未得到圆满解决,在农村居民点规划管理方面显得尤为突出。另外,由于研究主体、管理层次、发展理念的差异,对农村居民点分类指标的选取,各相关部门也不一致,这也为分类带来了一定困难。应当认识到制定科学的分类指标,既要考虑自身显性、隐性的形态特征,又要考虑其概括性、独立性、稳定性和发展性。

二、研究回顾与评析

1. 农村居民点演变分异与转型发展

西方国家对农村居住空间的研究是为了解决农村社会空间与发展环境之间日益突出的矛盾冲突问题,以指导农村发展规划与管理。其研究主要集中在农村居民点的分布特征、用地效应等方面,近年来更加注重对微观领域的探讨,强调自然空间与文化之间的融合。例如,P. Michael^[15]对伦敦地区农村的聚落形态及分布类型进行了阐述;M. Vesterby等^[16]利用1980—1997年农村居民点数据,分析了美国农村居民点用地持续增长的特点,认为美国长期的高收入、低利率、低通胀率使得其居民对大面积房屋产生较大需求,从而导致农村居民点用地快速扩展;S. Peter^[17]全方位分析了南非地区农村居民点分布对区域基础设施和发展机遇的影响,并指出居民点分布形态是影响该地区基础设施可达性和发展机遇的主要因素;C. F. Carmen

等^[18]以城乡结合部为研究对象,将农村居民点用地的变化放在城镇化推进的背景之下,分析了人口非农化、产业结构调整、生活方式改变、用地功能变化对农村居民点用地产生的影响;A. Wasilewski 等^[19]分析了波兰城郊农村居民点的用地变化,认为利益主体的博弈过程反映了城郊农村居民点用地变化的过程。

农村居民点的分布格局,既反映了农村社会的发展变化历程,也折射出农村人口在地理空间上的依附形态。在我国社会转型过程中,探讨农村居民点演变过程中的分异状态,是广大学者关注的重点。董春等^[20]对农村居民点分布与相关地理因子的关联进行了探讨;刘志玲等^[21]以安徽省为例,从自然、经济和社会三方面定性分析了区域农村居民点用地发展的驱动力,以及经济因素与农村居民点变化的关系;王春菊等^[22]系统分析了福建省农村居民点分布与海拔高度、土地利用、路网、河网与海岸线距离的关系;姜广辉等^[23-24]则将研究范围延伸至农村居民点内部,认为区位特征决定了农村居民点内部结构差异。近年来,由于中国城乡差距的不断扩大,以及乡村聚落发展过程中建房占地与村庄空心化现象愈演愈烈,众多学者先后从不同方面、对不同层次的农村居民点布局与变化问题进行了分析^[25-26]。另外,随着土地资源稀缺性的日益凸显,模拟其演化趋势与分异特点已经成为相关领域研究的热点。例如,刘彦随^[27]以沿海地区城市化快速发展区为背景,从农业与就业结构变化的角度,分析了乡村转型特征及其情景,认为城乡差异决定着农村地域类型的复杂性及其发展模式的多样性,并提出新农村建设须遵循区域差异与乡村转型的发展规律;姜广辉等^[23]通过对比北京山区多个时段建设用地各二级地类变化的空间聚类和历史形态,揭示了北京山区建设用地结构演变的空间分异特征和演变趋势。

需要重点说明的是,作为农村居民点主体构成的宅基地是立足于计划经济体制而形成的,目前,其赖以生存的经济、社会条件正在逐步丧失。例如,龙华楼等^[28]认为,现行的宅基地使用制度不仅扭曲了农村土地的市场价值,也严重影响了乡村转型的发展进程;周小平等^[29]通过对山东、福建两地农村居民点整治意愿进行调查,分析了不同经济发展水平地区农村居民点整治意愿,探讨了农村居民点整治的实施机制;张中华等^[30]以陕南秦岭地区为例,提出要结合区域的生态环境特色,以及经济社会文化特征,在把握城乡发展规律的基础上,通过对关键影响要素的识别,构建出协调发展的人口转移模式;龙花楼等^[28]在分析土地利用形态概念内涵发展演变的基础上,诠释了土地利用转型的概念模式,进而探讨了土地利用转型与乡村转型发展之间的关系。

综上,我们可以看出,我国关于农村居民点演变分异与转型发展方面的研究有不断深化、丰富的趋势,但是,农村居民点是一个涉及自然、经济、社会、历史、文化、生态的系统性的综合体,目前对农村居民点用地变化与经济社会演化规律之间关系的研究还鲜有报道,这不利于对农村建设用地的科学管理和利用。准确科学地表征居民点演变分异与社会转型的阶段特征及其主控因素,对实现农村居民点用地健康、有序发展具有重要的理论和实践意义。

2. 农村居民点系统分类与调控研究

目前,国外对农村居民点分类的研究主要存在于不同的专题之中^[31-33]。与国内村庄发展情况类似,整体而言,国外有一部分村庄不断缩减、荒芜甚至消亡,而另外一部分村庄逐渐从传统的单一功能向多元化的空间实体转变。F. Dahms^[34]认为,功能和形态的多样性和复杂性是现代农村居民点的显著特征。为更好地促进农村居民点的建设和发展,部分学者提出了农

村居民点复兴、城市人口回流、反城市化等多种观点^[35-37]。K. Yasuyuki 等^[31]利用卫星影像并结合实地调查,把泰国东北部的农村聚落划分为传统农业型古村落、现代产业型古村落、传统农业型新兴村落和现代产业型新兴村落四种类型。M. R. Bellon^[32]认为,从促进农业发展的角度来看,农村居民点的基础设施状况和人口状况是划分农村居民点类型的必选指标,因为其对信息、土地、资本和劳动力的获得会产生直接影响。L. Murphy 等^[33]认为,购物旅游是推动乡村发展的一个重要模式,可以依据当地产品独特性、旅店舒适程度、公共设施完善度、农村环境的美观程度等指标,划分农村居民点类型,从而为商业发展规划提供更为详细的资料。

在我国,现阶段与农村居民点关系最为密切的分类系统就是土地利用分类系统。土地利用分类是基于土地的功能和当前的实际用途建立的分类系统,但是该分类系统把全部的农村居民点作为一个用地类型来对待,未对不同居民点用地做系统深入的类型划分。居民点的用地结构是农村的经济结构、社会结构、职能结构等在用地空间上的综合反映,是一个具有复合功能的用地载体。部分学者将研究范围延伸至农村居民点的内部,从不同的视角对居民点的内部结构做了广泛而深入的探讨,进一步认识了农村居民点用地结构与功能的演变规律^[38-40]。龙花楼等^[41]基于区域自然条件与经济社会的差异性,划分了空心村演化类型与区域,并从经济、自然、社会文化及制度、管理四个方面分析了空心村演化的驱动机制。郭晓东等^[42]分别从聚落形态(集聚型、分散型)、地形特征(河谷川道聚落、丘陵山区聚落)、聚落规模(小型、中型、大型)、经济特征(传统农业型、劳务输出型、半商品经济型、商品经济型)出发,对陇中黄土丘陵区聚落类型进行了详细划分;秦天天等^[43]基于生态位理论,采用可达性

测算、聚类分析、适宜性评价等定量分析与定性分析相结合的方法,将山东省栖霞市农村居民点分为重点发展型、适度发展型、限制扩建型和优先整治型四种类型,并基于相关要素提出分类调控的发展模式;崔卫国等^[44]利用对河南省郸城县 157 个农户、63 个村干部的问卷调查数据和深度访谈资料,结合村级农业普查数据、县域遥感影像资料与各类统计年鉴数据,分析了重点农区村落空心化的基本特征、形成机制和调控策略。王利伟等^[45]选取河南省周口市 17 个村庄的 514 个样本问卷调查数据,以农村居民属性特征和城镇综合环境评价为切入点,分析农村居民城镇迁居意愿及其影响因素,结果表明,农村居民对城镇的教育质量、消费服务和就业机会的满意度评价显著影响其城镇迁移意愿。实现对农村居民点的优化调控,应通过合理布局使其各得其所,组成科学、合理的等级结构。关小克等^[46-50]分别以北京、上海等发达地区为案例区,对区域内农村居民点优化调控模式进行了广泛而深入的探讨。粮食主产区是“三农”问题最为集中的区域,相关学者通过典型案例分析,针对不同状态的村庄设计了不同的发展道路,并总结出在中部地区城镇化与新农村建设协同发展的有效思路^[51-54]。目前,我国的城镇化还在加速推进,在未来相当长的时间内,还会有大量的农村人口流入城镇,大量偏远的、基础设施不完善的村落将不可避免地走向衰落或消亡。如何通过对农村居民点的科学分类,实现居民点用地调控的动态性,以及土地利用的经济、生态和社会目标三者的统一,需要广大学者给予重点关注。

三、研究展望

我国农村居民点的空间形态是随着社会的转型和农民群体的分化而不断更新变化的,随着农民收入水平的进一步提高和农业生产模式

的改变,农村居民点的演变进入加速分异的历史阶段。现阶段,有关农村居民点演变分异的研究正在不断深化和拓展,但已有的研究对制度管控、文化取向、社会空间等影响因素考虑不足,且分属不同的体系,相互之间缺乏系统的耦合,对社会转型过程中的农村居民点演化趋势缺乏整体的把握,不利于对农村建设用地的调控和管理。因此,未来亟需强化以下几个方面的研究。

1. 农村居民点形态演变分异特征识别研究

近年来,尽管有部分学者已经关注到农村居民点在演化过程中的形态分异特征,但是对农村居民点分异的认识还有待进一步深化。因此,今后要充分依据区域的资源禀赋条件与生态环境承载能力,进一步梳理农村居民点用地的形态特征(显性特征、隐性特征),进而分析不同经济社会发展水平下农村居民点用地演变的地域差异;通过对农村居民点用地功能形态演变的时空格局分析,实现对农村居民点演化分异关键节点(功能演替、产业发展、用途层次、人口分化)的有效识别。

2. 农村居民点演变机理探索与趋势预测研究

由于区域自然条件与经济社会基础不同,不同区域经济社会发展水平与潜力呈现由高到低的梯度排列。当前在经济梯度空间推移过程中,对农村居民点演变机理与演变趋势的研究较为缺乏。今后要强化对经济梯度差异下农村居民点用地演变分异主控因素的诊断,进一步明晰区域自然环境和经济社会等各项驱动因素与农村居民点用地演变规律的关系,在此基础上,揭示农村居民点演变分异的空间机理,进而模拟不同经济梯度下农村居民点用地变化的轨迹与方向。

3. 农村居民点的系统分类与整治调控研究

目前,对农村居民点功能和内部信息的研

究还不够充分,无法有效应对农村居民点规划、建设和管理过程中的复杂、多样问题。而只有在农村居民点演变分异特征识别、诊断的基础上,遵循农村居民点变化分异规律,细化农村居民点分类,提出有针对性的管控措施,才能有效实现土地资源的可持续利用。因此,进一步强化对农村居民点的系统分类研究,对农村居民点进行科学的类型划分,从中总结提炼出适应社会转型发展的调控模式,将是未来一段时期研究的重点领域。

4. 多学科融合下的成果应用研究

农村居民点的演变过程既受自然条件、社会经济因素的影响,也受文化风俗、风水格局的制约。既有研究对农村人文情怀的考虑相对欠缺,加之政绩观的驱动,某些部门主导的新型农村社区建设、农村土地综合整治等系列工程,没有实现农民生活与生产空间的有机融合。实践表明,推动农村土地的科学利用,需要从农村系统成长、城乡互动发展的理论视角,整合社会学、历史学、地理学、经济学、管理学等相关学科,在系统把握农村居民点演变分异规律的基础上,从功能转换、景观重塑、宅基地退出意愿等方面进行系统研究,应成为未来研究关注的重点。

参考文献:

- [1] 冯应斌,杨庆媛. 基于农户分化的村域居民点用地特征分析[J]. 农业工程学报,2015(21): 248.
- [2] 杨思遥,王艳慧,李贺颖. 村级居民点离散度评价模型及其与农村经济关联分析[J]. 地理与地理信息科学,2015(5):73.
- [3] 张玉英,王成,王利平,等. 农村居民点集聚区不同类型农户的共生认知及响应[J]. 中国农村经济,2012(8):88.
- [4] 桑翠翠. 秦岭山区农村居民点空间演变及驱动机制研究——以陕西省商州区为例[D]. 西安:

- 西北大学硕士论文,2013.
- [5] 王筱明,郑新奇. 县域城乡居民点用地整治布局优化研究——以山东省济阳县为例[J]. 地域研究与开发,2012(5):111.
- [6] 王希,王秀茹,薛剑,等. 灾后重建区农村居民点整治模式确定[J]. 农业工程学报,2013(14):245.
- [7] 费孝通. 乡土中国[M]. 北京:人民出版社,2008:3-6.
- [8] 姜广辉,张凤荣,孔祥斌. 北京山区农村居民点整理用地转换方向模拟[J]. 农业工程学报,2009(2):214.
- [9] 深关宝,邱梦华. 转型期中国城市居住空间的分异与极化——以广州为例[J]. 上海大学学报(社会科学版),2008(2):148.
- [10] 冯长根,赵若曦,古维迎. 中国农村居民点用地变化的社会经济因素分析[J]. 中国人口资源与环境,2012(3):6.
- [11] 孙小妮. 中国土地利用分类研究[J]. 山东省农业管理干部学院,2012(3):41.
- [12] 秦明周,陈云增. 土地利用分类及其用途管制研究[J]. 河南大学学报(自然科学版),2000(4):58.
- [13] 索恰瓦. 地理系统学导论[M]. 李世珩,译. 北京:商务印书馆,1991:102-117.
- [14] 文锐,吴宇哲. 土地利用现状分类实施对中国土地管理影响之管见[J]. 资源科学,2010(4):731.
- [15] MICHAEL P. Rural geography [M]. London: Harper&Row,1984:2-10.
- [16] VESTERBY M, KRUPA K S. Rural residential land use:tracking its grows[J]. Agricultural Outlook,2002,(8):14-17.
- [17] PETER S. Implications of rural settlement patterns for development:a historical case study in Qaukeni,Eastern Cape, South Africa[J]. Development Southern Africa,2003(9):406.
- [18] CARMEN C F,ELENA G I. Determinants of residential land use conversion and sprawl at the rural-urban fringe [J]. American Agricultural Economics Association,2004(4):889.
- [19] WASILEWSKI A,KRUKOWSKI K. Land conversion for suburban housing:a study of urbanization around Warsaw and Olsztyn,Poland[J]. Environmental Management,2004(2):291.
- [20] 董春,罗玉波,刘纪平,等. 基于 Poisson 对数线性模型的居民点与地理因子的相关性研究[J]. 中国人口·资源与环境,2005(4):79.
- [21] 刘志玲,张丽琴. 农村居民点用地发展驱动力研究:以安徽省为例[J]. 农村经济,2006(3):30.
- [22] 王春菊,汤小华,吴德文. 福建省居民点分布与环境关系的定量研究[J]. 海南师范学院学报(自然科学版),2005(1):89.
- [23] 姜广辉,张凤荣,周丁扬,等. 北京市农村居民点用地内部结构特征的区位分析[J]. 资源科学,2007(2):109.
- [24] 曹子剑,张凤荣,姜广辉,等. 北京市平谷区不同区域农村居民点内部结构差异分析[J]. 地理科学进展,2008(2):121.
- [25] 孙华生,黄敬峰,金艳,等. 基于 GIS 技术的县域居民点空间分布特征分析及其优化布局[J]. 浙江大学学报(农业与生命科学版),2007(3):348.
- [26] 田光进. 基于 GIS 的中国农村居民点用地分析[J]. 遥感信息,2003(2):32.
- [27] 刘彦随. 中国东部沿海地区乡村转型发展与新农村建设[J]. 地理学报,2007(6):563.
- [28] 龙花楼,李婷婷. 中国耕地和农村宅基地利用转型耦合分析[J]. 地理学报,2012(2):201.
- [29] 周小平,王情,谷晓坤. 不同经济发展水平地区农村居民点整治意愿研究——基于山东省和福建省两地农户的调查[J]. 南京农业大学学报(社会科学版),2012(4):100.
- [30] 张中华,张沛,孙海军. 城乡统筹背景下西部山地生态敏感区人口转移模式研究[J]. 规划师,2012(10):86.
- [31] YASUYUKI K, YOSHIKATSU N. Occupational structure and village type in northeast Thailand:a

- case study in Yasothon Province [J]. Southeast Asian Studies, 1992(3):241.
- [32] BELLON M R. Participatory research methods for technology evaluation: a manual for scientists working with farmers [M]. Mexico D F: CIM-MYT, 2001:118.
- [33] MURPHY L, MOSCARDO G, BENCKENDORFF P, et al. Evaluating tourist satisfaction with the retail experience in a typical tourist shopping village [J]. Journal of Retailing and Consumer Services, 2011(4):302.
- [34] DAHMS F. St Jacobs Ontario: from declining village to thriving tourist community [J]. Ontario Geography, 1991(36):1.
- [35] BRYANT R L, PANIAGUA A, KIZOS T. Conceptualising 'shadow landscape' in political ecology and rural studies [J]. Land Use Policy, 2011(3):460.
- [36] BROWN D L, WARDELL J W. New directions in urban-rural migration: the population turnaround in rural america [M]. New York: Academic Press, 1980:85-92.
- [37] CHAMPION A G. Counterurbanisation: the changing pace and nature of population deconcentration [M]. London: Edward Arnold, 1989:36-41.
- [38] 姜广辉, 张凤荣, 谭雪晶. 北京市平谷区农村居民点用地空间结构调整 [J]. 农业工程学报, 2008(11):69.
- [39] 彭芳, 刁承泰. 城乡用地空间结构分析——以重庆大渡口区为例 [J]. 国土与自然资源研究, 2008(2):36.
- [40] 陈竹安, 曾令权, 张立亭. 瑞金市典型农村居民点内部结构差异分析及整理潜力测算 [J]. 中国农学通报, 2011(14):146.
- [41] 龙花楼, 刘彦随, 邹建. 中国东部沿海地区乡村发展类型及其乡村性评价 [J]. 地理学报, 2009(4):426.
- [42] 郭晓东, 马利邦, 张启媛. 陇中黄土丘陵区乡村聚落空间分布特征及其基本类型分析——以甘肃省秦安县为例 [J]. 地理科学, 2013(1):45.
- [43] 秦天天, 齐伟, 李云强, 等. 基于生态位的山地农村居民点适宜度评价 [J]. 生态学报, 2012(16):5175.
- [44] 崔卫国, 李裕瑞, 刘彦随. 中国重点农区农村空心化的特征、机制与调控——以河南省郸城县为例 [J]. 资源科学, 2011(11):2014.
- [45] 王利伟, 冯长春, 许顺才. 城镇化进程中传统农区村民城镇迁居意愿分析——基于河南周口问卷调查数据 [J]. 地理科学, 2014(12):1445.
- [46] 关小克, 张凤荣, 赵婷婷, 等. 北京市农村居民点整理分区及整理模式探讨 [J]. 地域研究与开发, 2010(3):114.
- [47] 关小克, 张凤荣, 刘春兵, 等. 平谷区农村居民点用地的时空特征及优化布局研究 [J]. 资源科学, 2013(3):536.
- [48] 曲衍波, 张凤荣, 姜广辉, 等. 基于生态位的农村居民点用地适宜性评价与分区调控 [J]. 农业工程学院, 2010(11):290.
- [49] 曲衍波, 张凤荣, 郭力娜, 等. 京郊不同城市功能区农村居民点用地集约度的比较研究 [J]. 资源科学, 2011(4):720.
- [50] 谷晓坤, 周小萍, 卢新海. 大都市郊区农村居民点整理模式及效果评价——以上海市金山区为例 [J]. 经济地理, 2009(5):8320.
- [51] 张军民. “迁村并点”的调查与分析——以山东省兖州市新兖镇寨子片区为例 [J]. 中国农村经济, 2003(8):57.
- [52] 张婷, 陈丹杰, 姚江波. 农村居民点整理时机评价研究——以河南省鹤壁市淇县北阳镇为例 [J]. 河南科学, 2010(10):1365.
- [53] 张正河. 快速城市化背景下的村庄演化方向研究 [J]. 农业经济问题, 2010(11):16.
- [54] 诸培新, 王敏, 胡军. 农村土地整治的区域条件与微观农户意愿研究——以南京市万顷良田工程为例 [J]. 南京农业大学学报(社会科学版), 2015(1):61.



引用格式:周小华,储著源.论门诊医患话语博弈与平衡[J].郑州轻工业学院学报(社会科学版),2017,18(2):55-60.

中图分类号:C912.6 文献标识码:A

DOI:10.3969/j.issn.1009-3729.2017.02.009

文章编号:1009-3729(2017)02-0055-06

论门诊医患话语博弈与平衡

On word game and balance of the medical staff and patients

周小华¹, 储著源²

ZHOU Xiao-hua, CHU Zhu-yuan

1. 安徽医科大学 第二临床医学院, 安徽 合肥 230032;
2. 安徽医科大学 马克思主义学院, 安徽 合肥 230032

摘要:门诊医患话语博弈是指在患者门诊就医期间,医患之间围绕患者病情病因诊断与沟通,医者极力维护和保障自身话语权威,患者力争索取更多的话语机会以深入了解自身病情病因而形成医患话语沟通、交流、对抗和冲突。其间会经历预设话题之内的和谐话语博弈、不和谐话语博弈和预设话题之外的话语博弈三个阶段、三大形态。地方方言和风俗习惯、专业知识和主流医患用语、道德个性和心理承受力、医院硬件建设等因素会对门诊医患话语博弈产生不同程度的影响。正确处理门诊医患话语博弈问题的关键,在于平衡医患话语权,这就要依靠国家、社会和大众积极参与打造各方共同认可的主流医患文化和医患话语体系,在法定话语权规约下,指导和规范医患话语沟通和交流,同时加强医患心理疏导和就诊条件建设,从而规避、预防、缓解和解决医患话语冲突。

关键词:
医患关系;
话语博弈;
话语权;
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

收稿日期:2016-11-21

基金项目:安徽医科大学博士科研资助基金项目(XJ201424)

作者简介:周小华(1983—),女,安徽省枞阳县人,安徽医科大学讲师,硕士,主要研究方向:大学生思想政治理论教育;储著源(1979—),男,安徽省岳西县人,安徽医科大学副教授,博士,主要研究方向:中共党史、马克思主义发展史。

医患双方话语博弈与医患关系形成、发展和转型,客观上存在着紧密的逻辑关系,既是医患关系冲突或和谐的主要根源之一,又是医患关系冲突或和谐的重要表现,弄清楚医患话语博弈问题将有利于科学地剖析医患关系结构及其发生机制。门诊部是医患冲突高发区,是医患话语博弈最激烈、冲突频率最高的时空区域,医患话语博弈始终贯穿于门诊医患关系的方方面面。因此,深入分析探讨门诊医患话语博弈的含义、特点、形态、影响因素、现实困境、主要表现和应对措施,是正确解决医患关系和医患话语博弈问题的重要课题。然而,长期以来,学界对医患关系的研究,视野过于宏观,缺乏对医患话语关系时空形态与发生逻辑的微观探讨。鉴于此,本文拟以学界宏观研究成果为基础,以门诊为时空限度,对门诊中医患话语关系的发生机理和主要表现进行微观探讨,以期为正确认识和解决医患关系提供参考。

一、门诊医患话语博弈的含义、特点与形态

1. 基本含义

门诊包括普通门诊、专家门诊、急诊等,是患者急盼以最快速度了解病情病因的医患共存的特定空间区域和时间节点,其实质是医患双方共存共构的特定时空形态。所以,门诊既指门诊部的特定空间,又指患者就诊的特定时间。医患话语是指医患双方的言语与言语方式。实际上,话语已经被赋予更多的社会科学意义。有学者认为,从福柯开始,话语被视为能够对更复杂的社会关系网络进行功能透视,逐渐被作为社会政治、意识形态、文化职能与核心问题等社会活动的共生性原因和功能要素^[1]。博弈是指为谋取利益而竞争,医患之间的话语博弈当然也是围绕着医患各自的利益而展开的话语论争与交锋,比如人身权利、经济利益、政治权益、

投入与收益的权利等。基于门诊、话语和博弈的词义理解,门诊医患话语博弈就是指患者在门诊部就医期间,医患之间围绕患者病情病因诊断与沟通,医者极力维护和保障自身话语权威,患者力争索取更多的话语机会、话语时间以深入了解自身病情病因,从而形成医患之间的话语沟通、交流、对抗和冲突,它是一种典型的人类社会实践活动。

2. 基本特点

无论在哪个历史时期,人的健康和生命都是国家和社会的头等大事,是关系到每一个人的权益、必须处理好的重大社会问题。医患关系是一种源远流长的社会历史关系,其在不同历史时期、不同区域会呈现出不同的特点和类型。医患话语博弈作为医患关系最基本的呈现形式,构成了医患关系极为重要的组成部分,而在门诊部就诊期间,医患话语博弈的激烈程度和冲突频率都是最高的,也最容易产生各种各样的话语冲突事件。因此,门诊医患话语博弈既有医患话语博弈共性的一面,更有医患话语博弈独特的一面,上述二者兼而有之,形成了以下基本特点。

其一,话语交流是门诊医护人员对患者使用最早、频率最高的诊断方式。通常,医护人员会先通过患者的口头描述,对其就医部门进行分类,然后医生根据其口述情况进行初步诊断,若还不能确诊才采用抽血化验、B超等其他诊断技术。换言之,话语交流是门诊医生接触患者时最早使用的诊断方式。

其二,门诊话语是患者就诊描述病情最基础的方式。通常,除了那些外科明显观察到的病情之外,大部分门诊患者的病情要靠患者的描述和医护人员查看才能诊断。若患者对病情描述不清,则影响医生的诊断,交流中就容易导致医患之间的话语冲突。

其三,门诊是医患之间争夺话语权最为激

烈的地方。门诊期间,一方面医护人员面临特定时间内的患者人数较多、较为集中的心理和工作压力,会极力维护自身的话语权,以节省就诊时间、加快就诊节奏,试图创立“问答单一对应模式”的话语权,一般不讲多余的话语和不听患者单一的话语;另一方面由于门诊患者大部分对自身的病情不是很了解,急切希望在医患交流时间短、就医人数多的门诊期间就弄清楚自身的病情,经常会单方面地发起话语交流,创构话语权,导致医护人员抵触,从而产生医患话语冲突。

其四,门诊话语是医护人员最难以准确把握的医患话语形态。门诊患者来自各个不同的语言区,各地方语言在发音、表意与表达方式上存在着明显的差异性。因此,对于医护人员来讲,要在较短时间内,准确把握患者各种不同的话语方式,较为顺畅地进行医患话语交流,客观上确实存在一定的困难。

其五,患者利益、医护权威在门诊期间交错、博弈,门诊话语难以尽快实现医患双方意见较为满意的整合。门诊医生难以百分之百地满足患者对病情病因准确解读的要求,也难以做到使患者对医生权威绝对地服从,患者总认为任何病情医生都应给予解答,因自身带病应该受到医护的高度重视和绝对尊重。因此,话语身份、立场和取向的差异会导致医患双方不去换位思考,很少从言语上表达对彼此的理解,言语就成为维护各自利益的工具。

3. 基本形态

医患话语博弈既具有其他话语博弈的共性一面,更具有自身独特的表现。医患话语博弈过程,会呈现出从温和沟通到激烈冲突的变迁轨迹。本文基于医患之间关于病情病因的预设话题,来界定医患话语博弈的发展过程及其基本形态。

其一,预设话题之内的和谐话语博弈。预

设话题之内的和谐话语博弈是指医患之间围绕着患者病情病因而展开良性的无重大分歧的和谐的话语沟通和交流,博弈的结果是医患之间达成话语共识。此类医患话语博弈的整体特征是和谐,或许交流过程中存在各自的理解差异或沟通障碍,但这一话语矛盾始终处于医患之间有意识的控制之下,属于医患之间可接受的、可控制的话语博弈。具体表现是医患之间温和、愉快的话语沟通开始,经过良性的话语交流、自觉的话语讨论,最终形成医患之间的话语共识,顺利实现门诊期间医患双方关于患者病情病因的问答。基于上述理解,从医患关系实际情况来看,预设话题之内的话语博弈构成了医患话语博弈的主流和主要内容。反之,一旦预设话题之内的话语博弈不能构成主流和占据主导地位,那就说明此时医患关系甚至社会医疗卫生秩序陷入了一定程度的混乱。实际上,在绝大部分历史时期甚至战乱时期,医疗卫生程序都能保持相对稳定,这是因为医者治病救人和患者早日除病的共同目标,促使医患话语在多数情况下必须保持一致。因此,大部分医患话语博弈实质是预设话题之内的和谐话语博弈。

其二,预设话题之内的不和谐话语博弈。预设话题之内的不和谐话语博弈是指医患之间围绕患者病情病因而展开了有分歧、有争论、难以达成共识的话语交锋。此类话语博弈整体特征是不和谐,医患之间始终存在着难以沟通的话语障碍,明显地潜藏着可能随时导致医患之间话语冲突的因素。此外,此时话语博弈仍然停留在双方话语交锋或强烈的话语争论中,或者说医患之间的矛盾、冲突仍然停留在话语层面上,还没有恶化到身体冲突。显然,此时医患双方虽然存在话语矛盾,但双方仍然在“正确解答患者病情病因”这个目标上保持一致。具体呈现过程是:从医患之间见解出现差异、患者

不满意开始,到医患之间反复争夺话语权的话语争论、话语交锋,再到医患之间话语矛盾难以调和从而引起话语冲突。所以,此类医患话语博弈是正确解决医患关系必须准确把握和解读的一个重大问题,能否有效控制此类话语博弈,既关系到已经出现的医患矛盾能否有效解决,又关系到即将恶化的医患关系能否有效预防和规避。

其三,预设话题之外的话语博弈。预设话题之外的话语博弈是指医患之间跳开患者病情病因而展开冲突激烈、言行举止不可控、充满话语暴力的话语攻击与诋毁,结果导致医患之间话语攻击甚至人身暴力攻击,更有甚者会导致公共卫生突发事件。其实质是医患话语博弈的延伸形态,标志着医患关系进入更加复杂境域甚至恶化时期。此类话语博弈的发展逻辑是:一方面,医患双方突破了双方话语承受能力,看不到和谐对话的希望,产生了极为强烈的主动话语攻击;另一方面,当双方话语攻击未得到有效控制时,双方会产生超越话语之外的暴力攻击,包括门诊期间和门诊之外、医患本人和医患本人之外、门诊部区域内和门诊区域外的医患暴力冲突。具体表现为医患之间话语顶撞性报复开始,经历来来回回的话语攻击、人身攻击等,医患关系极度恶化,导致暴力冲突甚至公共卫生事件发生。

二、门诊医患话语博弈的影响因素

马克思曾指出:“语言是一种实践的、既为别人存在因而也为我自身而存在的、现实的意识。语言也和意识一样,只是由于需要,由于和他人交往的迫切需要才产生的。”^[2]导致医患话语博弈的因素很多,既有历史的又有现实的,既有客观的又有主观的。综观各类门诊医患话语交流案例,引起门诊医患话语博弈的主客观因素主要有以下几个方面。

其一,地方方言和风俗习惯。作为地大物博、人杰地灵的文明古国,中国各个地方的语言资源非常丰富,呈现出普通话语共享下地方语言多样化的文化特征,形成了许多具有地方历史底蕴和区域特色的方言。医患话语博弈中,由于患者来自不同的方言区,医患双方在语言表达方式、语气强弱、用词习惯等方面存在着明显的差异,导致医患双方经常难以实现顺畅的沟通和交流,医护人员难以准确掌握患者的病情病因,最终形成医患之间的话语不和谐。英国学者诺曼·费尔克拉夫曾指出:“话语根源于人们的生活方式和文化习惯,但同时也影响着人们的生活方式和文化习惯。”^[3]通常,人们的话语方式反映了一个人在其长期社会生活实践中形成的文化理念、风俗习惯。某些民族或某些地方对特定词汇用语有特别的忌讳,稍有不慎医患双方就有可能“犯”这种话语忌讳。

其二,专业知识和主流医患用语。医护人员一般都是具有医学专业知识的专业技术人员,而患者绝大部分缺乏医学基本知识,甚至某些患者还处于半文盲状态。因此,医学专业术语与非医学专业术语之间难免会在交流内容与交流形式上不在同一轨道上,由此极易导致医患之间的矛盾冲突。也就是说,医患话语博弈的根源主要在于医患之间因医学专业知识不对称而产生的公共议题差异。此外,门诊期间,由于医患之间的话语交流时间很短、方式比较随机,采用什么样的话语交流方式往往没有经过长时间的思考和筛选,因此很容易造成沟通不畅甚至产生语言冲突。主流话语是凝聚社会共识和实现社会和谐和中介系统。人与人之间的沟通和交流要想顺畅、和谐,必须有一套双方认可的主流话语系统。医患之间话语不和谐特别是沟通不畅、话语对立,缺乏主流医患用语的统领和规范也是重要原因。

其三,道德个性和心理承受力。医患的道

德个性、心理承受力的差异也是引起医患话语不和谐的重要因素,甚至是解决医患冲突难以逾越的障碍。对此,可以从医患两个方面来理解:一是门诊期间大部分患者对病情的迷茫心情和焦虑状态,是许多患者难以消除的心理障碍,这种心理障碍在一定条件诱导下易引起患者采取过激的行为来争夺话语权;二是门诊期间由于患者人数和问诊时间比较集中,造成接诊医生工作压力大,同样的话语要重复很多遍,医护人员在门诊高强度、高频率的工作中身心疲劳,最终导致医护人员职业心理、职业习惯、职业道德的暂时缺位。通常,就诊期间医护人员基于自身的专业权威,会构建自己对患者的绝对话语权。但在就诊实践中,部分患者因急于了解自身的病情病因、缓解心理压力,一开始就会展开对医护人员所拥有话语权的争夺。由此必然会消解医护人员既定的话语权,而患者话语权始终得不到医护人员的认可,也就难以在门诊短时间内形成有效的话语沟通交流。

其四,医院硬件建设。当前,门诊医患关系紧张的客观因素在于大部分医院专家型门诊甚至普通型门诊特定时间段内同时接纳患者就诊的容量不够大,难以满足患者快速有效获得就诊的诉求和期望。通常,门诊期间排队人数多,医患沟通时间不够,患者经常难以达到满足状态。此外,不少医院未做好门诊前的相关工作以维护医患秩序。比如,就诊心理辅导、预先了解患者病情轻重度、讲解就诊规则、为就诊人员提供后期服务等。

通常,医患言语的方式、权威、效果将极大地影响医患之间的共存方式和状态。当代美国著名学者贝尔指出:“语言比任何其他因素都更具决定性地界定了我们在这个世界上的不同生存方式。”^[4]一种话语形态内在地体现了话语双方的实际地位和力量强弱。基于目前我国社会生产力发展水平,我们不可能从根本上消

除医患话语不和谐博弈,只能培育和改进医患话语博弈中积极因素,促使医患话语博弈良性发展,在不断提高人的综合素质中逐步解决医患话语不和谐博弈问题。

三、门诊医患话语权的平衡

当前我国医患话语不和谐博弈属人民内部矛盾,是医患双方在根本立场、根本利益一致的前提下各自具体立场、具体利益的差异和冲突,其实质是医患双方感觉到自身话语权难以有效维护和各自具体利益难以得到保障而发生的社会矛盾现象。显然,正确处理与调控医患话语博弈问题的核心是如何构建均衡的医患话语权。而要整体性控制和引导医患话语博弈朝着和谐态势发展,关键在于依靠国家、社会和人民积极参与打造各方高度认可的主流医患文化和医患话语体系,以在法定话语权规约下指导和规范医患话语沟通和交流,同时加强医患心理疏导和就诊条件建设,从而有效规避、预防、缓解和解决医患话语冲突。门诊医患话语权的平衡,具体来说,可以从以下几个方面着手。

其一,高度重视中华优秀传统文化,以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为指导,创造性地构建承载核心价值观的医患文化。通常,社会话语绝大部分直接来源于优秀传统文化,因此创新医患话语体系首先应根植于中华优秀传统文化。有学者认为,医患关系状况与医护人员的文化水平密切相关,它不仅折射医生和患者之间的技术性关系,而且反映出他们之间的文化关系^[5]。因此,要平衡门诊医患话语权,首先应通过传承中华文化来孕育主流医患文化,构建中华优秀医学文化话语体系。任何话语体系必然是其核心价值观的内在蕴含和外在表现。当代中国话语体系是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的表达方式和语言载体,其形成和发展始终离不开核心价值观的引导。所以,当前亟需以社会主义核心价值

观为指导,凝聚医患话语共识,规范医患言行举止,打造承载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的医患文化。应加强医风医德建设,树立医护人员治病救人、妙手回春的正面形象,既要求医护人员对患者的绝对尊重,又要求患者与全社会对医护人员保持崇敬和感激之情。

其二,加强普通话语教育工作,普及医学类专业基础知识,孕育通俗易懂、明白无误、沟通无阻的医患话语体系。如前所述,门诊期间高频率出现医患话语不和谐博弈的原因,一是口头语言不通,二是专业基础知识差距悬殊。因此,打造主流医患话语体系,倡导医患交流运用健康文明用语,既是门诊医患话语权平衡的基本内容,也是门诊医患话语权形成、发展和合理运行的重要标志和根本要求。要平衡门诊医患话语权,首先,应普及普通话语,宣传普及一些流行程度较为广泛的主流话语,以打破医患之间最基本的语言障碍;其次,应加大推广医学专业基础知识的力度,丰富广大人民群众特别是基层群众的医疗保健常识,以增强医患之间话语沟通有效性和畅通性。

其三,强化门诊医患心理疏导。门诊期间,患者焦急和医护人员烦躁是医患双方表现得较多的心理状况,大部分医患话语博弈都是伴随着这样的心理状态而出现的。因此,要平衡门诊医患话语权,必须建立常态化的医患心理疏导机制,帮助医患双方缓解心理压力,让医患双方在门诊期间保持一个清醒、健康的心理行为。

其四,改善门诊就诊条件,做好门诊之外二次话语解答服务工作。首先,应改善医院门诊就诊条件,加强门诊医护力量,增强门诊就诊高峰期的容纳能力,为患者提供足够的问询时间,尽量减少门诊患者等待时间、满足患者就诊诉

求;其次,应做好门诊就诊之前后的沟通,建立门诊之外患者关于病情病因、用药等问题的二次话语解答工作机制,全力做好门诊之外的售后服务工作。

四、结语

门诊医患话语博弈是医患关系的重要研究领域,它是整个医患关系演变的逻辑起点和外在表现,贯穿于医患关系形成、发展过程的始终,极大地影响了医患关系未来走向。科学研究门诊医患话语博弈形态,挖掘和培育医患话语博弈的积极因素,推动医患话语博弈的健康和谐发展,规避和防止医患话语博弈中的消极因素,是解决当前中国医患关系紧张关系的重要环节。当前,应以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正确引导门诊医患话语博弈,着力打造主流医患文化和医患话语体系,加强医患心理疏导和就诊条件建设,同时应发挥行业协会作用,打造行业规范,强化行业监督,展开行业作风评级,客观评价医患话语博弈整个逻辑过程中医患双方的话语责任,并以此提出与时俱进的正面引导医患话语博弈的对策和建议。

参考文献:

- [1] 陈虹,高云微. 医患关系中的话语权重构[J]. 新闻与传播研究,2013(11):69.
- [2] 马克思,恩格斯. 马克思恩格斯选集:第1卷[C]. 北京:人民出版社,1995:81.
- [3] 诺曼·费尔克拉夫. 话语与社会变迁[M]. 北京:华夏出版社,2003:1.
- [4] 丹尼尔·贝尔. 社群主义及其批评者[M]. 北京:生活·读书·新知三联书店,2002:162.
- [5] 向玉乔.“信任与医患关系”国际学术研讨会综述[J]. 伦理学研究,2014(2):136.



引用格式:陈昱. 国内外人口城镇化与土地城镇化互动关系研究综述[J]. 郑州轻工业学院学报(社会科学版), 2017, 18(2): 61-67.

中图分类号: F301 文献标识码: A

DOI: 10.3969/j.issn.1009-3729.2017.02.010

文章编号: 1009-3729(2017)02-0061-07

国内外人口城镇化与土地城镇化 互动关系研究综述

The summary of interaction between population urbanization and land urbanization at home and abroad

陈昱

CHEN Yu

郑州轻工业学院 经济与管理学院, 河南 郑州 450002

摘要:通过对人口城镇化与土地城镇化的理论基础、相互关系、动力机制、内涵与度量方法、空间特征与匹配关系等方面的国内外相关文献进行梳理和归纳后,发现:由于国情不同,国外研究成果对于我国相关政策制定的借鉴意义有限;国内相关研究成果虽丰硕,但存在需深入探讨的问题。未来应更多采用定量方法研究人口城镇化与土地城镇化的空间非同步性问题,更多关注空间效应对人口城镇化与土地城镇化互动关系的影响,构建适合我国不同区域实际的差别化城镇化发展政策体系。

关键词:

人口城镇化;
土地城镇化;
空间效应

收稿日期: 2016-12-01

基金项目: 国家社会科学基金项目(16CJY045)

作者简介: 陈昱(1983—),男,河南省南阳市人,郑州轻工业学院讲师,博士,主要研究方向:土地资源经济、土地制度。

城镇化在拉动内需、推进全面建成小康社会等方面发挥重大作用的同时,也带来了诸如人口城镇化虚高、城镇空间建设无序乃至失控、“鬼城”“空城”频现等人口城镇化与土地城镇化非良性互动问题^[1-2],影响了经济社会的可持续发展。因此,中共十八大和十八届五中全会、《中共中央关于制定国民经济和社会发展第十三个五年规划的建议》《国务院关于深入推进新型城镇化建设的若干意见》均明确指出,要建立和完善城镇化健康发展机制,推进以人为核心的城镇化,推动农业转移人口市民化,严格设定城市发展边界,防止城市“摊大饼”式发展。在2013年中央城镇工作会议中,习近平总书记也指出,“城镇化不是土地城镇化,而是人口城镇化”。实际上,人口城镇化和土地城镇化是城镇化的两个有机组成部分,两者须良性互动、协调发展,这不仅是中国特色城镇化道路的主要标志,更是有效抑制城市病发生、发展的内生机制。本文拟梳理国内外关于人口城镇化研究与土地城镇化研究的相关文献,厘清当前研究取得的成就和存在的不足,以期对未来研究提供新的视角和切入点,为政策体系优化提供参考和借鉴。

一、国外研究现状

“城镇化”概念由西班牙学者 A. Serda 在《城镇化的基本理论》一书中首次提出,伴随着城镇化的发展和由此带来的交通拥挤、环境污染、土地浪费等问题的出现^[3],国外对于人口城镇化与土地城镇化之关系的研究也逐渐深入,相关研究主要集中在以下三个方面。

1. 人口城镇化与土地城镇化的理论基础

(1) 区位理论

区位理论是最早研究城镇形成和人口聚集的理论,以杜能的农业区位论、韦伯的工业区位论、克里斯塔勒和廖什的中心地理论^[4-5]为代表。区位理论认为,城镇化的根本动力在于,生

产要素的空间集聚使得区域间的联系更加紧密,从而创造出大于分散系统的社会效益,这被认为是人口城镇化的动力源泉。此外,区位理论关于城市空间结构和城市分布形态的研究,为城镇体系的构建提供了理论基础。

(2) 结构理论

W. A. Lewis^[6]在《劳动力无限供给条件下的经济发展》一文中,通过建立两部门经济发展理论模型,对发展中国家传统农业部门与现代工业部门并存现象进行了研究,为二元经济结构的研究提供了基础和借鉴。G. Ranis 等^[7]对 Lewis 的模型进行了修正和深化,提出了著名的“Lewis-Fei-Ranis Model”(刘易斯-费-拉尼斯模型),认为农业劳动力转向工业部门的前提条件是农业生产率大幅度提高,从而使剩余劳动力从农业生产中解放出来。Jogenson 通过建立乔根森模型,对农业部门与工业部门的相互关系进行了深入研究,提出农业消费结构的演变对工业部门发展产生了巨大的拉动作用,从而使得农业劳动力向工业部门转移^[8]。Todaro 等^[9]通过建立托达罗模型,对欠发达国家劳动力转移和城市失业问题进行了探讨,指出城市较高的收入预期和良好的生活环境吸引了大量农业人口向城市转移,为防止农村人口无序转移,应大力发展农业和农村经济,提高农业劳动力收入水平,改善农村整体生活条件。

(3) 可持续发展视角的城镇化理论

可持续发展视角的城镇化理论以英国学者霍尔德的“田园城市”、芬兰学者伊利尔·沙里宁的有机疏散理论和欧美新城市主义理论为代表。霍华德^[10]在其著作《明日的田园城市》中提出,城镇化的发展不应以牺牲乡村景观为代价,最佳的城市发展模式应该是城市文明和乡村景观的结合体,即城乡一体化的新型社会。该思想为现代城市规划理论发展提供了重要指导。伊利尔·沙里宁^[11]针对大城市过度膨胀、

城市病问题凸显的状况,在《城市:它的发展、衰败与未来》中提出,城市是由多个部门组成的有机整体,城市功能的正常运行需要良好的秩序作保证,应结合区域特点对城市进行功能定位,进而将人口疏散至不同区域中,实现城市健康发展。为解决城市郊区低密度化所导致的资源大量流失、贫富差距扩大等问题,一些欧美学者提出了全新的城市发展理念,即城市化的发展应充分尊重区域经济、社会、文化实际,重视对区域内历史文化遗产和风景名胜区的保护,提高城市规划的科学性和实用性。该理论为众多国家城镇化发展提供了指导。

2. 人口城镇化与土地城镇化的相互关系

关于人口城镇化与土地城镇化的关系,主要存在两种观点:一是人口城镇化推动了土地城镇化;二是人口城镇化与土地城镇化相互促进。L. K. Vanwey 等^[12-13]认为,大量农业剩余劳动力向城镇转移,增加了对住宅、卫生、教育等各类用地的需求,推动了城镇用地扩张,加快了土地城镇化进程;M. S. Islam 等^[14]对孟加拉国达卡市的研究发现,人口的快速增长、工业化的巨大压力导致了土地利用模式的变化,造成了城市用地的大量扩张,城市规划必须考虑空间差异和环境机会的不均等;C. L. Gray^[15]从粮食安全和生态环境保护视角出发,对不同国家城镇化过程进行研究后认为,人口城镇化和土地城镇化是一种彼此促进的关系,人口城镇化客观上导致了城镇建设用地增加,同时,城镇建设用地增加也会对农村劳动力产生吸引作用,即彼此相互促进。

3. 人口城镇化与土地城镇化的动力机制

在人口城镇化动力机制研究方面,W. A. Lewis^[16]认为,工业与农业之间的巨大收入差距是人口城镇化的主要原因,且工业部门相对于农业部门具有更强的融资能力,从而可以不断扩大生产规模,吸引更多农业剩余劳动力流入,这一过程循环往复直至两部门生产效率达到一

致;G. Ranis 等^[7]认为,“二元经济”模型不适合发展中国家国情,他们将模型进一步细化为三个阶段,并将农业生产率提高作为变量引入模型,强调其对于人口城镇化的重要性,从而提高了模型的科学性和针对性;R. M. Northam^[17]认为,经济发展对人口向城市流动具有重要促进作用;P. T. Sun 等^[18]发现户籍制度和土地征用制度是农村人口城市化的主要诱因;Y. S. Liu 等^[2]则认为,就业机会更多、公共服务更加完善和对城市生活方式的向往是农村人口向城市流动的主要原因。在土地城镇化动力机制研究方面,J. K. Brueckner^[19]以单中心理论模型为基础,全面总结了土地城镇化的影响因素,主要包括人口、交通、收入、农业地租等;在此后的研究中,J. K. Brueckner 等^[20]进一步提出,未完全估算交通拥挤的社会成本、未考虑城市开放空间的环境收益和新发展地区的基础设施成本等市场失灵因素,也会加剧城市空间的扩张;X. Z. Deng 等^[21]的研究也验证了这一观点;E. L. Glaeser^[5]对美国城镇发展的研究认为,汽车等交通工具的普及改变了居民的出行方式,提高了出行的便捷性,使得城市扩张成为可能。

二、国内研究现状

国内对于城镇化的研究始于改革开放之后,辜胜阻^[22]在《非农化与城镇化研究》一书中正式提出“城镇化”概念,并将我国的城镇化战略确定为以城市为基础的网络型城镇化和以县城为基础的据点式城镇化。此后相关理论探索系统展开,2002年“中国特色城镇化道路”的提出使讨论变得愈加热烈。国内相关研究主要集中在以下三个方面。

1. 人口城镇化和土地城镇化的内涵与度量方法

“土地城镇化”一词最早由陆大道等^[23]首次提出。周一星^[24]也认为,我国土地城镇化速度

远远高于人口城镇化速度,农民的土地被城镇化了,而农民及其家属却未被城镇化;吕萍^[25]认为,土地城镇化作为城镇化的载体,从土地利用形态转变角度看,其内涵可理解为城镇地域空间向农村推进、土地利用方式从农村形态向城市形态转化的过程;鲁德银^[26]从土地权属转变角度对土地城镇化进行了解读,认为可将其视为农村土地向城镇土地转变的过程,即土地国有化。人口城镇化是城镇化的核心要义和主旨灵魂,是解决“钟摆式”和“候鸟式”人口流动的根本途径,其内涵包括城镇常住和户籍人口占比增加、人口素质改善和提高、健康文明生活方式的形成^[27]、基本公共服务全覆盖^[28]等方面。从度量方法来看,部分学者^[29-32]采用城市建成区总面积比例和城镇人口比重来衡量土地城镇化和人口城镇化水平,认为人口城镇化和土地城镇化是一个复杂的人口、经济、社会、文化发展过程,单一指标法虽然简单易行,但过于单一和偏颇,不能反映真实城镇化水平,而采用复合指标法则可多方位、多角度测量城镇化水平^[33],如郭付友等^[34]从人口规模、人口强度和人口就业结构等维度来反映人口城镇化水平,从土地规模、土地利用强度、土地利用结构和土地利用生态水平等维度来反映土地城镇化水平;尹鹏等^[35]从非农人口数、非农人口比重、非农产业从业人员比重和人口密度等方面衡量人口城镇化水平;崔许锋^[36]从城镇人口比重、非农产业发展、人口消费水平、人口可支配收入、人均非农产值等方面构建人口城镇化评价指标体系,从城镇面积扩张、地均投入水平、地均产出水平、地均非农产值、地均固定资产投资等方面构建土地城镇化评价指标体系。

2. 人口城镇化和土地城镇化的动力机制与影响因素

人口城镇化和土地城镇化动力机制与影响因素研究是政策体系构建的重要依据。针对不同的研究区域,学者们的研究结论不尽相同。

王亚力等^[37]采用空间计量方法,对环洞庭湖各县市人口城镇化水平分析后发现,经济结构差异是人口城镇化空间结构形成的直接原因,地形结构差异是人口城镇化空间结构形成的自然基础,农业现代化水平对人口城镇化的空间分异产生了较大影响;马孝先^[38]采用结构方程模型,对全国282个地级市的研究表明,要素投入、消费需求、空间聚集、人口素质等是人口城镇化的重要推动力,提出应协同使用相关政策,优先保证内生驱动因素作用有效发挥;卢丽文等^[39]采用空间计量模型进行的研究表明,第三产业发展、城乡收入差距、城镇固定资产投资等对人口城镇化影响显著,指出应优化产业结构、培育消费市场、完善社会保障体系;邵大伟等^[40]采用分形和ESDA方法,对山东省进行的研究发现,经济、工业化、外资、科技进步、交通等是影响人口城镇化的重要因素,提出应重视大城市培育、加快小城镇发展,确保城镇化健康持续发展。对于土地城镇化扩张机理的研究最早始于经济发展速度较快、人地矛盾突出的珠江三角洲地区^[41],此后相关研究逐渐延伸至三大都市连绵区城市^[42-43]及其他中小城市^[44-45]。学者们普遍认为,经济发展、人口增长、市区职工工资总收入的增长、工业化和投资等对城镇建设用地扩张的解释度最高^[46-47]。

3. 人口城镇化和土地城镇化的空间特征与匹配关系

伴随着人口城镇化虚高、土地利用无序扩张乃至失控、环境严重污染等快速城镇化进程中一系列问题的出现,人口城镇化和土地城镇化的非协调性引起了众多学者关注。从研究视角看,主要涉及国家、省、市等层面,研究中主要采用定性分析与定量分析方法(包括相关分析、回归分析、主成分分析、耦合度模型等)^[48-49]。尽管研究视角不同、研究方法各异,但多数学者^[50-52]认为,人口城镇化和土地城镇化具有明显的空间差异

性,且人口城镇化滞后于土地城镇化,城镇化质量有待进一步提高^[53]。随着研究的进一步深入,部分学者对此提出了质疑,认为土地城镇化滞后现象同样不可忽视^[54-55]。个别学者则认为人口城镇化、土地城镇化具有区域均衡性特征^[56];分税制改革不彻底、二元土地制度、户籍制度和以投资驱动为导向的经济发展战略等被认为是导致二者不匹配的主要原因^[57];政府应改变传统城镇化发展模式,让城镇化回归市场,集中精力做好制度安排和制度创新^[58]。

三、研究述评与展望

综上所述,国外学者对于城镇化的研究开展得较早,但由于社会制度、经济发展模式、土地资源富裕度不同,加上西方国家人口数量相对较少,其研究成果对我国人口城镇化与土地城镇化协调发展的借鉴意义有限。国内学者虽对于人口城镇化和土地城镇化的内涵与度量方法、动力机制、空间特征与匹配关系等进行了多方面探索,但尚存在需进一步探讨的问题,未来研究应重点从以下方面开展。

1. 人口城镇化与土地城镇化空间非同步性问题的定量分析

已有研究多采用定性或简单定量方法探讨人口城镇化与土地城镇化的非同步性问题,对非同步性问题空间关系的研究较少,定量化分析空间非同步性问题的研究相对不足。未来研究可基于不同的时空尺度,建立科学的人口城镇化和土地城镇化评价指标体系,借助地理信息系统软件,采用分级热点探测、重心模型等研究方法,对人口城镇化与土地城镇化的失调特征、空间格局与演变规律等进行定量分析,对不同类型人地匹配关系提出合理化建议。

2. 关注空间效应对人口城镇化与土地城镇化互动关系的影响

已有研究多基于统计数据而建立全局模型

研究两者关系的影响因素,鲜见考虑空间位置的方法和手段,较少关注空间效应对两者互动关系的影响,导致模型易出现设定误差。未来研究应考虑人口城镇化与土地城镇化的空间依赖效应和空间异质现象,运用探索性空间分析、地理加权回归等研究方法,定量分析人口城镇化与土地城镇化良性互动影响因素的区域非均衡性,厘清各因素在不同空间位置的影响特征,为优化城镇化发展政策提供依据。

3. 研究体现人口城镇化与土地城镇化空间异质性的差别化政策管理体系

已有研究较少考虑人口城镇化与土地城镇化的空间异质性特征,政策体系普适性较强而针对性不足。未来研究应以资源禀赋、自然环境、产业结构、发展阶段等空间异质性所导致的人口城镇化与土地城镇化空间分布特征、动态耦合关系、外在拉力和内在推力等方面的不同,从规划管理、土地供应、集约用地、产业发展、融资体系等方面提出适合不同区域实际情况的差别化政策建议,确保人口城镇化与土地城镇化良性互动、协调发展。

参考文献:

- [1] BAI X M, SHI P J, LIU Y S. Realizing China's urban dream[J]. *Nature*, 2014(7499):158.
- [2] LIU Y S, YAN B, ZHOU Y. Urbanization, economic growth, and carbon dioxide emissions in China: a panel co-integration and causality analysis[J]. *Journal of Geographical Sciences*, 2016(2):131.
- [3] KUG J S, AHN M S. Impact of urbanization on recent temperature and precipitation trends in the Korean Peninsula[J]. *Asia-Pacific Journal of Atmospheric Sciences*, 2013(2):151.
- [4] WEBER A. The theory of the location of industries [M]. Chicago: Chicago University Press, 1909:1.
- [5] GLAESER E L, KAHN M E. Sprawl and urban growth[J]. NBER Working Paper, 2003(4):

- 2481.
- [6] LEWIS W A. Economic development with unlimited supplies of labor [J]. The Manchester School, 1954(2):139.
- [7] RANIS G, FEI J C H. A theory of economic development [J]. The American Economic Review, 1961(51):533.
- [8] 谭崇台. 发展经济学[M]. 北京:高等教育出版社, 2002:50.
- [9] TIDARO, MICHAEL P. A model of migration and urban unemployment in less-developed countries [J]. The American Economic Review, 1969(59):138.
- [10] 霍华德. 明日的田园城市[M]. 金经元, 译. 北京:商务印书馆, 2010:89.
- [11] 伊利尔·沙里宁. 城市:它的发展、衰败与未来[M]. 顾启源, 译. 北京:中国建筑工业出版社, 1986:147.
- [12] VANWEY L K. Land ownership as a determinant of international and internal migration in Mexico and internal migration in Thailand [J]. International Migration Review, 2005(1):141.
- [13] MARTELLOZZO F, RAMANKUTTY N, HALL R. Urbanization and the loss of prime farmland: a case study in the Calgary-Edmonton corridor of Alberta [J]. Reg Environ Change, 2015(15):881.
- [14] ISLAM M S, RANA M M P, AHMED R. Environmental perception during rapid population growth and urbanization: a case study of Dhaka city [J]. Environment, development and sustainability, 2014(2):443.
- [15] GRAY C L. Environment, land, and rural out-migration in the Southern Ecuadorian Andes [J]. World Development, 2009(2):457.
- [16] LEWIS W A. 二元经济论[M]. 北京:北京经济学院出版社, 1989:167.
- [17] NORTHAM R M. Urban geography [M]. New York: John Wiley & Sons, 1975:65.
- [18] SUN P J, SONG W, XIU C L, et al. Non-coordination in China's urbanization: assessment and affecting factors [J]. Chinese Geographical Science, 2013(6):729.
- [19] BRUECKNER J K. Urban sprawl: diagnosis and remedies [J]. International Regional Science Review, 2000(2):160.
- [20] BRUECKNER J K, MILLS E, KREMER M. Urban sprawl: lessons from urban economics [J]. Brookings-Wharton Papers on Urban Affairs, 2001(1):65.
- [21] DENG X Z, HUANG J K, ROZELLE S. Growth, population and industrialization, and urban land expansion of China [J]. Journal of Urban Economics, 2008(1):96.
- [22] 辜胜阻. 非农化与城镇化研究[M]. 杭州:浙江人民出版社, 1991:2.
- [23] 陆大道, 姚士谋. 中国城镇化进程的科学思辨 [J]. 人文地理, 2007(4):1.
- [24] 周一星. 关于中国城镇化速度的思考 [J]. 城市规划, 2006(s1):32.
- [25] 吕萍. 土地城市化与价格机制研究[M]. 北京:中国人民大学出版社, 2008:46.
- [26] 鲁德银. 论中国特色的土地城镇化道路 [J]. 农村经济, 2010(8):30.
- [27] 方创琳. 中国新型城镇化发展报告[M]. 北京:科学出版社, 2014:27.
- [28] 郑鑫. 城镇化对中国经济增长的贡献及其实现途径 [J]. 中国农村经济, 2014(6):4.
- [29] 林坚. 中国城乡建设用地增长研究[M]. 北京:商务印书馆, 2009:77.
- [30] 杨洋, 黄庆旭, 章立玲. 基于 DMSP/OLS 夜间灯光数据的土地城镇化水平时空测度研究——以环渤海地区为例 [J]. 经济地理, 2015(2):141.
- [31] 庞瑞秋, 腾飞, 魏冶. 基于地理加权回归的吉林省人口城镇化动力机制分析 [J]. 地理科学,

- 2014(10):1210.
- [32] 潘爱民,刘友金. 湘江流域人口城镇化与土地城镇化失调程度及特征研究[J]. 经济地理,2014(5):63.
- [33] 杜帼男,蔡继明. 城市化测算方法的比较与选择[J]. 当代经济研究,2013(10):31.
- [34] 郭付友,李诚固,陈才,等. 2003年以来东北地区人口城镇化与土地城镇化时空耦合特征[J]. 经济地理,2015(9):49.
- [35] 尹鹏,李诚固,陈才,等. 新型城镇化情境下人口城镇化与基本公共服务关系研究——以吉林省为例[J]. 经济地理,2015(1):61.
- [36] 崔许锋. 民族地区的人口城镇化与土地城镇化:非均衡性与空间异质性[J]. 中国人口·资源与环境,2014(8):63.
- [37] 王亚力,彭保发,熊建新,等. 环洞庭湖区人口城镇化的空间格局及影响因子[J]. 地理研究,2013(10):1912.
- [38] 马孝先. 中国城镇化的关键影响因素及其效应分析[J]. 中国人口·资源与环境,2014(12):117.
- [39] 卢丽文,张毅,李永盛. 中国人口城镇化影响因素研究——基于31个省域的空间面板数据[J]. 地域研究与开发,2014(3):54.
- [40] 邵大伟,吴殿鸣. 山东省人口城镇化动态特征及其影响因素[J]. 经济地理,2013(9):51.
- [41] 黎夏,叶嘉安. 利用遥感监测和分析珠江三角洲的城市扩张过程:以东莞市为例[J]. 地理研究,1997(4):56.
- [42] 李加林,许继琴,李伟芳,等. 长江三角洲地区城市用地增长的时空特征分析[J]. 地理学报,2007(4):437.
- [43] 史培军,陈晋,潘耀忠. 深圳市土地利用变化机制分析[J]. 地理学报,2000(2):151.
- [44] 俞振宁,吴次芳. 基于ESDA-GWR的浙江省土地城镇化空间特征及影响因素分析[J]. 中国土地科学,2016(3):29.
- [45] 刘世薇,张平宇,李静. 黑龙江垦区城镇化动力机制分析[J]. 地理研究,2013(11):2066.
- [46] 刘纪远,王新生,庄大方,等. 凸壳原理用于城市用地空间扩展类型识别[J]. 地理学报,2003(6):885.
- [47] 王新生,刘纪远,庄大方,等. 中国特大城市空间形态变化的时空特征[J]. 地理学报,2005(3):392.
- [48] 杨丽霞,苑韶峰,王雪禅. 人口城镇化与土地城镇化协调发展的空间差异研究——以浙江省69县市为例[J]. 中国土地科学,2013(11):18.
- [49] 李子联. 人口城镇化滞后于土地城镇化之谜——来自中国省际面板数据的解释[J]. 中国人口·资源与环境,2013(11):94.
- [50] 陆大道,姚士谋,李国平,等. 基于我国国情的城镇化过程综合分析[J]. 经济地理,2007(6):883.
- [51] 李力行. 中国的城市化水平:现状,挑战和应对[J]. 浙江社会科学,2010(12):27.
- [52] 戴均良,高晓路,杜守帅. 城镇化进程中的空间扩张和土地利用控制[J]. 地理研究,2010(10):1822.
- [53] 党国英. 提高城镇化质量必须深化土地制度改革[J]. 农村工作通讯,2015(10):52.
- [54] 陈凤桂,张虹鸥,吴旗韬,等. 我国人口城镇化与土地城镇化协调发展研究[J]. 人文地理,2010(5):53.
- [55] 李鑫,李兴校,欧名豪. 江苏省城镇化发展协调度评价与地区差异分析[J]. 人文地理,2012(3):50.
- [56] 李明月,胡竹枝. 广东省人口城市化与土地城市化速率比对[J]. 城市问题,2012(4):33.
- [57] 沈孝强,吴次芳,方明. 浙江省产业、人口与土地非农化的协调性分析[J]. 中国人口·资源与环境,2014(9):129.
- [58] 秦震. 论中国政府主导型城镇化模式[J]. 华南师范大学学报(社会科学版),2013(3):24.



引用格式:郭家睿,吕可文.黄河流域城镇化时空格局分析[J].郑州轻工业学院学报(社会科学版),2017,18(2):68-73.

中图分类号:F32 文献标识码:A

DOI:10.3969/j.issn.1009-3729.2017.02.011

文章编号:1009-3729(2017)02-0068-06

黄河流域城镇化时空格局分析

Analysis of spatial and temporal pattern of urbanization in the Yellow River Basin

郭家睿¹, 吕可文²

GUO Jia-rui, LV Ke-wen

1. 郑州大学,商学院,河南 郑州 450001;

2. 河南大学 黄河文明与可持续发展研究中心,河南 开封 475001

摘要:黄河流域的大部分地区是我国传统农耕区,横跨我国的东、中、西部,研究其城镇化时空格局,对于推动该区域城镇化协调发展与全国城镇化进程具有重要意义。搜集查找2010年和2014年108个地级市的城镇化率,利用ArcGIS与Excel软件对数据进行处理,分析其城镇化的进程、格局、原因,发现:近年来黄河流域城镇化发展较快,处于城镇化发展的中期阶段,但发展是不均衡的,由北部到东南部再到西南部,城镇化发展程度依次降低,一些经济发达城市、资源型城市和省会城市的城镇化水平较高,传统农区、边缘区域城镇化水平较低,以省会城市为中心的城市群区域形成了城镇化水平的高值区域。根据目前黄河流域的城镇化发展时空格局,应重点建设中西部地区,尽快缩小黄河流域内各地区区间的差距,有计划地、合理地开发能源资源和矿产资源,重视加工工业的发展,重点加强资源深加工,使区域综合经济能力得到提升,从资源优势向经济优势转变,带动流域经济社会又好又快发展,使城镇化发展与经济社会发展相协调。

关键词:

黄河流域;

城镇化;

时空格局;

经济区

收稿日期:2017-01-11

作者简介:郭家睿(1997—),男,河南省郑州市人,郑州大学学生,主要研究方向:会计学;吕可文(1984—),男,河南省泌阳县人,河南大学讲师,硕士生导师,博士,主要研究方向:城镇化与区域发展。

自 1980 年代以来,我国城镇化率逐年提高,年均提高 1.02 个百分点,2012 年城镇化率达 52.57%,与世界平均水平大体相当。目前我国正处于城镇化快速发展阶段。城镇化不仅可以扩大内需,而且能够促进就业,在我国经济社会发展全局中具有重要的战略意义。李晓建等^[1]认为,城镇化发展对城乡协调发展有着重要的战略意义;王开泳等^[2]认为,城镇化是社会进步的标志,也是经济发展的必然要求;吴传清等^[3]认为,推动经济带城市群城镇化均衡发展的着力点在人口城镇化。近年来,随着西部大开发、中部崛起等战略的实施,黄河流域经济社会发展快速,城镇化水平也得到进一步提高。黄河流域涉及我国四大经济区域^[4]中的三个大区:东部沿海地区(河北、山东、北京和天津)、中部地区(河南和山西)和西部地区(宁夏、青海、内蒙、陕西和甘肃),横跨东、中、西部,经济发展水平不一,城镇化类型多样,空间差异显著。该区域的大部分地区属于传统农区,城镇化进程有其自身特点,因此,本研究对于其他农区乃至全国具有借鉴意义。

一、研究区域确定与概况

1. 研究区域确定

本文界定黄河流域范围时是基于多方面考虑的,包括自然、经济与行政区划等因素。黄河流域西起巴颜喀拉山,东至渤海,南至秦岭,北抵阴山,流域面积 75.2 万平方公里。青藏高原巴颜喀拉山北麓为黄河的发源地,流经青海、甘肃、山西、宁夏、内蒙古、陕西、四川、河南、山东 9 个省、自治区,在山东垦利县注入渤海。综合经济和行政区划的因素,本文所划定的泛黄河流域包括青海、宁夏、甘肃、陕西、山西、内蒙古、河南、河北、山东、北京、天津 11 个省、市、自治区(见表 1)。这样划分的原因主要是基于黄河流域的自然范围与黄河文明、黄河文化的影响

范围,并确保各省级行政辖区的完整性。河北省、北京市和天津市以前就属于黄河流域的范围,自古就受黄河文明影响。明清以后,黄河流域政治中心北移,北京逐渐成为全国的政治经济文化中心,周围其他的黄河流域腹地也受其影响,因此本文将京津冀地区划入所研究的范围。

2. 研究区域概况

如表 1 所示,本文所研究的泛黄河流域包括 11 个省、市、自治区,下辖 108 个市地级行政区(市、州、盟)。黄河流域是中国传统农业的发源地,历史源远流长,宋元以前,黄河流域始终是我国经济发展的中心,创造了高度发达的农业文明。宋元至今,由于自然压力和人口迁移,中国经济重心逐渐南移,但黄河流域依然是重要的经济中心。截至 2014 年,本文所研究区域的总面积达 332.46 万平方公里,占全国总面积的 34.5%;流域内共有耕地 2.44 亿亩,农村人均耕地 3.5 亩,约为全国农村人均耕地的 1.4 倍;总人口 44041.76 万人,占全国总人口的 32.37%;高速公路密集,拥有北京、太原、石家庄、郑州、济南、兰州、徐州等重要交通枢纽。诸多重要的交通枢纽都与黄河流域有密切的联系,我国的京九、京广、京沪与陇海等多条重要的铁路干线都经过黄河区域。黄河流域诸多省会城市是地区经济发展的中心;青岛港、天津港、唐山港、日照港和营口港均为我国对外开放的窗口,在我国对外开放中有着举足轻重的作用;平顶山市、鄂尔多斯市、大同市是我国重要的矿产资源区,是保证我国经济社会稳定发展的能源基地;北京市、西安市、洛阳市、开封市、郑州市、安阳市、大同市都是我国历史文化积累深厚的文明古都。

二、研究数据、方法和理论

1. 数据处理与研究方法

本文选取了 2010 年和 2014 年的数据,因

表1 泛黄河流域包括的行政区

省级行政区	地级行政区
北京市	
天津市	
河北省	保定市、沧州市、承德市、邯郸市、衡水市、廊坊市、秦皇岛市、石家庄市、唐山市、邢台市、张家口市
山西省	长治市、大同市、晋城市、晋中市、临汾市、吕梁市、朔州市、太原市、忻州市、阳泉市、运城市
内蒙古自治区	阿拉善盟、巴彦淖尔盟、包头市、赤峰市、呼和浩特市、呼伦贝尔盟、通辽市、乌海市、乌兰察布盟、锡林郭勒盟、兴安盟、鄂尔多斯市
山东省	滨州市、德州市、东营市、菏泽市、济南市、济宁市、莱芜市、聊城市、临沂市、青岛市、日照市、泰安市、威海市、潍坊市、烟台市、枣庄市、淄博市
河南省	安阳市、鹤壁市、济源市、焦作市、开封市、洛阳市、漯河市、南阳市、平顶山市、濮阳市、三门峡市、商丘市、新乡市、信阳市、许昌市、郑州市、周口市、驻马店市
陕西省	安康市、宝鸡市、汉中市、商洛市、铜川市、渭南市、西安市、咸阳市、延安市、榆林市
甘肃省	白银市、定西市、甘南藏族自治州、嘉峪关市、金昌市、酒泉市、兰州市、临夏回族自治州、陇南市、平凉市、庆阳市、天水市、武威市、张掖市
青海省	果洛藏族自治州、海北藏族自治州、海东市、海南藏族自治州、海西蒙古族藏族自治州、黄南藏族自治州、西宁市、玉树藏族自治州
宁夏回族自治区	固原市、石嘴山市、吴忠市、银川市、中卫市

为2010年是我国“十一五规划”的最后一年,2014年的数据基本能反映我国“十二五规划”的末年情况。数据来源为2010、2014年相关各省的统计年鉴,参考了2010、2014年各市城镇发展的统计公报,以使数据更加准确。为了更全面地了解黄河流域城镇化的空间格局,本文采用黄河流域各市总人口数量、各市城镇人口数量、各市城镇化率三个指标来衡量黄河流域城镇化的空间格局。各省总人口是指每个省的人口总量,包括城镇人口与农业人口,城镇化率则是各市城镇人口占总人口的比重。

本文运用 ArcGIS 10.2 软件中 ArcMap 组件的空间分析能力,将 Excle 表格里面黄河流域各个地级市的城镇化率与 Arcmap 中各地级市属性表连接起来,再利用其强大的符号系统将两个年份的黄河流域城镇化空间格局以空间的形式表示出来,如图1、图2所示。有了直观的空间图形,然后再对各年份的城镇化空间格局进行分析。

2. 城市发展进程 S 曲线论

由美国著名地理学家诺瑟姆提出的城市发展进程曲线即“诺瑟姆曲线”,是世界城市化进程公理性曲线。诺瑟姆潜心研究了世界各国的城镇化发展所经历的过程,把城镇化进程划分为三个阶段:初期、中期和后期,三个阶段的城镇化进程有各自不同的特点^[5]。在初期阶段,城镇人口占总人口的比重在30%以下,农村人口占绝大多数,工农业生产效率低下,工业区域获得工作的机会非常少,而农业劳动生产率不高,无法为工业发展提供较多的劳动力,所以要经历几十年甚至上百年的时间才能让城镇人口比重提高到30%。这表明城镇化进程才刚刚开始。中期阶段的判断标准是城镇化水平为30%~70%。该阶段由于工业基础已显著增强,经济实力比较雄厚,农业劳动生产率大大提高,工业发展促进了大批农业人口向城市转移,城镇人口比重在几十年内突破50%上升到70%。城镇化水平达到70%以上则为后期阶

段的判断标准,这个阶段城镇化发展进入了成熟期,农村人口的相对数量和绝对数量不断下降。为了维持一定的农业规模,农村人口的转移趋于停止,最后稳定在 10% 左右。后期的城市化策略不再追求农村人口向城镇人口转变,发展的重心是劳动力从第二产业向第三产业转移,城市逐渐成熟化并处于稳定阶段,现代化城市已基本形成。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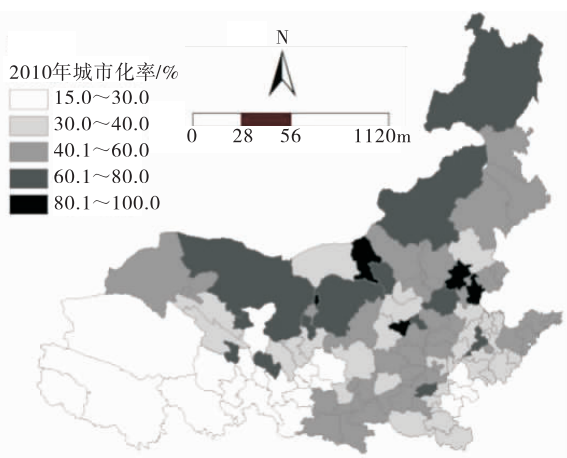


图1 2010年黄河流域城镇化空间格局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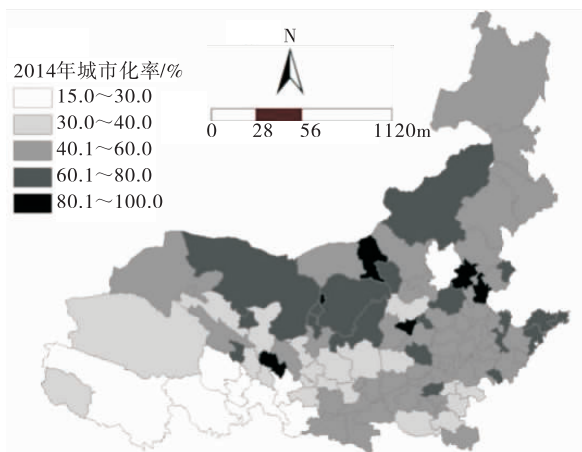


图2 2014年黄河流域城镇化空间格局

三、黄河流域城镇化进程与时空格局

1. 黄河流域城镇化进程

2010年黄河流域人口密度为每平方公里 143 人,高于每平方公里 134 人的全国平均值。

其中,城镇人口 4543 万人,城镇化率为 40.0%,处于城市发展进程的中期阶段,比全国平均值 44.1% 略低。2014 年,黄河流域的城镇化率与全国城镇化率的差距有所缩小,如东部的山东省为 53.75%、中部的河南省为 45.2%、西部的青海省为 48.73%,而 2014 年我国城镇化率为 56.77%。2010—2014 年,黄河流域城市群地区城镇化发展综合水平逐年提升,且呈现下游高于中游、中游高于上游的梯度格局,其空间差异在峰谷波动中有所扩大;黄河经济带城市群地区城镇化的四大子系统发展存在显著的动态演变特征。由于经济、社会等因素的共同作用,欠发达地区与下游发达地区的差距明显。2014 年,黄河流域东部区域经济发展水平比较高,其城镇化基本进入中后期阶段;内蒙古和中部地区近年来经济发展迅速,进入城镇化中后期;西南部地区在 2010 年之后经济增长速度较快,城镇化水平有所提高,但由于其人口较少且受当地条件限制,目前基本处于城镇化中期。

2. 黄河流域城镇化时空格局

黄河流域东部交通便利且经济较为发达,2010 年城镇化率为 65.26%,2014 年城镇化率为 69.96%。东部的城镇化较黄河流域的中部与西部发展速度快,而西部属于我国偏远地区,与东部地区相比交通不便且经济发展比较落后;东部地区如山东省,大部分城市地理位置优越,第二产业与第三产业较为发达;而中部地区 2010 年城镇化率为 43.78%,2014 年为 55.03%,如河南省作为传统的农耕区,农村和农业人口比重较高,城市化进程缓慢;黄河流域西部 2010 年城镇化率为 43.93%,2014 年为 53%,如青海省各州县属于偏远地区,且由于其特殊的气候条件,人口稀少,所以城镇化进程一直发展缓慢。由图 1 可见,东部与中部城镇化发展水平整体上高于西部,西部的城镇化较为落后,但是从图 2 来看,西部地区的城镇化发展速度却高于东部

和中部。虽然黄河流域各部分的城镇化率有差异,但是这种东西部不平衡的格局有缩小的趋势,且东部和中部地区的城镇化率还在增长,这对于带动周边的经济发展具有重要的作用。黄河流域为我国的传统农耕区,农业人口比重较大,相对于全国其他地区来说,农村人口比重较高,缺乏强大的经济增长核心区,尽管已初步形成了具有一定经济实力的中原城市群、济南城市群与关中城市群,但是与长江三角洲、珠江三角洲、黄渤海湾三大国家级经济增长极相比,无论是经济规模还是城市建设都存在着很大的差距。

3. 基于地市单元的黄河流域城镇化时空格局

以108个地级市为基本单元,分析图1可以发现,黄河流域城市经济发达地区城镇化进程相对较快,如青岛、北京、天津、太原、兰州、乌海等。乌海市属于内蒙古自治区的新兴工业城市,北京、天津、唐山为京津唐工业基地,经济发展水平高,城镇化水平也高,在50%左右,处于“诺瑟姆曲线”城镇化中期阶段,且城镇化率的最高点就产生在这几大城市中。邯郸市和大同市的煤炭资源丰富,经济发展以资源开发为主,所以城镇化水平也相对较高。黄河流域城镇化水平低的部分则出现在西南部,如玉树州、果洛州、海西州、海南州,城镇化率普遍处于25%左右,这些地区地理位置较为偏僻,交通不便,经济落后,影响了其城镇化的发展。总体来说,东南部地区的城镇化率较高,且连成一片,尤其是中部、东部与南部地区。青海省与宁夏回族自治区的城镇化率相对于黄河流域的其他省市要低,只有西宁、银川等相对较大的省会城市的城镇化率明显比其周围地区要高。

图2展示了2014年黄河流域城镇化格局,总体来说,黄河流域的城镇化率较2010年已有所提升,并且除了西南部外,其整体城镇化差异

逐渐缩小,但是黄河流域横跨东中西三个区域,仍存在着较大的地域空间差异。如属于传统农业区的河南省,城镇化率在35%~45%,按照S曲线论,处于城镇化发展的中前期,并且从2010年至2014年,中原地区的城镇化率并没有较大的改变。黄河流域东部地区的城镇化率高于中部和西部区域。东北部地区与东南部地区几乎连成片状,西南部形成一片,城镇化率普遍较低。无论是2010年还是2014年,黄河流域城镇化率最高地区都出现在包头、北京、天津、太原、兰州、乌海等城市,并且最低地区也没有发生较大的变动。

4. 黄河流域城镇化时空格局变化分析

2010—2014年,黄河流域中部地区的城镇化率稳步发展,且呈现出逐步上升的趋势。变化最显著的要数黄河流域的西南、西北地区,由初级水平进入了中级水平。2010—2014年,经济重心逐渐向西北方向迁移,在这四年间,东部地区的城镇化率增长了4.7%,中部地区的城镇化率增长了8.43%,西部地区的城镇化率增长了10%。可见,东部地区的城镇化率增长最为缓慢,而西部地区的城镇化率增长最快。内蒙古、青海、甘肃等省份经济持续快速发展,是经济重心向西北方向迁移的主要原因。北部地区在三个地区中发展最为突出,近几年,由于国家政策的扶持,如新一轮西部大开发、大力促进中部地区崛起、积极支持东部地区率先发展等国家区域发展战略的实施,黄河流域经济发展迅速,经济发展水平的提高使得农业人口向城镇转移。黄河流域属于中国早期农业经济开发区,重要的农业生产基地有:上游的宁蒙河套平原、中游的汾河盆地与下游的引黄灌溉区等。这些地区农业人口比重较高,经济发展缓慢,故加快推动黄河流域的城镇化进程,对于全国的城镇化发展具有重要的意义。正如工业化一样,城镇化也是一个国家由贫穷落后走向繁荣

发达的必由之路,也是农业现代化的重要保障、工业化的必然趋势、市场经济发展的必然条件和第三产业发展的强大动力,同时,城镇化也可极大地促进工业化、现代化和市场经济的发展。东西部城镇化发展不平衡的存在,导致了黄河流域地区间居民的收入水平和生活质量都有很大差别,所以缩小地区之间城镇化发展水平的差距势在必行。

四、结论与启示

1. 主要结论

黄河流域城镇化发展格局的明显特征是不均衡。黄河流域包括东、中、西三大部分,这三大部分经济发展差异明显,且人口数量差异较大,由北部到东南部再到西南部,城镇化发展程度依次降低;经济发达的城市、资源型城市、交通便利的城市、旅游业较为发达的城市城镇化发展较为迅速,传统农区、边缘区域的城镇化水平较低,以省会城市为中心的城市群区域形成了城镇化水平的高值区域。

2. 政策启示

城镇化是经济社会发展的必然趋势,也是中国现代化进程的必由之路,进入 21 世纪以来,城镇化越来越受到民众和中国高层的重视^[6]。新型城镇化建设将是我国未来经济社会发展的重要引擎,对于扩大内需^[7]、缓解产能过剩和建设和谐社会等都具有重要意义^[8]。黄河流域城镇化发展不平衡,不利于地区经济发展和社会和谐稳定。为了社会的和谐稳定和全面建成小康社会目标的实现,根据目前黄河流域

的城镇化发展时空格局,应重点建设中西部地区,尽快缩小黄河流域内各地区间的差距,有计划地、合理地开发能源资源和矿产资源,重视加工工业的发展,重点加强资源深加工,使区域综合能力得到提升,从资源优势向经济优势转变,带动流域经济社会又好又快发展,使城镇化发展与经济社会发展相协调。

参考文献:

- [1] 李晓建,余丽敏,王凯圣. 2000 年以来山东省县域城镇化空间格局研究[J]. 中国科学院,2000(3):4.
- [2] 王开泳,陈田,董玛. 我国中部地区人口城镇化的空间格局[J]. 中国科学院,2008(8):1.
- [3] 吴传清,万庆. 长江经济带城镇化发展的时空格局与驱动机制研究——基于九大城市群 2004—2013 年数据的实证分析[J]. 武汉大学学报(哲学社会科学版),2015(5):44.
- [4] 胡伟,张玉杰. 中国工业发展的空间格局演变[J]. 经济地理,2015(7):106.
- [5] 陈明星,叶超,周义. 城市化速度曲线及其政策启示——对诺瑟姆曲线的讨论与发展[J]. 地理研究,2011(8):12.
- [6] 王格芳. 科学发展观下的中国城镇化战略研究[D]. 济南:山东师范大学,2013.
- [7] 马晓河,胡拥军. 中国城镇化的若干重大问题与未来总体战略构想[J]. 农业经济问题,2010(11):50.
- [8] 王本兵. 我国城镇化发展的制度创新研究[D]. 青岛:中国海洋大学,2011.



引用格式:赵增明. 传统企业的互联网化探究[J]. 郑州轻工业学院学报(社会科学版), 2017,18(2):74-79,86.

中图分类号:F272.3 文献标识码:A

DOI:10.3969/j.issn.1009-3729.2017.02.012

文章编号:1009-3729(2017)02-0074-07

传统企业的互联网化探究

Study on the internet-enabled practices of traditional enterprises

赵增明

ZHAO Zeng-ming

河南警察学院 人事处, 河南 郑州 45000

摘要:在互联网时代,传统企业实现互联网化已成为提高其竞争力的重要保障之一。顾客导向是传统企业互联网化的核心,商业模式互联网化和组织流程互联网化是传统企业互联网化的主要内容,组织僵化和跨界协调困难是传统企业互联网化的主要挑战,实施“+互联网”和“互联网+”两步走的策略,有利于传统企业互联网化进程的分步实现。“e袋洗”和“尚品宅配”的互联网化实践为传统企业的互联网化提供了借鉴。

关键词:

传统企业;
互联网化;
用户导向;
个性化规模经济

收稿日期:2017-02-13

作者简介:赵增明(1985—),男,河南省淮阳县人,河南警察学院讲师,中国社会科学院博士研究生,主要研究方向:经济管理。

《国务院关于积极推进“互联网+”行动的指导意见》的制定和“大众创业,万众创新”政策的推出,使互联网成为经济发展的新引擎。互联网时代,信息传递速度更敏捷、成本更低,而且突破了时空限制,企业间的竞争呈现出新的特点。广大企业面临着顾客日益多样化和个性化的需求,产品的更新换代周期逐渐缩短,这对企业的生存与发展提出了更高的要求^[1],对传统企业来说,互联网化既是机遇又是挑战。如何在互联网时代找准自己的定位,充分利用互联网来改变自己的商业模式和业务流程,是传统企业必须面对和解决的一个重大难题。鉴于此,本文拟在对传统企业互联网化过程中的机遇和挑战进行系统分析的基础上,指出传统企业互联网化的实现路径,以推动传统企业健康可持续发展。

一、相关概念内涵界定

1. 互联网化

根据《国务院关于积极推进“互联网+”行动的指导意见》,互联网化就是把互联网的创新成果与经济社会各领域深度融合,推动技术进步、效率提升和组织变革,提升实体经济创新力和生产力,从而形成更广泛的以互联网为基础设施和要素的经济社会发展新形态。根据李海舰等^[2]的研究,我们可从互联网精神、互联网理念和互联网经济三个层面,对互联网化进行解析。

互联网精神是开放、平等、协作和共享。开放,是指在满足既定的客观规则下,任何个体和组织都可以自由加入,减少了主观决策的随意性,模糊了企业与企业之间的组织边界。平等,就企业内部而言,是指高层服务于基层进而服务于用户,权力逐渐下放到员工手中;就企业间关系而言,是指由纯粹的竞争关系走向竞争-合作的关系;就企业与用户的关系而言,是指用

户从被动的产品接受者到成为产品参与者或创造者^[3]。协作,是指企业由公司生产转向社会生产,充分利用企业外部的资源,博采众长,以提高生产效率、降低生产成本。共享,是指在互联网背景下,几近于零的生产成本为资源的公平分配提供了可能。

互联网理念包括双轨制(线上线下相结合)、跨时空、异质化和模块化^[4]四个方面的内涵。双轨制,是指不仅线下实体与线上电商各自独立运营,而且线上与线下互相补充。企业通过网站将产品在线上进行展示和推广,可以使用户在线挑选自己心仪的产品或进入实体店现场体验产品,然后做出购买决策、下单购买和线上支付,最后线下取货,产品销售线上和线下一体化,满足用户需求,使用户获得更大的价值体验。异质化,也可称为多样化或个性化,是顾客导向最直接的体现。模块化是异质化的结果,由于产品多样化,无法实现批量生产,因此必须对产品流程进行模块化处理,而后对模块进行批量生产,以实现规模经济。

互联网经济是基于交易技术层面的长尾理论和交易结构层面的市场均衡理论的一种经济形态。在传统市场上存在明显的“二八定律”,也就是20%的畅销产品获得80%的利润,而80%的滞销产品仅获得20%的利润。然而,由于互联网化降低了供需双方的搜索成本、匹配成本和信任成本,从而降低了交易成本,使得80%的长尾产品得到了更多的关注。当实现规模经济时,消费者的需求会得到更大程度的满足。互联网化降低了生产者与消费者之间的信息不对称性,提高了消费者的议价能力,更有利于市场的均衡发展。

2. 商业模式互联网化

商业模式互联网化指在信息化的技术、产业和社会环境中,以顾客导向为核心,以价值原则为支撑,以价值模式、营销模式、盈利模式

和运营模式的变革为途径,最终实现商业模式的创新。从价值视角看,商业模式所包括的四种模式分别对应为价值发现、价值传递、价值获取和价值维护^[8],它们之间的关系如图1所示: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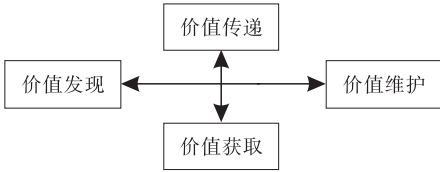


图1 商业模式互联网化示意图

顾客导向是商业模式互联网化最显著的特征。尽管顾客常常被称为“上帝”,但是在传统市场环境中虚假广告等信息不对称现象普遍存在,顾客常常被误导,因此没有实现真正意义上的顾客导向。由于受时间、空间、体力与精力的限制,顾客通常只能通过“货比三家”获得零星的市场信息,而难以根据充分的市场信息做出理性决策。传统企业为了充分发挥自己的实体经验和优势,同时为了适应互联网化的市场环境,形成了“实体+电商”的双轨制经营模式。通过在线进行商品搜索,顾客可以更有效地定位到心仪产品,并根据“口碑”信息与在线的商品比较,更好地满足自己的偏好;通过实体店进行产品体验,顾客可以享受到产品之外的增值服务。此外,互联网拉近了商家与顾客之间的距离,顾客通过浏览在线评论,能够跨时空获得更多的产品信息,其“口碑”信息会对企业产生更为重要的影响,顾客因而会成为真正意义上的“上帝”^[6]。

价值是商业模式的核心,商业模式本质上是对企业和顾客之间价值传递过程的设计。商业模式的互联网化,就是企业借助互联网向顾客传递价值、促使顾客支付,并将其转化为利润的一种方式。这一过程突出了顾客的核心作用,包含识别价值、创造价值和交换价值等

环节。

价值模式又称价值发现,互联网化模糊了企业边界,使得企业的价值搜索范围得到了拓宽。企业可以与企业外部的合作伙伴进行数据、信息和知识的交流,在交流中,企业可以获得外部的有价值信息,也可以将内部的信息资源应用于企业外部,从而实现更高的资源利用率。价值发现是企业获取经济效益的第一步,是后续活动的基础。

营销模式又称价值传递,是企业发现或获取价值的基础上,通过一系列基于互联网的营销手段,将价值由企业内部传递至目标顾客。价值传递的工具通常是商业化的产品和服务,是流出型的价值转移,企业借助互联网能够有效地定位目标顾客,实现更有针对性的营销。

盈利模式又称价值获取,是企业将携带价值的产品或服务传递给顾客后,从顾客身上获得市场上等价的经济效益,一般以货币和需求信息为核心内容,是流入型的价值转移,与价值传递过程共生存。随着移动互联网的发展,支付手段和促销方式日益多样化,价值获取方式也更加多样化。

运营模式又称价值维护,是将发现和获取的资源进行一定程度的整合与内化,使之成为企业的内部价值,为企业在竞争性市场中的生存与发展提供保障。

3. 组织流程互联网化

组织流程互联网化是指企业为了满足客户需求,而在内部实行的基于互联网的正式和非正式的行事方法,包括负责关联协调的横向组织结构和负责员工部署的纵向业务流程。

业务流程是将一个或多个输入要素通过生产性活动转化为一个或多个产出的一系列活动,输出结果对顾客意味着价值的增加。商业模式主要指的是企业间的交互活动;而业务流

程主要指的是企业内部的活动,即企业内部一系列增值活动的集合。组织结构指的是组织内部各个要素之间的关系,具有复杂性、规范性、集权和分权的特点。业务流程和组织结构之间是共生共存的关系,业务流程依赖于组织结构的支撑,同时又决定了组织结构的形式,而组织结构只有依赖于业务流程才能发挥作用,于是组织结构和业务流程就组成了企业内部纵横交错的管理线条。纵向管理负责员工部署,横向管理负责协调合作,共同服务于组织目标——满足客户需求。随着互联网技术的发展,信息管理更加批量化,使得管理跨度大幅度增加,企业内部的组织结构可以实现更大程度的扁平化,减少信息在企业内部传递过程中的损耗,有利于提高组织的运行效率。此外,一套科学合理的业务流程不仅可以降低企业的运营成本,提高工作效率和工作质量,而且可以将增值活动逐渐与员工特质分离开来,有利于企业的长久经营。在互联网背景下,企业必须快速做出决策,更有针对性地推出新的产品和服务,以维持企业在市场竞争中的优势地位。因此,互联网化为企业更有效和更长久的经营提供了可能。

二、传统企业互联网化的机遇与挑战

随着互联网技术的发展,人们逐渐走入了互联网时代,互联网化成为传统企业发展的必然趋势。互联网化给传统企业既带来了新的发展机遇,也带来了新的挑战。

1. 机遇:开放式创新与双轨制经营

传统企业互联网化的机遇主要体现在两个方面:一是传统企业的互联网化弱化了企业的组织边界,促进了开放式创新;二是传统企业的互联网化开启了双轨制的企业经营模式,更有利于企业与用户的信息沟通和服务提供。

其一,互联网化促进了企业与企业之间的合作共享,模糊了企业的组织边界。这一变化,一方面,有利于企业从外部获得有价值的异质性数据、信息和知识,以服务于本企业,带来突破性的创新成果;另一方面,有利于企业将内部无法得到重复使用的资源分享到企业外部,从而提高企业的资源利用率。因此,互联网化既可以促进流入型的知识转移,又可以促进流出型的知识转移,从而有利于企业内部与企业间的资源共享,促进更开放的交流与合作。此外,企业组织边界的模糊,使得企业可以将更多不涉及核心能力的业务外包给更专业的企业,同时也可以使企业凭借自己的核心能力接受其他企业的外包业务,使各企业尽其所能,充分展示企业的专业化水平,为客户提供更好的服务。

其二,线上电商与线下实体共存的双轨制,使企业既能维持自己的传统经营方式,又可以植入互联网基因,协同合作、相辅相成,促进企业在互联网时代维持竞争优势。从客户的视角看,双轨制一方面能够通过线上服务的时空突破降低搜索成本,另一方面能够通过线下服务提高体验价值和供需匹配率,更好地满足需求。从企业的视角看,长期的线下经营使得企业产生了固定的营销渠道、客户关系,双轨制能够充分利用企业既有的经验与能力,保持企业的当前收益,这在互联网时代初期有利于维系企业的短期利益,保证企业的当前生存,而线上电商能够发挥互联网的优势,不断扩大用户群,更好地把握用户需求,使用户参与到企业产品的研发中,保证企业未来的竞争优势,这有利于企业获得长期收益。

2. 挑战:组织僵化与跨界协调

传统企业的互联网化能够推进企业转型升级,然而传统企业的互联网化也面临着很大的挑战。组织僵化和语义差异(沟通不畅)构成了两个主要的挑战。一方面,企业既有商业模

式和组织流程的成熟,以及对当前绩效的满足,使企业的既得利益者对互联网化持反对态度,因此,组织僵化会极大地阻碍企业的互联网化进程;另一方面,传统企业的互联网化既需要对传统企业的经营运作具有透彻的了解,同时也需要一定的互联网思维和实现技术,二者之间存在显著的技术边界。因此,语义差异是传统企业互联网化的又一挑战。

1991年, March 提出,当企业现有的活动能够满足既定的绩效目标时,企业便会不断地强化现有活动,而对于改变持反对态度,这种倾向称为“成功陷阱”,又称“组织僵化”^[7]。也就是说,既得利益者为了保护自己的既得利益,会对不确定的转型持不积极的态度甚至会采取排斥行动,业务层的员工由于对现有的操作流程已经驾轻就熟,因而对于新的、自己无法掌握的改变也会持抵制态度。互联网作为一项新兴的技术,通常会脱离传统企业既得利益者的掌控。互联网技术应用的不确定性,以及互联网思维与传统企业经营运作思维的差异性(传统企业通常是生产者主导,而在互联网思维下则变成了消费者主导),都使得组织内部抵制现有状态的改变。传统企业在发展电商时,除了面临着企业内部的反对,还会遭到同行业线下经销商的抵制,从而在销售上被迫采取线上线下不同产品、不同价格的双轨制。

传统企业的互联网化不应仅仅停留于思维层面,还需要通过互联网技术来实现。因此,传统企业的互联网化,既需要对传统企业的经营运作有很深的了解,包括企业所处的宏观环境和微观环境、管理和掌控能力等;同时又需要对互联网领域的知识具有深入的了解,包括互联网思维和互联网技术。然而,传统企业领域与互联网领域具有截然不同的语义表达方式,因此,在传统企业的互联网化进程中,纯粹的互联网领域的人才和纯粹的传统企业领域的人才,

都很难成功地使企业实现互联网化。因此,沟通障碍或语义不畅是阻碍互联网与传统企业相融合的又一挑战。

三、传统企业互联网化“两步走”策略

如前所述,传统企业的互联网化进程充满挑战,难以一步到位,因此,需要在目标的指引下分阶段实现。互联网化是将互联网植入企业的商业模式和组织流程中,因此,“+互联网”和“互联网+”本质上都是互联网化,只是分别发生于互联网化的不同阶段。基于此,本文提出传统企业互联网化“两步走”的实施策略:先实现“+互联网”,后实现“互联网+”。

“+互联网”是指企业在原有业务基础上,通过互联网对接用户,实现从需求收集到商品生产与服务发售等各个环节整体能力的提升,是以传统企业为主导,以现有成熟的业务为基础,利用互联网精神、互联网思维和互联网技术,拓宽用户市场,促进企业与用户的有效沟通。“+互联网”是一种顺势性的创新,能够充分利用企业当前的资源与能力,具有更大的确定性和可靠性。而“互联网+”是一种根本性的创新,是以互联网为主导,以现有成熟业务为辅助,充分利用互联网的技术优势和体制优势,改变传统的商业模式和组织流程,实现以用户为中心的数据驱动型增长。因此,传统企业在互联网化进程中,首先应实施“+互联网”策略,在此过程中深入地理解互联网思维,学会使用互联网技术,培养跨行业的复合型人才,为实现企业由传统企业到互联网化企业的转变创建一个缓冲期。这一方面能够为传统企业的互联网化提供充分的准备,另一方面也能在一定程度上融化组织僵化和跨界沟通的坚冰。

在实施上述“两步走”战略的过程中,培养跨专业的复合型人才至关重要。能把传统企业

成功实现互联网化的人肯定不是互联网领域的人才,而是来自传统企业的人才,因为他们对传统企业的经营细节和技巧非常熟悉;从实践上看,互联网领域的人要想搞懂传统企业的运作细节则需要很长时间。因此,最好的方式是组成专业的互联网化团队,以对传统企业商业模式和组织流程熟知的人员为主,以具有互联网思维和掌握互联网技术的人员为辅,两类人员互相补充,相辅相成,为企业的互联网化提供具体可行的实施方案和技术支持。

四、传统企业互联网化的成功案例

传统企业互联网化主要是将传统的业务流程简单化、模块化,从而能够在满足个性化需求的基础上,实现批量生产。荣昌公司“e袋洗”的互联网化实现了业务方式的简化,“尚品宅配”则同时实现了个性化定制与批量生产,从而成为传统企业互联网化的成功案例。

荣昌公司的“e袋洗”是O2O的第一次尝试,具体的运作流程是:第一步,客户在微信中下单,每袋99元;第二步,“e袋洗”会根据客户的下单数量,将专用的装衣袋快递给用户;第三步,用户将衣服装到袋子里;第四步,员工上门取件;第五步,通过微信与用户商定衣物的处理;第六步,将处理好的衣物快递给用户,完成洗衣服务。“e袋洗”将原来100多种洗衣服务简化为上述六个步骤,主要包括线上、实体店和配送三个模块,是传统洗衣企业互联网化的典型示例^[8]。

“尚品宅配”完美地实现了柔性生产和大规模定制,将定制转化为选择,是C2B模式的典型

示例^[9],具体的业务流程如图2所示。

“尚品宅配”通过统计与整合,发现虽然房型各不相同,但是卧室和客厅的种类有限,从而可以将整套房子拆分为独立的房间,进而拆分出配套的家具,并将配套家具拆分为不同型号的板材。也就是说,构建了“房型库—产品库—设计库”三位一体的云设计库,业务人员根据顾客的需求信息,在云设计库中找出类似的设计成品,只需根据客户需求进行微小的调整即可。随着累计业务量的增加,云设计库中的设计库、产品库与房型库呈滚动性增加。在五六年经营中,“尚品宅配”为3万多个楼盘、40多万户家庭共计提供了近30万个个性化方案。基于该系统,“尚品宅配”的产能提高了10倍,材料利用率达93%以上,出错率仅为先前的十分之一,交货周期缩短了50%。

五、结语

互联网时代的到来,在为传统企业的生存与发展提供新的契机的同时,也给传统企业带来了很大的挑战。传统企业的互联网化是企业谋求持久竞争优势的有效路径,模糊组织边界有利于企业获取外部关键资源,实现线上线下共同经营的“双轨制”,更好地满足客户需求。然而,组织僵化、跨界协调的困难,以及跨行业复合型人才的短缺,都阻碍了传统企业的互联网化进程。本文提出的“+互联网”和“互联网+”两步走策略,有利于推动传统企业互联网化进程的顺利实施。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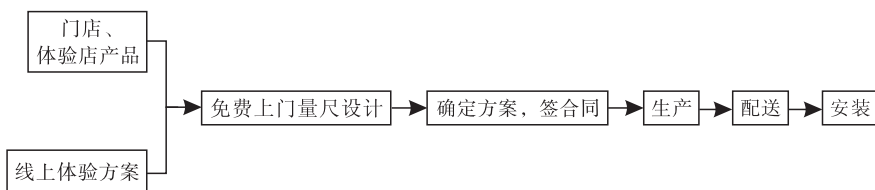


图2 尚品宅配业务流程



引用格式:夏梁省. 浙江台州民间金融内生发展与演进路径研究[J]. 郑州轻工业学院学报(社会科学版), 2017, 18(2): 80 - 86.

中图分类号: D669. 4 文献标识码: A

DOI: 10. 3969/j. issn. 1009 - 3729. 2017. 02. 013

文章编号: 1009 - 3729(2017)02 - 0080 - 07

浙江台州民间金融内生发展与演进路径研究

Study on the endogenous development and evolution path of folk finance in Zhejiang Taizhou

夏梁省

XIA Liang-xing

中共台州市委党校, 浙江 台州 318000

关键词:
民间金融;
民营企业;
众筹资金;
P2P;
民间金融服务中心

摘要:台州民间金融的发展,内生于台州地方经济发展和传统银行体系的缺陷,区域内资金供求矛盾的尖锐化为民间金融提供了巨大的生存与发展空间,并在新的经济环境和信息技术条件下呈现出新特征与新问题。现阶段台州民间金融的演进过程主要体现为政府干预下的金融体制改革和金融组织形式创新,未来台州民间金融发展的主要模式是众筹金融通模式、P2P金融通模式和民间金融服务中心模式。

收稿日期: 2015 - 08 - 07

基金项目: 2015年浙江省社科联研究课题(2015B100); 台州市哲学社会科学规划课题(15GHQ14); 台州市社会科学重点研究课题(14YZ04)

作者简介: 夏梁省(1986—),男,浙江省台州市人,中共台州市委党校讲师,硕士,主要研究方向:民营经济、民间金融。

民间金融是经济制度与金融制度非均衡发展的产物,在我国现有金融体系下,以国有商业银行为主体的传统金融机构无法充分满足处于融资弱势地位的市场主体对资金的需求,而民间金融的涌现能够修复这一融资缺陷。资金供求矛盾的尖锐激化为民间金融提供了巨大的生存与发展空间。浙江省温州、台州地区存在着数量众多的中小微企业,其中许多企业由于不具有常规金融融资条件,只能通过民间金融的形式获取生存与发展所需资金。台州作为民间资金流动最为活跃的地区之一,以民营银行为主体的民间金融呈现出蓬勃发展的势头,并表现出多样化特征,主要以民间借贷、地下钱庄、民间集资与合会等形式出现。台州民间金融对台州实体经济的运行具有重要的作用。但是,从台州民间金融的内生发展进程中也可看出,由于存在政府行政干预、制度缺陷、立法空白、信用风险管控等问题,民间金融的发展长时间在黑暗中跋涉,有待真正转变为符合国际通行规则的合作金融模式,实现阳光化发展。鉴于此,本文拟在对国内外相关研究进行梳理的基础上,分析台州民间金融的内生机制和演化路径,以推动台州民间金融持续健康发展。

一、国内外相关研究综述

随着民间金融的不断演变,理论界对民间金融的研究也在逐步深化。目前的研究成果主要体现在对民间金融产生的体制动因、形式特征、风险防控等方面;在研究方法上,很多学者尝试从不同视角剖析民间金融产生与发展的内在机理。在国外,Geertz与Ardener两位学者分别从人类学与社会学的角度,系统研究了印度尼西亚、越南与中国存在的三种不同的民间金融形态,尝试去解释民间金融产生的内在动因。^[1]国内的研究发端于东部沿海地区,民间金融活动的活跃引起了许多学者的关注。例

如,杨光^[2]较早对我国民间金融的运行方式、经济背景、企业主体的融资模式和民间金融的机制建设等进行了系统理论研究;陈蓉^[3]从文化学和社会学角度分析了我国民间金融的演化历程和路径依赖;齐广利^[4]立足于个人对浙江民营经济的深入研究,探究了民营企业的融资方式,发现民间金融在民营企业的初创阶段发挥了重要作用,并通过许多实证案例,揭示了民间金融在浙江东部沿海地区的内在发展活力;蔡四平^[5]从实证分析角度对民间金融的“负投资”效应进行了探讨,提出了民间金融演进的路径与方向;张德强^[6]对民间金融的产生背景、发展阶段、运作形式与机制、风险防控与制度特点等进行了系统研究;马广军^[7]从浙江民间金融的法制保障、金融监管和司法,以及民间借贷和非法集资等进行了审慎分析。这些研究深化了对民间金融的认识。

二、台州民间金融的内生机制分析

台州民间金融的发展打上了非常明显的台州民营经济烙印,有其内在运行机制。民营企业与民间金融的共生发展,是民间金融生存与发展的先决条件,而利益驱动下自发形成的民间资金融通机制,则使得民间金融发展长久不衰。

1. 民营企业与民间金融的共生发展

由于台州许多民营中小微企业在资金不足时无法通过正规金融渠道获取稳定的资金来源,因此多通过民间融资渠道获取所需资金。^[8]台州民间资本相对充裕,能够为中小微企业提供稳定的资金来源,按照萨伊的“供给自动创造需求”定律,在民营经济蓬勃发展时期,民间资本与民营企业会自然而然地形成“共生体”,两者相互促进,实现共生发展。^[9]

民营企业在其资金短缺时是资金的需求方,在其资金富裕时又是资金的供给方,在民间

金融的发展过程中民营企业是最为重要的主体。在温州、台州地区,银行、民营企业与民间借贷者之间通常表现为一种“伴生”关系,在民营企业出现短期资金需求无法得到满足的情况下,以担保公司、投资咨询公司、物资调剂商行、典当行等为代表的民间金融组织,能在短期内为企业筹集到相应的资金,为企业提供短期信贷。过去很长一段时间,温州、台州地区对外贸易蓬勃发展,民营企业资金需求异常迫切,这就直接催生了一大批从事民间借贷的金融组织与资金捐客。民营企业与民间资本相伴而生,形成了密不可分的共生关系。

2. 利益驱动下的民间资金融通机制

改革开放以来,以温州、台州为代表的浙江东部沿海地区,在股份制企业取得巨大成功的背景下,兴办实业的风气盛行,涌现了一大批中小微企业,这些企业不断扩张发展,有着旺盛的资金需求,直接催生了以民间借贷为主要方式的民间金融活动,出现了具有互助、互利性质的“做会”“标会”,民间借贷俨然成了“第二银行”。

民间借贷自古以来就一直存在与延续着。在古代就存在以“会”为表现形式的民间金融组织形式,而后又出现以当铺、钱庄、账局、票号等为组织形式的民间金融机构。相比于早期的“会”,以典当和钱庄为代表的民间金融形式已经走向成熟,有了从事民间借贷的固定场所、规章制度与组织机构。改革开放早期,在浙江民间也盛行“会”这样一种初级金融形式,在民间资金融通过程中曾经发挥着重要作用。在“会”的组织当中,“会主”凭借自身的威望与信誉充当资金捐客,从民间资金的借进与借出中赚取利润。“做会”形式的民间借贷经过演变,逐渐形成了互助性的呈会与盈利性的会两种民间借贷形式,进一步细分为“轮会”“摇会”“标会”“抬会”“排会”等形式(见图1)。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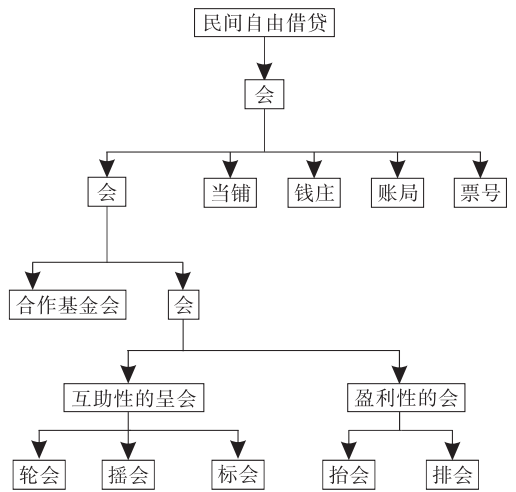


图1 民间金融组织的演变过程和机构形成

从民间金融组织的演变过程不难发现,在利益的驱使下民间资本从来没有停止过流动,并以民间借贷的方式不断实现着自身的价值增值。尽管以银行为代表的现代金融体系已经较为健全,对社会资金需求也具有较广的覆盖面,但是仍不能完全满足社会上的融资主体对资金的差异化需求,民间金融的存在仍是合理的。浙江地方经济发展较为明显的特点就是中小微企业数量庞大,其中很多企业处于初创发展时期,受制于瞬息万变的投资营商环境,其对资金的需求也往往表现为“短、平、快”的特征,而民间金融的发展正好迎合了这一资金需求特征,相信在利益驱使下民间金融今后将会以更多的形式存在与发展。

3. 台州民间金融内生发展机制

台州民间金融产生和发展的源动力在于中小微企业的融资需求与国家现行金融体系的融资供给之间存在缺口。中国的中小微民营企业之所以大量存在,原因就在于中小微民营企业主要生产劳动密集型产品,而这恰恰符合中国当前劳动力相对充裕的要素禀赋结构,劳动力成本相对较低,产品在国际上具有较强的竞争力,加上中国这些年实施的外向型经济战略,中小微民营企业迅速发展壮大。改革开放

前,中国银行业高度垄断,以大型国有商业银行为主导,伴随着拨改贷政策,国有银行与国有企业形成了中国的纵向信用体系,金融资源的配置不太重视投资回报,而在于要符合国家发展重工业的赶超战略^[10],快速累积重工业建设资金,迫使中小微民营企业只能从事劳动密集型行业。改革开放后,国家战略虽然从“赶超”转移到以经济建设为中心,但是渐进改革的方式和制度惯性,使计划经济时期形成的纵向信用体系得以维持。同时,受信息不对称所引发的信用风险与交易成本的影响,国有大银行既不愿意也不敢向中小微民营企业放贷;与此同时,中小微民营企业却因迅速发展而产生了巨大的融资需求。中小微民营企业融资需求难以得到满足的发展困局,直接催生了台州民间金融的形成。台州民间金融发展的内生机制具体见图2。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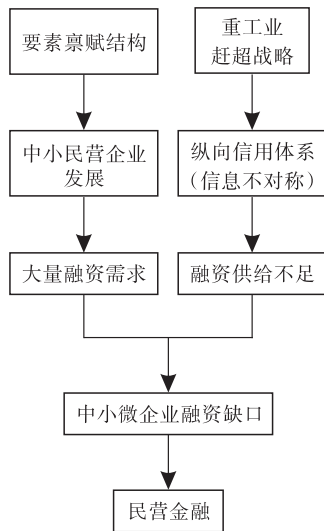


图2 台州民间金融发展的内生机制

针对当前我国民间金融日益活跃的现状,2012年银监会出台了《关于鼓励和引导民间资本进入银行业的实施意见》,为民间金融的规范化发展提供了市场准入政策。2010年,国家就出台了《关于鼓励和引导民间投资健康发展的若干意见》,为民间资本进入金融服务领域、设立金融服务中介机构,以及发起设立信用担

保公司等金融业铺平了道路。以此为契机,台州出现了第一家民营银行——台州市商业银行,随后台州泰隆商业银行、台州民泰商业银行相继成立,民间金融开始进入向银行业的演化阶段,也是民间金融发展的高级化阶段。台州民营银行的成功设立与发展,标志着民间金融在其内生发展过程中具有较强的生存发展能力,其中的原因就在于民营银行能够对客户对象做到差异化选择与服务,并通过客户经理与客户之间的紧密关系形成利益共同体,使民营银行的经营风险通过情感联系、相互监督、风险反馈等方式得到控制。

另外,台州民间金融的内生发展,也根植于解决中小微企业的“麦克米伦缺口”。以金融服务中心为代表的民间金融组织形式,依靠线下办公、线上网站、手机站、微信、各合作机构、台州同城商务联盟等平台,整合银行、保险公司、担保公司、投资公司、典当行、民间资本等金融资源,为广大中小微企业与个人提供资金融通服务。

三、台州民间金融改革的具体实践

台州民间金融的发展演化深深根植于中国银行体系的结构缺陷。在弥补正规金融不足的过程中,民间金融为了适应不断发展变化的经济形势也在进行着内部改革^[11]。温州、丽水、台州在民间金融领域先行先试,从范围、成效、路径等方面,通过各项举措不断深化对民间金融的改革。

台州民间金融的异常活跃与快速发展,正在深刻地影响着我国金融体系的变革,也直接加大了中央政府对浙江典型地区试行金融改革的推动力度与扶持力度。在现阶段,台州民间金融的演进更多体现为政府干预下的金融体制改革与金融组织形式创新,而在改革的具体实践中,主要体现为温州金融综合改革试验区建

设、丽水农村金融改革试点和台州小微金融企业创新示范区建设。

1. 温州金融综合改革实验区建设

2012年3月,国务院决定设立温州金融综合改革实验区,拉开了地方金融改革的序幕。温州金融改革的主要内容集中于民间金融的合规发展,从政策、金融环境与制度等多个方面为民间金融的健康发展铺平了道路,使温州民间金融发展的先天优势得以发挥,为将温州建设成为民间资本集散中心奠定了坚实基础。

2. 丽水农村金融改革试点

2012年5月,中国人民银行决定在丽水开展农村金融改革试点工作,改革内容集中在四个方面:一是“三权”抵押贷款创新,即大力推进林权抵押贷款、土地流转经营权抵押贷款、农房抵押贷款创新;二是积极构建村级农村金融基础服务平台、农村产权交易平台、农林产品交易平台;三是深化信用县、信用乡、信用村、信用户的四级信用体系建设;四是加强外汇管理,促进金融进一步扶持现代农业发展,在金融管理上做到“整体批发、集中授信”,加快推动全国保险服务民生示范区建设,鼓励民间资金与华侨资本有序进入金融服务领域等。

3. 台州小微金融企业创新示范区建设

台州小微金融企业创新示范区建设采取的措施主要有:借助大数据技术,推动小微企业金融服务改革创新;发挥大数据在推动普惠金融、便捷金融、安全金融中的应用;利用大数据、云计算等技术,探索小微企业审贷评分模型和小微企业金融服务标准体系建设,提高客户服务精准度,降低企业融资成本,提升小微企业金融服务水平。同时,立足民营商业银行的发展,鼓励3家城市商业银行借助大数据在金融产品开发、客户评级分析等方面的积极作用,不断改进微贷技术,丰富和创新小微企业金融服务模式,实现做专、做精、做强。推动大数据参

与信保基金建设,应用大数据、云计算等手段,探索构建信保基金客户服务批量模式,提升信保基金服务广度和效率,进一步增强信保功能。运用大数据在信息资源分析和风险透视等方面的优势,进一步研发信用信息共享平台的信用评价、预警分析等功能,完善平台,提升信息利用效率,发挥大数据技术在打造规范、统一、覆盖全社会信用体系中的积极作用。

四、台州民间金融未来发展的路径选择

台州民间金融的发展内生于台州地方经济发展和传统银行体系的缺陷。从这个意义上说,缓解中小微民营企业融资困境的根本出路,既不在于改变国有银行的信贷行为与资金投向,也不在于由政府出面培育多少外生性的中小金融机构,更不在于为其提供进入股票市场的方便,而在于营造内生性金融制度成长的外部环境。只有内生性金融制度的存在和发展,才不至于损害中小微民营企业的内源融资基础。民间金融是伴随着中小微民营企业的融资缺口而产生和发展的,二者存在很强的共生关系。这种共生关系实际上是正规金融、民间金融、大型国有企业和中小微民营企业四类市场主体博弈的结果。因此,台州民间金融未来发展的路径选择,应该以各种创新的形式与模式来改变由正规金融主导的金融市场格局。目前,最有可能成为台州民间金融发展路径的模式主要有众筹金融通模式、P2P(peer to peer)资金融通模式和民间金融服务中心模式。

1. 众筹资金融通模式

众筹的兴起源于美国网站Kickstarter,该网络平台通过向公众广泛筹资,为有创造力与想象力的人实现创业梦想提供所需资金。众筹融资模式能够利用互联网与社交网络传播的特性,让有资金需求的中小微企业,借助各种网络

媒介对公众展示它们的企业、创意或者投资项目,争取公众的广泛关注和支持,从而获取项目所需要的资金。

国内最大的众筹平台众筹网于2013年2月开始运营,该平台以项目融资为核心,为项目发起者提供融资、投资、孵化、运营等一站式综合服务。众筹平台,一方面为民间资金寻找优质的投资项目,另一方面也为优质初创项目提供融资途径与项目资金资助。

众筹平台受众主体的广泛性与项目融资的优势,能够满足台州中小微企业的项目融资需求,在台州建设类似众筹网的民间金融平台,有助于民营企业的自主融资。同时,台州已经具备民间资本充裕、投资项目众多和资金需求多样化等特征,这些都为众筹金融通模式在台州的发展提供了条件。另外,国内外一些运营机制较为成熟的众筹平台,也能够为台州推动众筹金融通提供经验借鉴。因此,台州可以尝试发展众筹金融通模式,实现民间金融组织形式的创新。

2. P2P 金融通模式

互联网的发展和民间借贷的兴起,催生了P2P金融通模式,其运行机制是借助互联网信息平台,在资金的供给端与需求端进行充分的信息撮合,使闲散的民间资金流向具有资金需求的个人或者中小微企业。这一模式具有明显的优势,是推动浙江民间金融发展的重要方向。

P2P金融通模式的主要优势体现在通过阳光化的融资方式,为中小微企业提供快捷便利、灵活高效的融资服务,需要中短期资金的中小微企业可以根据自身项目资金的需求特征、需求期限、需求结构等具体情况,在互联网融资平台选择合适的资金提供方式。另外,P2P网贷也能为中小微企业创建信用数据库提供信息平台服务。对于民营中小微企业数量庞大的台州而言,P2P网贷的发展能够实现民营企业

信用信息的充分采集,帮助解决民营中小微企业在融资过程中的信息不对称问题。在实际的运营当中,以陆金所、有利网、人人贷等为代表的P2P网贷,已经吸引了数百万甚至数千万民间主体的参与,表现出较强的发展势头,这些都能成为台州民间金融发展演进的有效路径。

3. 民间金融服务中心模式

为了满足民营企业多元化的融资需求,在民间金融领域台州应该重点打造一个能够实现资金供求平衡并提供相关金融中介服务的民营金融平台,统筹资金出借方、股权投资、小额贷款公司、典当行、担保公司、私募基金、资金中介等市场主体,实现融资主体的多元化,为企业提供点对点资金对接的针对性融资服务。综合起来,所打造的民营金融平台应具备民间资本的聚合平台、金融资源的整合平台、股权投资的对接平台、整合重组的交易平台、企业上市的服务平台等功能。

民营金融融资服务中心的设立,可以参照已经基本成型的三种模式:其一,以天津为代表的政府主导模式,即由政府作为组织方构建科技型企业融资服务中心,为中小企业提供融资辅导服务,同时为国内外股权投资机构和各专业金融服务中介机构提供公共运行平台。其二,以广东为代表的信用担保模式,即由工商联、银行业协会、中小企业促进会等发起设立中小企业融资服务中心,为中小企业提供银行(信用社)、担保、风投、证券、典当等融资“绿色通道”。其三,以陕西为代表的银行融资超市模式,即由陕西省中小企业促进局、人民银行西安分行和陕西银监会主办的陕西省中小企业融资信息服务平台·融资超市,在开展银行已有融资业务的同时,创立动产质押监管融资新模式,开创融资服务新途径。

台州的融资诉求主要来自民营企业,建立一个由民间力量运作的、集聚各种金融服务机

构、实现非银行金融交易和服务的系统集成并提供一揽子融资方案的服务平台,具有现实性、紧迫性和可行性。应构建由投资银行、商业银行、私募股权投资基金等正规金融机构参与的民间金融中心,同时引入民间资本,让民间担保公司、个人、企业和正规金融机构共同参与民间金融中心的资金流转过程,以实现正规金融与民间金融的融合式发展。

参考文献:

[1] 王曙光,邓一婷. 民间金融内生成长机制与政府规制研究[J]. 农业经济问题,2009,(3):47.
 [2] 杨光. 中小企业融资结构:理论与中国经验[M]. 北京:中国经济出版社,2010:32-34.
 [3] 陈蓉. 试论我国民营金融合法化模式的选择[J]. 理论导刊,2008,(1):35.
 [4] 齐广利. 中小高新技术企业成长的金融支持制度研究[M]. 北京:中国经济出版社,2006:83-84.
 [5] 蔡四平. 规范我国民间金融发展的路径选择

[J]. 中央财经大学学报,2011(2):21.

[6] 张德强. 民间金融监管、逻辑、风险、收益与可行性——基于民间金融的视角[J]. 金融理论与实践,2008(4):26.
 [7] 马广军. 民间金融理论分析、范畴、比较与制度变迁[D]. 北京:北京大学,2009.
 [8] 陈根荣,范晓虎,吴冲锋. 西方现代企业融资理论述评[J]. 财经问题研究,2000(8):62.
 [9] 吴小瑾,陈晓红. 基于社会资本的集群中小企业融资行为研究[J]. 中南财经政法大学学报,2008(2):75.
 [10] 沈莲. 非均衡特性下的金融支持中小企业研究——以江苏常州市为例[J]. 金融纵横,2008(11):67.
 [11] 陈伟鸿. 横向信用联系:民营企业的内生性外源融资机制[J]. 经济问题,2010(1):34.
 [12] 周彩霞,邵秋萍. 中小私营企业融资中“逆向选择”失灵现象新探[J]. 广东经济管理学院学报,2003(5):90.

(上接第79页)

参考文献:

[1] BENNER M J, TUSHMAN M L. Exploitation, exploration, and process management: the productivity dilemma revisited [J]. Academy of management review, 2003(2):238.
 [2] 李海舰,田跃新,李文杰. 互联网思维与传统企业再造[J]. 中国工业经济,2014(10):135.
 [3] 吴滨. 传统企业互联网化转型的管理研究[J]. 黑龙江科技信息,2015(27):178.
 [4] 杨学成. 联网力:传统企业互联网化的四幅画像[J]. 经理人,2015(9):36.
 [5] 邵天宇. 互联网思维下的商业模式创新路径研

究[D]. 大连:大连理工大学,2014.

[6] 张红梅,李靖. 下一个“风口”:传统企业的互联网化浪潮[J]. 中外管理,2015(2):61.
 [7] 吉峰,张婷,巫凡. 大数据能力对传统企业互联网化转型的影响——基于供应链柔性视角[J]. 学术界,2016(2):68.
 [8] 张荣耀. 从荣昌到e袋洗,10多年的血泪史[EB/OL]. (2016-08-18)[2017-01-12]. <http://wumiancaijing.baijia.baidu.com/article/139762>.
 [9] 尚品宅配:“互联网+”的商业模式创新[EB/OL]. (2016-08-25)[2017-01-12]. <http://www.ishuo.cn/dol/wtmjfqfsanwen8.cn/p/2531jaa.html>.



引用格式:周麦成. 语言生态学视角下的中国英语价值研究[J]. 郑州轻工业学院学报(社会科学版), 2017, 18(2): 87-91.

中图分类号: H0-05 文献标识码: A

DOI: 10.3969/j.issn.1009-3729.2017.02.014

文章编号: 1009-3729(2017)02-0087-05

语言生态学视角下的中国英语价值研究

Study on China English from the perspective of ecology of language

周麦成

ZHOU Mai-cheng

郑州轻工业学院 外国语学院, 河南 郑州 450002

关键词:

语言生态学;
中国英语;
生态系统;
动态平衡

摘要:中国英语作为一种英国境外的地域性英语语言,是中国特定历史环境、社会、文化等多种因素作用下的产物,它的出现丰富了英语语言的生态系统,促进了该生态系统的动态平衡,同时也是该生态系统发展的一种必然。我们应该正视中国英语这一客观存在,为中国英语的良性发展提供良好的语言生态环境,促进世界语言生态系统的平衡和健康发展。

收稿日期: 2016-12-20

作者简介: 周麦成(1968—),男,河南省长葛市人,郑州轻工业学院副教授,主要研究方向:语言学、外语教学。

美国著名生态学家 E. P. Odum 等^[1]认为,生态学是研究生态系统结构和功能的科学。“语言生态”的概念是在 1970 年代由美国斯坦福大学的霍根教授最先提出来的。他在《语言生态学》一文中提出,应“研究任何特定语言与环境之间的相互作用关系”^[2],并将语言环境与生物生态环境作隐喻类比。此后,“语言生态”的隐喻开始为语言研究者所接受。1980 年代后期,随着生态环境的恶化,德国比勒菲尔德大学的一批学者进一步将生态原理和方法应用于语言研究,基本上确立了语言生态学的理论框架。^[3]1990 年,著名语言学家韩礼德在国际应用语言学会议上就语言系统非生态因素的批评作了精辟的发言,随后,更多的团体和个人开始关注语言在生态和环境问题上的作用,从而加强并推动了语言生态问题的研究。随后每年定期召开的国际应用语言学协会语言生态科学委员会的学术会议,不但进一步推广和扩大了语言生态学的研究,而且也加强了语言生态学界学者们的相互交流。这些研究和交流促进了该学科的进一步发展。

语言生态学(ecology of language)又称生态语言学(eco-linguistics),是在语言学和生态学研究基础上产生的一门新兴交叉学科,它从生态学的角度研究和分析语言和环境之间相互作用、相互影响的关系。R. Gabbard 认为,生态语言学的目标是探讨语言在调整生态系统中可能产生的影响,以及在生态破坏或生态协调过程中所起的作用^[3]。运用生态学的理论、观点和方法,探索世界语言系统中的语言问题,探索语言的生态变化及其发展情况,为我们研究语言提供了一种新的视角和途径。

随着中国对外开放的不断深入,中国与世界的关系日趋密切,世界的进步和发展也越来越缺少不了中国元素的存在,在世界语言生态系统中反映中国元素的中国英语(China Eng-

lish)便随之诞生。1980 年,中国英语教育界的先驱之一、复旦大学教授葛传槩先生首次提出“中国英语”的概念,并从翻译的角度指出“就我国而论,不论旧中国或新中国,讲或写英语时都有我国特有的东西需要表达。这些不属于讲英语民族的人所惯用的词语,应当称作 China English”^[4]。这一说法首次明确了中国英语这一现象的客观存在。汪榕培认为,中国英语是客观存在的英语变体,是“中国人在本土上使用的、以标准英语为核心、具有中国特点的英语”^[5],但这种说法只是将中国英语的使用仅局限于中国人和中国本土。李文中认为,中国英语的使用可以超越本土,“中国英语是以规范英语为核心,表达中国社会文化诸领域特有事物,不受母语干扰,通过音译、译借及语义再生诸手段进入英语交际,具有中国特点的词汇、句式和语篇”^[6]。贾冠杰等把中国英语的应用范围扩大到了“操汉语的人们所使用的、以标准英语为核心、具有无法避免或有益于传播中国文化特点的英语变体”^[7]。

我国对于语言生态学的研究起步于 1980—1990 年代,理论上的研究成果更多的发表于 21 世纪。范俊军^[3]系统介绍了语言生态学的产生、发展、基本概念、学科定义、研究领域与课题;杨朝军^[8]对生态语言学的溯源、传统语言学与生态语言学的差异、语言生态学的主要概念、研究对象与意义进行了概述;冯广艺^[9]对语言生态学的性质、任务与研究方法进行了论述;蔡永良^[10]论述了语言生态学产生的背景、内涵与外延;韩军^[11]通过建立完整的学科体系,运用生态学原理,对各种语言的活力和生存状况作了评估,对话语或语篇作了微观研究,完善了生态语言学的理论和应用研究。此外,还有一些学者运用语言生态学的理论,对具体的社会生活现象进行了研究。倪如,蔡永良^[12]从文化生态的角度解读了语言衰亡的现象及其对语言世

界的影响,认为语言的衰亡不仅会让最宝贵的文化遗产流失,而且将破坏人类另一个赖以生存发展的文化生态环境;赵奎英^[13]研究了生态语言学对生态、文化研究的语言理论基础建构的重要作用。总之,国内对中国英语现象的研究成果丰硕,包括对中国英语的历史、现实、发展,以及围绕中国英语的教学、语料库的建设等。但是,运用语言生态学的理论研究中国英语,在笔者所占有的资源中,仅刘国兵^[14]从生物群落与语言群落、物种间的互利共生与语言之间的相互依存、“物竞天择,适者生存”规律与中国英语、生物多样性等方面对中国英语现象进行了探讨。鉴于此,本文拟从生态学视角,研究中国英语的价值,以进一步正视中国英语这一现象,为中国英语创造良好的语言生态环境,促进世界语言生态系统的健康和谐发展。

一、中国英语的出现丰富了英语语言的生态系统

生物多样性是人类生存和发展的基础。生态系统下物种的多样性,使得占据不同生态位的物种,能有效利用环境资源提高整个生态系统的稳定性。语言生态学认为,语言系统与生物生态系统一样,也是一个开放的、动态的系统。在这个系统中,不同民族、不同生活群体之间的语言相互作用、相互影响,构成世界语言网络系统,形成了世界语言的多样化。多种多样的语言是对人类形成以来积累起来的丰富知识的充分表达,语言的多样性是存储人类经验和知识的宝库,反映了人类形成以来对复杂环境的适应性。丰富多样的语言正是语言生态系统健康持续发展的基础。语言多样性的欠缺,既意味着人类可以利用的知识宝库的缩小,也意味着人类适应自然环境能力的削弱。

当今世界,科学技术日新月异,多民族文化相互影响、相互融合,国际交流与国际合作日趋

频繁,世界变得越来越小,地域概念越来越模糊,跨出国门、走向世界已成为常态。作为一种交流工具,英语已被各国、各民族人们广泛使用,成为一种世界性语言。但是,由于各个国家和民族的诸多差异,英语在走向国际的同时,也在不同程度上打上地域性烙印,世界上不但有英国英语、美国英语、加拿大英语,更存在着独立于它们之外的澳大利亚英语、克里奥尔英语、印度英语、新加坡英语、苏格兰英语、爱尔兰英语、威尔士英语等诸多英语变体。当今英语世界就是由各种具有地域和文化特色的英语语言所构成的一个网络系统,在这个网络系统中,各种不同的英语变体之间会发生直接或间接的联系,它们相互影响、相互作用、相互制约,共同形成英语世界的生态链。

英语在中国的最早使用可以追溯到17世纪上半叶^[15]。随着英语在中国的使用日益广泛,不可避免地受到其所依附的中国地理、政治、经济、文化、教育等因素的影响,从而形成了具有中国特色的中国英语。由于中西方在语言、文化、思维等方面的差异,英语语言在表达涉及中国社会、文化等现象时,只能用带有中国社会文化特色的表达方式弥补其不足,从而形成了带有中国特色的英语变体现象,这就是中国英语。中国英语中的词汇主要包括以下几种类型:(1)历史、文化类,如科举(imperial examination)、五经(Five Classics)、四书(Four Books)等;(2)文体类,如太极(Tai Chi)、功夫(Kungfu)、二胡(Erhu)等;(3)饮食类,如饺子(Jiaozi)、茅台(Maotai)等;(4)度量衡单位类,如亩(mu)、元(yuan)等;(5)特定历史时期类,如文化大革命(Great Cultural Revolution)、经济特区(special economic zone)、一国两制(One Country, Two Systems)等。这些反映中国历史、文化、社会现实的特有事物,在原有英语语言系统中无法准确地进行表述,经过国人长期而广

泛的努力,逐步形成了具有中国特色的表达方式,并逐渐被英语语系人士所认同和接受,从而丰富了英语语言系统。

没有生物的多样性,就没有良好的生态环境;没有语言的多样性,就没有良好的语言生态环境,宝贵的语言资源也就无法得以开发、传承和利用。所以,我们说中国英语是英语生态系统中一个不可或缺的变体,具有独特的、无可替代的价值;中国英语的出现,就像美国英语、加拿大英语等英语变体一样,丰富了英语语言的生态系统。

二、中国英语的不断丰富促进了英语语言生态的发展

生态平衡不是一种静态平衡,而是一种动态平衡。根据生态学理论,自然界中生态系统的平衡依赖于生物的多样性,依赖于该系统内部各种生物间的相互作用和相互影响。如果失去了这种平衡,自然环境就会受到严重的影响。大自然具有天然的维持生态平衡的机制,如果人为地破坏这种生态平衡机制,就会破坏整个生态系统。语言生态系统也是如此。语言生态学认为,多样性和开放性是保持语言生态系统平衡的重要条件。由于英语语言受在中国所依附的中国地理、文化、经济、政治、教育等因素的影响,英语语言生态系统的各种因素始终处于不断变化的运行状态之中,因此英语语言生态系统是一个动态的、不断变化的体系。

中华文明历经数千年,源远流长。中华文化光辉灿烂,博大精深,是祖先留给我们的宝贵精神财富,是千百年来悠久历史的积淀,虽饱经沧桑,却历久弥新,生机勃勃,具有强大的生命力。近年来,中国国力的日益增强及中西文化的相互渗透,大量的汉语借词和表达语进入了英语体系中,成为英语中的重要一部分。这些反映中国政治、经济、文化、日常生活等各个领

域状况的英语表达,大大丰富了英语的生态系统,促进了生态系统的动态平衡。

语言来源于生活。中国人的生活方式和生活习惯与西方有着很大的差别。例如:中国人住的地方讲究风水(fengshui);中国北方人喜欢睡在炕(kang)上;中国人讲究阴阳(yinyang)平衡;中国人业余时间多以打打麻将(mahjong)、扭扭秧歌(yangko)、练练气功(qigong)来健身;中国人有尊重老人的美德,所以重要节日要向老人叩头(kowtow)以示尊重,如此等等。因此,中国英语的相关表达使得英语表达更为丰富。

语言是文化的产物。中国英语的形成记载了中国历史发展的不同阶段。过去,中国各地的政府办公地点称衙门(yamen),那是封建社会官民区隔的象征。中国近代史上,有影响深远的五四运动(May Fourth Movement),有大锅饭(collective dining)、铁饭碗(iron rice bowl)、人民公社(People's Commune)。改革开放以后,中国又出现了许多新生事物,如计划生育(birth-control policy)政策、两个文明(two civilization)建设、四个现代化(four modernization)建设、“三个代表”重要思想(important thought of three represents)等。近年来,任性(wayward)、群众路线教育实践(Mass line educational practice)活动、“一带一路”(The Belt and Road Initiative)等代表和象征中国特定发展阶段的新词汇应运而生。中国元素在英语语言系统中的体现,促进了英语语言生态的发展,对保持英语语言这一系统的多样性和开放性具有重要的意义。

三、中国英语的发展是英语语言生态系统发展的必然

在某一特定生物群落中,由于环境的变化,再加上一定的温度、湿度与气候等适宜的外部条件的相互作用、相互影响,某种物种就会产生变异,从而导致该群落中新物种的诞生。语言

与其他生物物种一样,其产生、发展、变化、消亡是一个动态过程。在语言生态系统中,当一种语言长期受到另外一种文化的浸染,与另外一种文化相互作用、相互影响时,不可避免地就会产生新的语言变体。

随着世界各国经济社会的飞速发展、国际交往的日益频繁和密切、全球一体化进程的不断加快,语言的融合和相互影响成为必然。正如生态世界中的万事万物一样,语言的进化和发展是语言适应当地自然环境、社会环境、人文环境的结果。

改革开放以来,中国经济飞速发展,目前已成为了全球第二大经济体,对外交往日趋频繁,越来越多的中国人走向世界,融入世界,学习英语。目前,中国学习英语的人数甚至超过了英国和美国的人口总和。今天在中国,英语已经远远超出掌握一门外语的意义范畴,一个人英语水平的高低已经与其事业、前途、地位甚至命运联系在了一起。这么多的中国人在学习英语,英语学习受到了这么多中国人的关注,英语中国化的进程不断加速,不可避免与汉语混合交融,这样一来,中国人讲的英语自然而然地就会留下汉语的影子。英语在汉语的反作用下,成为带有汉语特色的中国英语。

中国英语作为一种承载中国文化的世界英语变体,是英语语言在中国发展的必然,是英语语言适应中国本土文化的一种客观,是英语语言生态系统发展的必然结果。中国英语变体的出现,实现了中国本土文化与英语语言的有效“嫁接”,发挥了嫁接植物强大的“双重物种优势”,其存在符合事物的发展规律。^[15]

四、结语

语言生态学为我们开辟了一个了解、研究中国英语的全新视角。既然中国英语已经成为一种客观存在,成为一种必然,那么身处其中的

我们就应该正视这一客观现象,认真研究,为中国英语的良性发展提供良好的语言生态环境,促进世界语言生态系统的平衡和健康发展。

参考文献:

- [1] ODUM E P, BARRETT G W. 生态学基础[M]. 5版. 陆健健, 何文珊, 李秀珍, 等译. 北京: 高等教育出版社, 2008: 1.
- [2] HAUGEN E. The Scandinavian languages as cultural artefacts[M]. Stanford: Stanford University Press, 1972: 265 - 286.
- [3] 范俊军. 生态语言学研究述评[J]. 外语教学与研究, 2005(2): 110.
- [4] 葛传槩. 读了 From English to English 以后想到的[J]. 外国语, 1980(6): 26.
- [5] 汪榕培. 中国英语是客观存在的[J]. 解放军外语学院学报, 1991(1): 1.
- [6] 李文中. 中国英语与中国式英语[J]. 外语教学与研究, 1993(4): 18.
- [7] 贾冠杰, 向明友. 为中国英语一辩[J]. 外语与外语教学, 1997(5): 11.
- [8] 杨朝军. 生态语言学理论概述——兼论《语言: 生态学视域》[J]. 外语教育, 2008(3): 17.
- [9] 冯广艺. 语言生态学的性质、任务和研究方法[J]. 毕节学院学报, 2011(1): 110.
- [10] 蔡永良. 关于“语言生态学”[J]. 上海理工大学学报(社会科学版), 2012(9): 211.
- [11] 韩军. 中国生态语言学研究综述[J]. 语言教学与研究, 2013(4): 107.
- [12] 蔡永良. 从文化生态视角解读语言衰亡[J]. 外语教学与研究, 2011(1): 75.
- [13] 赵奎英. 生态语言学与当代生态文学、文化研究的语言理论基础建构[J]. 文艺理论研究, 2014(4): 182.
- [14] 刘国兵. 中国英语研究的生态语言学视角[J]. 西安外国语大学学报, 2009(3): 6.
- [15] 张勇先. 英语发展史[M]. 北京: 外语教学与研究出版社, 2014: 397.



引用格式:黄晓鹏. 中国传统典籍翻译批评的框架建构[J]. 郑州轻工业学院学报(社会科学版), 2017, 18(2): 92 - 97.

中图分类号: H315.9 文献标识码: A

DOI: 10.3969/j.issn.1009-3729.2017.02.015

文章编号: 1009-3729(2017)02-0092-06

中国传统典籍翻译批评的框架建构

The framework construction of translation criticism of the Chinese ancient classics

黄晓鹏

HUANG Xiao-peng

郑州轻工业学院 外国语学院, 河南 郑州 450002

摘要: 典籍翻译批评对推动典籍翻译实践健康发展起着重要的导向作用。目前, 中国传统典籍翻译批评研究中存在着批评视野狭窄、批评模式单一、理论框架缺乏深度等问题。典籍翻译批评应在对典籍翻译批评的性质、类型、功用、主体、原则、标准和操作程度进行剖析和厘定的基础上, 摆脱传统观念和方法的禁锢, 吸收借鉴中外文论和翻译批评理论的研究成果与其他学科的研究方法; 应以价值哲学为理论基础, 以合目的性与合规律性相统一的原则作为评判典籍翻译活动的标准; 应结合典籍翻译的特点, 构建包括译作质量评价体系和译作价值判断体系的评估模式, 从而将典籍翻译批评从经验和技術层面提高到理性和文化层面。

关键词:

典籍翻译批评;
译作质量评价体系;
译作价值判断体系

收稿日期: 2016-04-20

作者简介: 黄晓鹏(1978—), 男, 河南省安阳市人, 郑州轻工业学院讲师, 硕士, 主要研究方向: 翻译教学和研究。

当今世界,各国之间经济文化交流日益增多,彼此影响和合作不断加强,全球化进程日益加快。全球化进程必然伴随着文化的多元共存,各民族文化都积极参与世界文化的形成,使文化呈现出多元化的发展趋势,并将最终形成由各民族优秀文化融合而成的全新的世界文化。在这一进程中,我国面临的重要任务就是如何向西方国家推介我们的民族文化和价值观,增强我国本土文化对外辐射的能力,使中华民族的优秀文化成为世界文化的重要组成部分。

典籍是我国优秀文化的载体,比如经史子集,其思想体系以先秦的诸子百家为源头,以儒家思想为主体,同时也受到其他思想体系的影响,总体上呈现出多元化特征。这些思想直接影响着中国人的价值观念和行为准则。近年来国家大力倡导传统文化的对外传播,由此引发了典籍翻译的理论研究和实践的高潮,这对于保持中国本身的文化身份、传播中国传统文化、增强中国软实力,具有重大战略意义。典籍翻译批评是伴随着典籍翻译实践而产生的,它作为翻译理论与实践之间的一条纽带,可以推进典籍翻译实践的发展,对翻译实践具有导向作用。然而在目前方兴未艾的典籍翻译热潮中,典籍翻译批评的相对冷清态势,表明了典籍翻译批评正面临着新的定位、整合与抉择。加强典籍翻译批评研究,发挥其社会功能和价值定位,寻求科学的批评方式,对于指谬质量低劣译本并限制其泛滥、鉴赏优秀译文并扩大其在国内外的影响、加快典籍翻译的发展并保证翻译质量,具有重要意义。因此,在典籍翻译蓬勃发展的今天,当务之急是开展典籍翻译批评的研究。鉴于此,本文拟在分析典籍翻译批评的研究现状和存在问题的基础上,建构中国传统典籍翻译批评的框架和研究范式,以期促进典籍翻译实践的发展。

一、国内外典籍翻译批评研究现状

翻译批评是一种具有一定实践手段和理论目标的精神活动,是从一定的价值观念出发,对具体的翻译现象进行分析和评价的学术活动,是审美评价与科学判断的有机统一。^[1] 翻译批评虽是伴随着翻译实践而产生的,但关于翻译批评特别是典籍翻译批评的研究,国内起步较晚,大体始于20世纪上半期。1906年,王国维在其所写的《书辜氏汤生英译〈中庸〉后》一文中,批评了辜鸿铭的译文,同时阐述了自己对典籍翻译的独特观点,开启了典籍翻译批评之先河。1978—1986年,国内学者开始重视对汉籍外译的评论,特别是对我国古典名著中外译的研究。例如,姜其煌^[2]、张培基^[3]和陈文伯^[4]等翻译家通过对古典名著《红楼梦》译本的分析,提出了自己关于典籍翻译的观点。1987年至今,典籍翻译批评研究成果显著,一些翻译批评家,如姜治文、杨晓荣等^[5-6]以散论、导论的形式对翻译批评的概念、范畴、方法和质量评估体系等进行了研究,同时涌现出了一批新的翻译批评家,如王宏印^[7]、汪榕培^[8]、刘士聪等^[9]。特别是2002年由《中国翻译》编辑部主办、南开大学外国语学院承办的“全国《红楼梦》翻译研讨会”将典籍翻译批评推上了一个新的高度。这表明我国的典籍翻译批评取得了一定进展,呈现出系统化的研究趋势,批评理论逐渐完善,批评方法不断丰富,“除了常见的科研方法如历时法和量化分析等外,还包括翻译学科本身的方法和跨学科的方法,如心理学、文化学方法等”^[10]。

截至目前,国外学术界还没有开展关于中国典籍翻译批评的研究。与之相关的翻译批评研究的文献,有德国翻译理论家维尔斯的《翻译学——问题与方法》和赖斯的《翻译批评:潜力与局限》,其虽为翻译批评经典,但由于中西

文化差异,并不能有效地适用于我国典籍翻译批评研究。与典籍翻译批评最为相关的文献目前仅有法国文学翻译批评家安托瓦纳·贝尔曼的《翻译批评论:约翰·唐》,其虽建构了以现代阐释学为基础的文学翻译批评体系的理论框架,但并不适用于对典籍翻译译本的翻译质量进行评估。

二、典籍翻译批评研究中存在的问题

通过对以往典籍翻译批评文献的梳理和分析,可以发现,国内研究虽然取得了一些进展,但仍然存在着以下问题。

1. 批评视野狭窄

通过对近几十年的翻译批评研究论文的分析可以看出,发表在各学术期刊上的翻译批评论文,大多只是对原文语言、风格等的赏析,局限于语言分析的层面,且主要分列在《争鸣与探讨》《佳译欣赏》《译著比较》等栏目之下;很少有对译作质量和价值进行评估的,更缺乏对时代背景、译入语文化意识形态等译作外部因素的分析,并不属于真正的翻译批评研究。

典籍翻译批评不能仅仅局限于对文本语言的批评,真正的翻译批评“不仅要有对译文与原文对照的文本批评、译者的批评,而且要有对翻译过程、译作影响和翻译理论的批评”^[11]。典籍翻译过程的特殊性和典籍翻译所特有的文化输出的任务,决定了典籍翻译批评还应该扩大到对文本形成原因、形成过程的分析 and 评判,译作的艺术价值、文化价值和道德价值,特别是其社会价值,应成为典籍翻译批评的焦点,这样才有利于将批评视野从语言和文本批评,扩大到文化批评。

2. 批评模式单一

目前典籍翻译批评的研究范围局限于个人主观性较强的随感式和挑错式,缺少客观系统的翻译批评模式。当下我国翻译批评存在几种

固定模式,即文字校对式、价值判断式和理论印证式^[12],这些批评模式过于简单化。例如,文字校对式局限于低层次的理解和表达层面的挑错;价值判断式多属于译文赏析类,仅凭批评者的主观印象随意对译文的“好”与“坏”进行评价,主观性较强,没有客观的判断标准;理论印证式则用西方的某种理论来印证译文,显然有失偏颇。所以,应该对当前各种典籍翻译批评研究的现状进行批判性地综合审视和梳理,将其进行类型归纳,并对每种翻译批评类型的特点和弊端进行分析和揭露。

3. 批评理论深度不够

典籍翻译批评研究应该有系统的理论作指导,但长期以来翻译批评研究对理论方面的基本问题,甚至对典籍翻译批评的基本概念包括性质、类型、功用、主体、原则、标准和操作程序都没有进行清晰系统的剖析和厘定,对典籍翻译批评范式的研究更少。

在最近的译介研究中,虽然有学者提出一些翻译批评的思路、原则和方法,如许钧曾归纳出6种翻译批评的方法,即逻辑验证法、定量定性分析法、语义分析法、抽样分析法、不同翻译版本的比较和佳译赏析法^[13];吕俊^[14]借助于现代哲学、语言学等理论从事翻译批评。但相关研究成果屈指可数,特别是专门研究典籍翻译批评的较少,对整个典籍翻译批评进行理论探讨的更少。典籍翻译批评还远没有建构起自己科学的相对独立的理论体系,难以达到指导翻译实践、提高翻译质量的目的。因此,如何在充分考虑到批评对象的前提下,综合应用相关人文学科和翻译学研究的最新成果,形成系统的、有深度的典籍翻译批评理论,并以此为基础完善翻译作品的社会监督和引导机制,解决典籍翻译实践中存在的问题,促进典籍翻译实践的健康发展,乃是译界不可回避的重大问题。

三、典籍翻译批评的理论体系建构

通过上述分析,我们可以看出,典籍翻译批评具有其独特性,研究人员必须明确地阐述典籍翻译批评在翻译研究中的地位和作用等;典籍翻译批评不能只局限于文本和语言批评,更应该关注其社会价值和文化意义,译作的社会价值应该成为典籍翻译批评的主要内容;同时,典籍翻译批评也不能只靠翻译理论指导,其作为评价性科学应有哲学理据。

翻译批评是参照一定标准、对译作质量和价值的全面评价。所以,典籍翻译批评的框架应该包括两个方面的内容:批评标准和评估模式。

1. 典籍翻译批评的标准

作为一门评价性学科,典籍翻译批评涉及到评价主体的个体差异性和多层次性。因此,如何建立一个开放式的、宽松的、具有客观性和可操作性的标准,是典籍翻译批评的难点和重点。

翻译批评标准的确立,涉及到客观与主观两大因素,呈现出多样化、多视角和多层次的特点,不同的学者从不同的角度提出了不同的翻译批评标准。例如,卞建华^[15]试图用文学接受理论的有关内容来建立翻译批评的标准,强调译者的主体作用;王小凤^[16]将文化顺应论的概念应用到翻译批评的标准中;王宁^[17]则运用德里达的解构批评理论来对翻译批评的标准进行质疑。但考虑到典籍翻译的特点和任务,笔者认为吕俊^[14]所提出的价值哲学的理据,作为一种理论资源和方法论资源,因其具有与典籍翻译的相关性和通融性,适合作为典籍翻译研究的哲学理据。“价值学的最高原则始终是合规律性与合目的性的辩证统一,而其中合目的性又居主导地位,合规律性是为了更好地合乎人的需要的目的。”^[14]以此为原则,典籍翻译批评

的标准首先要合目的性,表现在译作的文化道德和社会价值等方面;其次是合规律性,表现在译作的质量方面。

2. 典籍翻译批评的评估模式

典籍翻译批评的评价涵盖译作质量分析和译作价值判断两个方面,因此典籍翻译批评应建立起两个开放式、宽松型的评价体系:译作质量评价体系和译作价值评价体系,以有利于不同评价模式的展开。

(1) 译作质量评价体系

典籍翻译的质量问题始终是典籍翻译批评要关注的问题。然而,在目前的典籍翻译中,质量堪忧已经成为共识。这一问题的产生有多方面的原因,如译者的水平和职业道德等,而译作质量评价体系的缺位也是一个重要原因。要提高典籍翻译的质量,需要建立一套操作性较强的质量评价体系。

在译作质量评价体系建立方面,虽然有不同学者提出了不同的看法,但这些质量评价体系都存在操作性差的缺点。例如,反应论者所提出的质量评估体系,其以交际过程中的普遍有效性和反应对等作为评价标准,显得空泛,难以实施;语言学派虽在语言层面上制定了文本转换应该遵循的标准,但未能提供翻译质量评价的具体操作方法。目前,操作性较强的当数德国学者朱莉安·豪斯所提出的质量评价体系,其著作《翻译质量评估模式》及其修订本《翻译质量评估——修订的模式》提出,依据系统功能语言学、语篇分析等理论,构建相对完整的参数体系,步骤上遵循一定的程序,并适度引入定量的方法,这是国际翻译批评界第一个具有完整的理论和实证的翻译质量评估模式。^[18]我们可以借鉴该评估模式,针对现有的典籍翻译批评理论,同时注意典籍文本的特殊性,建构起一个具有可操作性的译作质量评价体系。出于对合规律性的要求,译作与原作的一致性始

终是译作质量评价最重要的标准。因此,应从对译作文本内在因素的分析入手,通过选取典籍,特别是将儒家经典不同译者、面向不同时代和不同社会的译本作为语料,对其进行全面而具体的原作与译作的比较分析,遵循语言转换规律和文本内部的构成规律,对译作的准确性和语义失真程度做出质量描写和判断,建构起一个具有可操作性的译作质量评价体系,以检验典籍翻译活动是否合规律性。

译作质量评价体系属于描写性评价体系,翻译批评方法可以分为规定性翻译批评和描写性翻译批评两种。其区别在于:前者是以“标准—分析—结论”的模式对翻译作品进行评价;而后者则是“将翻译结果视为既成事实,追寻影响过程的社会历史因素,以及翻译作品在译语文学多元系统中的功能和地位,并对此进行全面历时性描述”^[19]。而动态的、描写性的典籍译作质量评价体系,将更客观、更完善,所取得的成果也会更有说服力。

(2) 译作价值判断体系

随着国际间文化交流的不断深入和迅猛发展,典籍翻译越来越成为增强中国传统文化吸引力、提高中国软实力的有效手段。因此,典籍翻译批评应以促进典籍在世界上的传播、促进文化交流为目的,强调译作在译入语文化中的作用和地位,突出译作的社会文化价值。也就是说,应该把研究重心放在译作的价值研究上。鉴于此,我们应研究译本在译入语国家的传播与接受情况,以及对译入语国家的政治、经济和意识形态等的影响,通过这些外部因素的研究来对译作作出价值判断。

在译作价值判断方面,应该建构一个系统的、能够为典籍翻译批评实践活动提供参数的译作价值评价体系。价值判断主要分析译作在译入语环境中存在的价值,考察其对译入语环境的意识形态和社会思想的影响。由于典籍译

本在国外的影响和读者接受情况是考察典籍翻译社会价值的重要依据之一,通过研究译作对读者的影响和接受情况,可以确定译本的社会价值。所以,可以以译作文本外因素,包括译入语国家的社会意识形态、权力操控和文化差异等背景变量与译入语读者因素为审视视角,以考察译本在译入语环境的接受和社会反应为主要内容,以对译作进行价值和影响判断为主要目的,建构一个完整的译作价值评价体系,以检验典籍翻译活动是否合目的性。

典籍翻译批评的评估模式,包括译作的质量评价体系和价值判断体系,应是一个有层次性的框架系统。如果说译作的质量评价体系是语言层面,属于内部研究,那么译作的价值判断体系则是文化层面,属于外部研究。翻译批评的着眼点不应只局限于语言分析,还应扩大到翻译的外部因素,扩大到对国家意识形态、政治、经济等翻译外部环境的分析与研究,只有这样,才能建立起一套比较全面、科学的典籍翻译批评评估体系。

四、结语

总之,典籍翻译批评应在对典籍翻译批评的性质、种类、作用、主体、原则、标准和操作程序进行剖析和厘定的基础上,摆脱传统观念和方法的禁锢,吸收借鉴中外文论和翻译批评理论的研究成果与其他学科的研究方法,以价值哲学为理论基础,以合目的性与合规律性相统一的原则作为评判典籍翻译活动的标准,结合典籍翻译的特点,构建包括译作质量评价体系和译作价值判断体系的评估模式,从而将典籍翻译批评从经验和技術层面提高到理性和文化层面。

参考文献:

[1] 方梦之. 译学辞典[J]. 上海:上海外语教育出

- 版社,2004:346.
- [2] 姜其煌.《红楼梦》西文译本序跋谈[J].文艺研究,1979(2):126.
- [3] 张培基.略论《红楼梦》新英译的习语处理[J].外国语,1980(1):1.
- [4] 陈文伯.理解与表达(续完)——《红楼梦》英译本学习札记[J].翻译通讯,1982(3):9.
- [5] 姜治文,文军.比较翻译学刍议[J].重庆大学学报(社会科学版),1995(2):64.
- [6] 杨晓荣.对翻译评论的评论[J].中国翻译,1993(4):19.
- [7] 王宏印.参古定法,望今制奇——探询文学翻译批评的评判标准[J].天津外国语学院学报,2002(3):1.
- [8] 汪榕培.《牡丹亭》的英译及传播[J].外国语,1999(6):48.
- [9] 刘士聪,谷启楠.论《红楼梦》文化内容的翻译[J].中国翻译,1997(1):16.
- [10] 文军.中国翻译批评五十年:回顾与展望[J].甘肃社会科学,2006(2):49.
- [11] 杨自俭.简论翻译批评——《文学翻译批评论稿》序[J].解放军外国语学院学报,2006(1):52.
- [12] 胡德香.文化语境下的翻译批评:现状与反思[J].解放军外国语学院学报,2004(6):59.
- [13] 赵洪娟,孙志祥.浅谈新时期加强翻译批评的重要性[J].安徽工业大学学报,2006(1):142.
- [14] 吕俊.价值哲学与翻译批评学[J].外国语,2007(3):103.
- [15] 卞建华.文学翻译批评中运用文学接受理论的合理性与局限性[J].外语与外语教学,2005(1):42.
- [16] 王小凤.文化语境顺应与文学翻译批评[J].外语与外语教学,2004(8):41.
- [17] 王宁.德里达与翻译理论的解构——悼念一代翻译理论宗师德里达[J].中国翻译,2005(1):45.
- [18] 司显柱.朱莉安·豪斯的“翻译质量评估模式”批评[J].外语教学,2005(3):79.
- [19] 郑延国.翻译批评:动向与策略[J].上海翻译,2005(1):45.



引用格式:李芃芃. 网络空间中极客英语类型与发展研究[J]. 郑州轻工业学院学报(社会科学版),2017,18(2):98-103.

中图分类号:H313.3 文献标识码:A

DOI:10.3969/j.issn.1009-3729.2017.02.016

文章编号:1009-3729(2017)02-0098-06

网络空间中极客英语类型与发展研究

Research on the type and development of geek English in cyberspace

李芃芃

LI Peng-peng

河南农业大学 外国语学院, 河南 郑州 450002

摘要:极客是网络空间中极富创新性的一个群体,他们在创造新技术的同时,也带来了独特的英语语言现象。极客英语在用词上追求个性化,通过灵活多变的语言形式,生动、有趣又形象地表达相对晦涩的科学技术词语。根据极客英语的造词特点,可将其分为表达强烈的个人标记或兴趣类、用隐喻挖掘词语的独特含义类、根据技术特征创造新词类、用缩略语并追求形义的结合类、用谐音和递归缩略语类、用偶像或喜欢的物品命名类、形象化的表述或类比类等。网络空间极客英语现象的发展与信息技术的发展和网络空间影响力的不断提升基本同步,呈现出显著的由点到面、由小众到大众的特征,其产生机制由随机出现走向了主动地协同创造。随着极客群体的逐渐发展并向更多领域扩散,极客英语呈快速增长趋势,而且语言形式越来越多样,具有显著个性化特征。但从语言规范角度讲,极客英语中的积极因素值得吸收借鉴,同时也要避免对其过度使用或滥用。

关键词:

极客英语;
网络空间;
隐喻;
递归缩略语

收稿日期:2016-08-12

作者简介:李芃芃(1983—),女,河南省驻马店市人,河南农业大学讲师,主要研究方向:应用语言学。

极客是美国俚语“geek”的音译,原意是“反常的人”,具有一定的贬义。但随着科学技术的发展与极客群体影响力的不断扩大,尤其是借助新型媒体,极客群体及其生活方式逐渐为普通大众所了解,该词语的负面含义已经基本消失,逐渐转变为拥有超群的智力和努力,能够持续钻研某一技术领域并做出非凡发明和创造的人。极客群体广泛存在于各个技术领域,对当今的高技术产业有着广泛的影响。由于英语在科学技术交流尤其是在计算机编程等方面处于基础地位,大部分极客所使用的日常语言均为英语,其对英语语言的使用也非常独特。同时,由于互联网在当今社会交流中的作用日益突出,极客群体以互联网作为主要的集聚地,积累了大量的极客语言素材,包括传统的邮件组(如 Den of geek)、网站(如 Hack news)、博客(如 Forever geek)、最新的各类社交网站(如 Facebook)和维基百科(Wikipedia)等。另外,还有各类极客词典(如 <http://geekdictionary.computing.net/>),其除了有对常规的技术名词解析以外,还有大量独特的由极客创造的词语和表达方式。

研究不同语境下的语言现象及其发展规律是语言学的重要内容之一。网络空间是当今世界的热点话题,人们在网络空间所产生的语言呈爆发式增长趋势,吸引了相关语言学的研究兴趣。目前,学术界对网络空间相关语言现象的研究成果包括 David Crystal 等^[1-4]对线上语言学的研究、王仕勇等^[5-8]对网络流行语的研究等。这些研究解析了网络空间中的诸多语言现象,对于把握网络空间的语言规律具有重要参考价值。

然而,对网络空间^[9]中极客群体相关英语语言现象的研究尚未受到重视。我们在日常教学工作中发现,网络空间中的极客群体的语言特征,已经影响到在校大学生对英语的学习和应用,这一点在其日常的口语表达和作文中都有体现。鉴于此,本文拟对网络空间中的极客英语进行探讨,以期有助于全面理解和解析当

前网络空间中的极客英语语言现象。

一、极客英语的类型

为了获取极客英语资料,我们一方面在网络空间中借助搜索引擎等工具,搜索并访问了极客聚集的博客和一些著名极客的个人网站;另一方面,与现实中从事网络空间技术工作的、带有极客色彩的群体进行直接接触。通过研究,我们发现,极客英语的最大特点在于其用词上追求个性化,通过灵活多变的语言形式,生动、有趣又形象地表达相对晦涩的科学技术名词。根据极客英语的造词特点,我们可将其分为以下七种类型。

1. 表达强烈的个人标记或兴趣类

极客在深入研究其所专注领域的某些问题、创造出独特的技术或产品后,在命名或者交流时,往往倾向于打上个人标记或者用个人在生活中特别喜欢的事物。比如, Linux 作为当今最流行的操作系统,其名称来源于创始人 Linus Torvalds 的名字。Linux 中的“x”来源于 Unix,一种启发 Linus 开发新操作系统的经典系统。字母 x 在极客语言中应用得非常广泛,部分源于 x 是最常用的未知量符号,与极客群体所进行的科学探索具有一致性,因此格外受青睐。另外,由伊隆·马斯克创立的著名太空科技探索公司的名字也叫 SpaceX。再比如,当今全球最有影响力的科技公司苹果公司曾推出一款叫 Lisa 的电脑,对该名称的解释,苹果公司曾给出一个技术名词(local integrated systems architecture,本地集成系统架构),Lisa 虽为其首字母的缩写,但据苹果公司创始人乔布斯说,该名字来源于其女儿的名字。

2. 用隐喻挖掘词语的独特含义类

隐喻是一种常用的修辞方法,其显著的传递效果与不显著的表现形式之间存在巨大反差,接收者往往需要深入理解后才能够准确把握其含义,并收到比直接描述更好的效果。这一点与极客英语的部分特征相契合,因此在网

络空间中极客群体对隐喻的使用非常广泛。美国国家航空航天局是全球最著名的极客聚集地,在这里大量从事网络技术开发的极客经常用到的一句话“Dark side of the moon”,含义是“Waiting for a host or device to reply to pings after reload/reboot”。就这句话的含义,我们专门与从事网络空间技术开发工作多年的专家进行交流,从而得知此隐喻非常准确地传递了极客在等待反馈过程中的无比期待(reboot 或 reload 往往发生在调试或故障排除中)的心情,这种表达方式的极客特色很明显。另一个关于隐喻的例子是 Red Hat,它既是一个公司的名字,也是该公司所开发的 Linux 操作系统版本的名字。Red hat 即红帽子,在很多文化中有“自由”的含义,这与 Linux 操作系统所倡导的自由软件理念有内在的关联。因此,以 Red Hat 作隐喻来指代这种操作系统版本,与极客群体所想表达的含义具有高度的一致性。

3. 根据技术特征创造新词类

极客群体通过艰苦的研究和创新工作,在取得技术突破或者产品突破以后,倾向于使用响亮的、独特的、与众不同且能够准确达意的词汇进行描述。有大量极客在撰写的日志或者记录里曾提到为技术或产品、企业命名时经历的艰辛,比如有极客写到:因为喜欢四个字母的词汇,我曾经翻遍词典浏览全部四个字母的单词仍不满意后,编写专门软件遍历四个字母的全部组合来进行挑选。在创造新词方面的典型例子是 Googol 和 Facebook。Google 是著名的网络搜索公司,在为公司命名之始,其创始人力求用一个词表示出其能够搜寻海量网络空间数据的特性,直到发现 Googol(一个由 9 岁的前数学极客所创造的词语,含义为 10 的 100 次幂,与现实世界数据量级比,几乎可以认为是无穷大)。为了让单词的音和形更符合极客对美观的要求,最终据此创造出新词 Google。至于 Facebook,该公司创始人为了直观形象地表现出其产品和技术的功能及特色,将 face 和 book

这两个词合成一起,该词带来的视觉形象与该公司的业务非常契合,是一种典型的极客造词模式。

4. 用缩略语并追求形义的结合类

科技领域的创新非常频繁,为了记录和交流方便,极客经常使用缩略语。同一般科技缩略语不同,极客们使用的是一类特殊的缩略语,这种缩略语由其原始词组中的字母形成,并且缩略语本身又是一个英文单词。例如,SUN 是一家美国互联网技术服务公司,该公司由斯坦福大学的极客所创立,其英文全称为 Stanford University Network,而英文单词 Sun 在英语里为“太阳”的意思,恰好与该公司创立时所设的愿景和发展目标相一致,因此公司创立者就用这种带有极客色彩的缩略语来命名公司。另外,美剧《生活大爆炸》(*The Big Bang Theory*)名称的翻译也带有极客色彩。该剧在极客群体中极其受欢迎,其中文译名除了熟知的“生活大爆炸”外,还有人根据该剧中极客角色的特点采用极客思路将其译作《特别变态科学家》,而“特别变态”的首字母拼音“TBBT”正好与其英文缩写相同,这也正是极客英语现实影响力的一个体现。

5. 使用谐音和递归缩略语类

除了在含义上追求独特外,在表达和呈现形式上,极客英语还巧妙使用谐音和递归缩略语。在谐音使用上,根据发音相似性,将数字 two 当作介词 to 使用,将数字 four 当作介词 for 使用。这类谐音在网络空间英语中应用得非常广泛,最典型的例子是 P2P(peer-to-peer 即点对点通信技术),它已经被学术界所接受,成为现在最常用的语汇之一。至于递归缩略语,则是极客英语最有特色的类型之一,尽管目前不能完全确定递归缩略语这种形式是由极客创造的,但是目前网络上能够找到的递归缩略语几乎全是源自于极客圈,而且很多极客刻意将原本有明确含义的缩略语重新解释为递归缩略语,以追求新奇而形象的表达效果。递归是指

在描述或解释事物过程中又引述事物本身,常用于描述以自相似方法重复事物的过程。因此,递归缩略语在解释缩略语含义的同时,又用到了缩略语自身,这是一种极客色彩浓厚的表达方式。典型的例子如 GNU,它的全称是 GNU's Not Unix,因为 GNU 本身是一个自由操作系统,与 Unix 有关,但又不包括 Unix 中的代码,因此这个递归表达方式既独特又准确地表达了极客们的想法。另一个例子是 PHP,它的初始英文全称为 personal home page tools,即个人家庭页面工具,但是为了更准确且独特,极客们将其重新解释为 PHP: hypertext preprocessor (超文本预处理器),并将这种递归解释定为正式解释,而且从含义上看这种递归解释更为准确。

6. 用偶像或喜欢的物品直接命名类

作为崇尚创新的一类群体,极客对前辈中做出巨大贡献的人士总是心怀敬意,因此往往通过给技术或产品命名的方式来表示敬意,由此形成另一种独特的英语应用现象。前文提到的 Elon Musk 就是视近代科学家 Tesla(交流电发明者)为自己偶像,将其创造出的电动汽车品牌命名为 Tesla;网络空间领域最重要的编程语言之一 Python 的名称也是来源于该语言的创造者所喜欢的艺术作品的名字。

7. 形象化的表述或类比类

网络空间极客所创造出的技术或产品,在面向普通公众用户时,为了达到容易理解同时又比较准确的效果,极客倾向于采用直接的形象化描述或类比。这种极客英语现象的典型例子是近年来热门的云计算(cloud computing)、雾计算(fog computing)等热门科技名词。这两个技术名词的命名都非常形象,采用了大自然中人所熟知的现象,非常好地类比出了这两项技术的内在形式,因此迅速为公众所了解和接受,并广泛传播。

二、极客英语产生的根源及发展过程

根据前述对极客英语类型的描述,结合极客群体尤其是网络空间极客产生的背景、极客行业及领域特点,尤其是考虑到极客超越普通人所从事的创造性工作这一基本事实,我们认为极客英语现象产生的原因可以用心理学上的积极分裂理论中的相关原理来解释。积极分裂理论中的发展潜质原理认为,发展潜质包括三方面的要素,其中一个为特殊能力及聪明才智,人倾向于将自己的才智用于利己的目标,或是用于突出自己在组织中的位置^[10]。

对照前文所述的极客群体的才能特质及其所从事的创造性活动,以及其使用英语语言的环境特征,可以发现,极客群体在进行技术研究和产品设计开发过程中,追求两个目标:一个是让自己的创新成果尽可能地超越他人;另一个是尽可能用与众不同的独特方式描述和呈现自己的创新成果,即采用创新的语言凸显自己的卓越。作为社会中一员,极客具有一切普通人所具有的社会基本特质,而追求与众不同的语言卓越、在组织中凸显自己的话语,是极客精神的基本特征之一。因此,我们认为极客英语现象产生的根源,正是积极分裂理论中发展潜质原理在极客群体中的具体体现。

研究极客英语发展的过程,我们发现,网络空间极客英语现象的发展与信息技术的发展和网络空间影响力基本同步,呈现出显著的由点到面、由小众到大众的特征,其产生机制由随机出现走向了主动地协同创造。首先,网络空间极客英语最早产生于第一批现代信息技术专业人员中,并在本地小范围内呈现。在这个阶段,极客英语基本以技术别名等原始状态呈现,此时世界范围内的互联网尚未出现,极客英语的传播范围仅限于特定的项目组和技术群体。其次,随着互联网的出现和邮件组等具有互联能力的网络空间的发展,极客群体的交流面变大,

极客英语的扩散面和影响面逐渐扩大。而网络的便捷性使得极客群体的创造性得到进一步激发,极客英语现象的产生机制也由第一阶段的偶发产生逐渐开始转变为主动创造。最后,进入21世纪,互联网的协同创新发展使得新型互联网应用创新速度加快,网络空间与现实社会的相互关系更加紧密。尤其是,随着社交网络的出现和飞速发展,互联网的放大效应在极客英语的发展中得到了充分的体现:一方面,极客群体更加开放、主动地融入网络空间并走向前台;另一方面,便捷的实时发布机制和全面的互动响应机制,使得社会奖赏效应刺激着具有创造性的极客群体主动创造新的具有吸引力的语言,以引起人们的关注。借助社交网络这一新型媒体,以往隐匿于计算机系统之后的极客群体与普通网络用户不断互动并相互影响,于是,极客英语便在两个群体的协同创造中获得快速发展。

三、极客英语的发展趋势

在对网络空间极客英语进行研究的过程中,我们发现,随着极客群体逐渐发展并向更多领域扩散,越来越多的极客专业论坛、APP、网站等不断出现,不仅互联网上所能找到的极客英语资料按时间排序呈快速增长趋势,而且其语言形式越来越多样,具有明显的个性化特征。同时,我们也注意到,近年来随着互联网的普及和极客圈子各类社交网络应用的飞速发展,个性化的极客英语对一般英语也产生了明显的影响。在前文对极客英语的类型和产生根源进行分析的基础上,我们将从语言自身属性出发,基于社会语言学视角,对极客英语的发展趋势做一分析。

其一,极客英语具有自我发展的动力,极客有将其独特语言现象向外辐射和扩张的主观动机。社会语言学中的语言变异分支理论认为,语言表达系统中由于社会因素(阶层、种族、性别、职业、年龄等)、社会心理因素和生理因素

的差异会产生语言形式的变化^[11]。新词的产生和演变、词语含义的演变都能够使用这一理论来解释。通过前述采用积极分裂理论对极客群体的分析,我们不难发现,极客有了创造个性语言的动机以后,在具体的语言应用过程中,将会不断加强语言创造。极客在工作过程中接触到的大多是科学技术难题,往往需要持续的时间和精力投入,在此过程中其工作环境、生理和心理状态都会发生不断的变化,尤其是在巨大的技术难题考验和对结果的期待中,极客的心理变化幅度很大。这为极客语言的不断出现提供了基础。在研究过程中,我们通过与网络空间极客的直接接触发现,当创新成果出现时或者面对的难题长时间无法突破时,极客之间进行交流的愿望会格外强烈,这时候其所用语言具有很强的创新性。对于中国极客而言,尽管其日常语言大多是中文,但其在网络上的极客圈进行交流时,在使用英语过程中,同样会将自己的创新成果或者工作感受用带有极客色彩的语言描述出来,由此会直接促进极客英语的发展和繁荣。

其二,网络的便捷性及其发展的迅速性,加速了极客英语的发展和传播。社会语言学认为,不同的语言现象和不同的语言形式具有不同的辐射能力,在特定的时间或空间,有些语言的辐射力和影响力会得到加强^[12]。这种情况在现实中很常见。比如,改革开放以后,粤语对我国其他地区的影响就明显增强;而随着一些文艺作品的传播,东北话在特定场合的影响也比较广。极客群体自身的神秘色彩及其所带来极客英语的显著个性化,使其在网络空间的影响非常大,很多极客英语已经在网络空间和现实生活中得到广泛使用。以P2P为例,前文已经提及,该词从极客圈产生,逐渐为学术界所接受,成为一个广泛使用的专有技术名词。在其影响力进一步发展的过程中,人们把社会上缩短沟通距离和信息、资源交换路径,借助网络工具构建网络空间人与人之间联系的现象也泛称

为 P2P,使得这个极客英语词成为普通公众所熟知的一个热词。而 Call4Paper(征文)这种表达方式,目前在很多国际会议网站上都可以看到,其原始表达为 call for paper。另外,极客在完成一项日常工作后向圈内外征询意见时,也常用 A4C 这种表达,意思是 ask for comment(征求意见),现在也被很多人所熟知并使用。典型的例子还有 Google,其除了是搜索引擎和企业的名字外,其在日常口语交流中也可充当动词,在浏览英文新闻时候即可发现,google 被频繁当做动词“搜索”使用。

其三,在实际使用中,应当按照语言规范,在吸收极客英语积极因素的同时,避免滥用。结合前文对极客英语现象的解析,我们可以发现,极客英语具有表达简练、准确形象、生动等特点,有其积极的一面,如果在保持英语基本规则的情况下借鉴极客英语的这些特点,能够增强英语的多样性、趣味性、可读性和吸引力。同时也必须看到,极客英语追求个性的一面如果不适当加以控制,盲目模仿或者滥用,将会危害语言的规范性甚至伤害文字的可读性。比如,特殊缩略语的滥用不仅造成文字难以理解,阅读连贯性下降,而且造成文字的美观度受损。另外,将数字和字母混用的方式,从根本上讲,是违反语言规范的,应当尽可能不用或者少用。

四、结语

本文通过对极客英语的类型解析发现,极客英语的产生和发展过程与网络空间概念的形成和发展历程基本一致,而个性化和主动追求传播效果是网络空间极客英语的基本特点。网络空间这种特殊语境中的语言变异机制与极客群体特征的有机结合,是推动极客英语发展的基本动力。随着网络空间的不断发展,极客群体越来越多地由幕后的技术研发者走向前台的技术推广者,极客英语也必将伴随着这一趋势而进一步发展。同时,追求个性化是当今文化的一个基本特征,极客英语强烈的个性化色彩

也必将随着网络空间这一便捷传播渠道的发展而得到进一步凸显。但从语言的规范性和文字的可读性角度讲,极客英语中的积极因素值得吸收借鉴,同时还要适当加以控制,避免其过度使用。

参考文献:

- [1] CRYSTAL D. Internet linguistics: a student guide [M]. London: Routledge Online Press, 2011: 11-23.
- [2] NAOMI B. Always on: language in an online and mobile world [M]. Oxford England: Oxford University Press, 2008: 73-98.
- [3] NAGISA M. The language teacher's role in age of the internet [J]. Acta Linguistica Asiatica, 2011 (2): 39.
- [4] CARPENTER B E. Network geeks: how they build the internet [M]. Berlin: Springer Online Press, 2013: 66-80.
- [5] 王仕勇. 近十年来我国网络流行语研究综述 [J]. 重庆工商大学学报, 2012(5): 40.
- [6] 陈建伟. 网络流行语研究 [D]. 南宁: 广西大学, 2008.
- [7] 周晓凤, 刘鸽. 网络流行语现象的语言文化分析 [J]. 东北师范大学学报(社会科学版), 2014 (3): 66.
- [8] 庄杨. 传播语言学层面的网络流行语研究 [D]. 大连: 大连理工大学, 2010.
- [9] ELMSLIE K. Cyberspace [M]. New York: Granary Books Press, 2004: 8-12.
- [10] PIECHOWSKI M M, MILLER N B. Assessing developmental potential in gifted children: a comparison of methods [J]. Roeper Review, 1995 (3): 176.
- [11] 谷晓娟, 张迈曾. 语体变异的社会语言学研究 [J]. 外语与外语教学, 2007(6): 7.
- [12] BLOMMAERT J. The sociolinguistics of globalization [M]. Cambridge: Cambridge University Press, 2010: 98-126.



引用格式:孙亚男. 郑州航空港区公示语翻译现状及对策研究[J]. 郑州轻工业学院学报(社会科学版), 2017, 18(2): 104 - 108.

中图分类号: H315.9 文献标识码: A

DOI: 10.3969/j.issn.1009-3729.2017.02.017

文章编号: 1009-3729(2017)02-0104-05

郑州航空港区公示语翻译现状及对策研究

Study on the present situation and countermeasures of the public sign translation in Zhengzhou Airport Economy Zone

孙亚男

SUN Ya-nan

郑州科技学院 外语系, 河南 郑州 450064

摘要:公示语是一座城市文化底蕴与外在表现的综合体现。郑州航空港作为国家首个战略航空港经济发展先行区和郑州新区总体规划的重要组成部分,其公示语的英译质量,直接反映了城市的发展现状和风貌,关涉其发展前景和未来。分析所搜集的语料,发现目前郑州航空港区双语公示语主要存在普及程度较低且分布不均、一名多译、翻译错误、汉语拼音“伪”翻译等问题。政府职能部门应加强对公示语制作、建设的管理,组建专业的公示语翻译研究团队,制定统一规范的公示语翻译准则,建立开放完善的公示语修正渠道,以改善郑州航空港区公示语目前的翻译现状。

关键词:

郑州航空港区;

公示语;

“伪”翻译

收稿日期: 2016 - 12 - 29

基金项目: 郑州市社科联项目(ZSLX2016887)

作者简介: 孙亚男(1989—),女,河南省新乡市人,郑州科技学院助教,硕士,主要研究方向:英语翻译。

伴随着“一带一路”的发展,郑州作为其重要节点城市,对中国和世界的影 响越来越大;与此同时,作为国家战略航空港经济发展先行区和郑州新区总体规划的重要组成部分,郑州航空港区对外开放的窗口和基地作用越来越重要。然而目前郑州市的公示语翻译依然一片芜杂,2015年12月29日《大河报》报导了郑州火车站附近路牌现神翻译 专家:近半翻译错误^[1],更出现了将郑州的“红白花公园”翻译为 Red and Black Flower Park(红黑花公园)的错误^[2],引起了广泛关注和讨论。

国内学术界对公示语的英译研究始于1980年代,只是当时还没有“公示语”这一说法。已故地图学家曾世英先生于1987年和1989年先后发表了《我国地名的罗马字母拼写》和《关于我国地名拼音的商榷》两篇论文,称得上是国内涉及公示语英译的起始之作。由此算起,国内公示语英译研究至今已30年,并取得非常可喜的成果,2005年北京市和上海市先后成立了公共场所标识英译专家委员会。经过专家们的不懈努力,2007年《北京市公共场所双语标识英译地方标准》颁布实施,2009年长三角两省(江苏、浙江)一市(上海)《公共场所英文译写规范》也正式颁布实施。

即便如此,在公示语翻译和使用方面,我们与发达地区的差距仍然是明显的,主要表现在公示语翻译和使用的系统性、精确度与频密度上^[3]。郑州市作为中原内陆城市,其公示语英译研究主要集中在近5年,相较于北京、上海等一线城市,起步晚、发展慢,标准与规范涉及面有限,普及率也不高。鉴于此,本文拟选取郑州航空港区这一当地重点发展区域,研究目前其公示语翻译亟需解决的问题,以为当前郑州市公示语英译质量的提升提供参考,改善郑州航空港区的语言环境和人文环境,加快河南省与国际接轨的进程。

一、郑州航空港区公示语翻译存在的主要问题

本课题组对航空港区主要公共场所,包括飞机场、街道、商场、银行、酒店、医院等的公示语的英译现状进行了广泛调查。通过分析搜集的语料,我们发现目前郑州航空港区双语公示语主要存在以下几个方面的问题。

1. 普及程度较低且分布不均

目前郑州航空港区现有的双语公示语尚不能有效满足外国游客的需要,普及程度较低且分布不均。以飞机场为中心的周边地区,双语公示语虽比较完备,但不是十分完美,比如机场内的自动售票机取票使用流程就没有对应的英译,飞机场以外大部分街道、商场、酒店、医院等与人们生活密切相关的公共场所的公示语也没有对应的英译。这可能与2013年《郑州航空港经济综合实验区发展规划(2013—2025年)》刚刚获批有关,但是也不能成为理由,毕竟航空港如今的地位和重要性,需要当地政府尽快提高其公示语翻译的普及程度,为开展对外交流提供便利。

2. 一名多译

航空港区的很多公示语存在一名多译的问题,比如“郑州东站”*的翻译就有两种:Zhengzhoudong Railway Station 和 Zhengzhou East Railway Station。关于车站的翻译,我国早有约定俗成的翻译,例如“北京站”对应的英译为 Beijing Railway Station,“北京南站”英译为 Beijing South Railway Station。但是2012年9月铁道部发出通知,火车站名含“东、南、西、北”的,其英译改拼音^[4]。据此,“郑州东站”的英文则为 Zhengzhoudong Railway Station。这就导致目前车站名称的英译出现了以上两种情况。然而根据课题组的调查,参照国外车站名称的翻译,大多数人似乎更认可 Zhengzhou East Railway Sta-

* 从地理上划分,郑州东站属于郑东新区,但是由于该车站是课题组前往航空港区调查的中转站,且车站名字的翻译是课题组研究的一个重点,所以这里就把它作为一个例子来研究。目前位于航空港区的郑州南站已在筹划和建设之中,希望译名不要再出现像郑州东站这样的问题。

tion 这样的译名。

同一条路,“四港联动大道”有3种不同的翻译方式: Sigangliandong Avenue/Sigang liandong Rd./ Sigangliandong Ave. 关于路名的翻译,本课题采用目前接受度最高的“专名音译+通名意译”的方法,但是为了方便音节的拼读,我们把“四港联动”4个字从中间分开,所以“四港联动大道”应译作 Sigang Liandong Avenue,其中 Avenue 可以缩写成 Ave.。但是同一个地方,译名应该统一,或统一全写,或统一缩写。其他诸如售票厅、银行的名字、厕所的英文标识也都出现了一名多译的问题。

3. 翻译错误

调查发现,翻译错误是航空港区公示语翻译出现的又一重要问题,大致分为以下两类错误。

(1) 拼写错误、多译、漏译

在去往新郑机场的路上发现,城际高铁上“请在安全门外排队等候”的英译“Please queue outside the platform screen doors”中“please”一词最后一个字母“e”赫然不见;航空港区“兴业银行”的英译“INDUSTRIAL BANK”后面竟然有“CO. LTD”(有限公司)这样的后缀;“郑港十一街”在一个地方立的标识是 Zhenggangshiyi Street,换一个地方就变成了 No. 11 Rd,不仅翻译方式截然不同,连“郑港”二字的翻译都不见了。机场外“京港澳高速”的英译 Jinggangao Expressway,没有用分字符把“港澳”两个字的拼音给分开,很容易误读成“gan gao”。

(2) 语用与语法错误

“地铁出口处”的翻译,有的为 Area information,有的为 Export peripheral information,这不仅存在一名多译的问题,而且存在翻译错误的问题。因为“export”作动词,指的是“to sell and send goods to another country”;作名词,指的是“the selling and transporting of goods to another country”^[5],这里很明显应该选用“exit”这个表示从公共场所出来的“出口”。课题组在机场大厅内等候时发现,专用设备配电箱上“本设

备只能由专业人员操作、维护”一行字对应的英译是“This equipment can only be operated by professional personnel, maintenance”,但“操作”和“维护”为并列的动词短语,所以正确的翻译应该为“This equipment can only be operated and maintained by professional personnel”。其他的诸如“小心碰头”翻译成“attention your head”这样让人啼笑皆非的英语标识。根据公示语的国际性特点,参照英语国家的惯例,“小心碰头”的常用英语表达为“Mind your head”。

4. 汉语拼音“伪”翻译

郑州航空港区一些商场、街道、酒店等场所的公示语,乍看以为是英语翻译,仔细一看才发现是汉语拼音造成的错觉。比如,航空港区有一家专门卖河南特产的店,店门上写着“HENANTECHAN”这样全大写的汉语拼音;还有一家郑州颇有名气且较具有文化内涵的一家“76人老烩面”店,门面上并没有店名的英语翻译,但是店内对于“76人老烩面”的介绍文字中对店名却采用了“QILIUREN LAOHUIMIAN”这种全汉语拼音的方法。调查发现,汉语拼音这种“伪”翻译大多出现在一些店铺的招牌上,这让国外的游客不知所指为何。吕和发等所著《公示语翻译》一书中对招牌语用特点进行分析后,认为:招牌用语属应用文体,英译时还须以读者为本,符合英语表达习惯和思维方式,能够让外籍人士一看即懂,真正收到对外交流和宣传的效果。由于商店招牌的翻译灵活度较高,很难一概而论地制定翻译标准,而简单地字面翻译往往不易确切地表达原文用意。译名既要符合英语的文化和审美标准,又要让人过目不忘,因此从音、意两方面综合考虑,效果会比较好。^{[3]144}

二、郑州航空港区公示语翻译问题原因分析

郑州航空港区公示语翻译问题是多方面原因造成的,既有主观原因,也有客观原因。总的来看,郑州航空港区公示语翻译问题产生的原

因主要表现为以下三个方面。

1. 翻译市场混乱,公示语翻译、制作缺乏统一的管理

通过对郑州市航空港区数十家带有公示语的商店、饭店和超市进行调查,我们发现其公示语的制作均来自当地的小作坊,没有专门人员进行检查验收,而且相关部门对公示语的设立、制作及其标准也没有明确规定,完全是其自作主张,自由安排。公示语翻译、制作的随意性是造成前面列举的拼写错误、一名多译、汉语“伪”翻译的主要原因。

2. 公示语译者翻译水平偏低,缺乏职业素养

通过调查发现,郑州航空港区一些商店、饭店和超市的公示语翻译除一部分是来自网络翻译的以外,还有的是委托亲戚朋友帮忙翻译、制作的,这些人多未曾接受过或自修过公示语汉英翻译专项训练。同时,我国的外语教学中也很少涉及有关餐饮、住宿、出行等与人们生活密切相关的公示语翻译的内容,培养出来的人才不能胜任公示语翻译工作。

3. 翻译欠规范指引

我国的公示语翻译在前些年研究、引进、转换和借鉴的主要是英国和国际组织现行的公示语及其标准,近几年主要引进借鉴美国现行的公示语系统及其标准。由于西方各国公示语系统不一致,而我国公示语的翻译也一直没有统一的标准,这也是目前我国双语公示语千差万别的一个原因。另外一个原因则是受国际与国家政策的影响,比如关于地名的翻译,中国政府首次派代表团参加的1977年联合国第三届地名标准化会议,通过了中国代表团提出的采用汉语拼音方案为中国地名罗马字母的拼写规范。1978年,由国务院批准的新中国第一个地名拼写规范文件发布,文件明确规定:“用汉语拼音方案作为我国人名、地名罗马字母拼写法的统一规范”;地名之“专名部分原则上音译,用汉语拼音字母拼写;通名部分(如省、市、自治区、江、河、湖、海等)采取意译。但在专名是

单音节时,其通名部分应该视作专名的一部分,先音译,再重复意译。”^[6]1979年,联合国秘书处发布了关于采用汉语拼音的通知:从1979年6月15日起,联合国秘书处采用汉语拼音的新拼法作为中国人名、地名拉丁转写的标准。但是以上规定,在我国却发生了逐步模糊、含混,直至变脸的转化。其中最重要的原因就是各部委和地方政府发布了一系列与1978年国务院、1979年联合国秘书处通知相异的规定。

三、郑州航空港区公示语翻译优化策略

鉴于公示语的文本特点、服务对象和郑州市建设国际化都市、国际旅游目的地的需要,本课题组对郑州航空港区公示语建设的情况进行了广泛深入的调查,并且借鉴了目前经济、科技、文化等最发达的国家——美国的公示语研究成果及国内北京、上海、南京等大城市公示语英译方面取得的成绩,认为目前郑州航空港区公示语亟需做好以下四个方面建设。

1. 政府职能部门应加强对公示语制作、建设等方面的管理

公示语翻译不仅仅是单纯的译者行为,它还涉及政府的政策、管理等工作。针对目前郑州航空港区公示语普及程度低和分布不均的情况,政府及相关部门首先应加强公示语生产、制作等方面的管理,对公示语的设立、制作及其标准进行明确规定,避免公示语翻译、制作的随意性。同时,应规范公示语翻译市场,加强公示语标牌生产流程的监管,并对已经展示出来的公示语标识进行检查,避免其出现拼写不规范等错误。

2. 建立专业的公示语翻译研究团队

要建立专业的公示语翻译研究团队,对航空港区的公示语翻译现状重新进行调查和研究,对公示语中出现的错误进行修正,对未设立公示语的地方进行补充,撤销像“HENANTE-CHAN”(河南特产)、“QILIUREN LAOHUIMI-AN”(76人老烩面)这样的汉语“伪翻译”公示

语标牌,设置正确的、规范的公示语标识。这样,一方面,可以修正一名多译、拼写错误、语法错误和中式英语等问题;另一方面,可以对公示语翻译中新出现的问题进行分析、研讨,并做出应对之策。在这方面,作为一个城市软实力代表的高等学校,理应肩负起为当地培养翻译人才的重任,改变目前我国高等学校学生外语实际运用能力较差的现状。比如河南农业大学外国语学院的“找茬队”就是这方面一个非常好的代表,他们深入到郑州各大公共场所与周边旅游景区,寻找英文标识中的错误,修正后交付相关部门,一方面为我们的城市建设做出了贡献,另一方面也锻炼了学生处理实际问题的能力。

3. 确立统一规范的公示语翻译准则

专业的公示语翻译研究团队成立后,首先要做的事情就是制定一套适合航空港区建设和发展的公示语翻译准则。北京、上海等一线城市由于举办奥运会、世博会等大型国际活动的需要,早已形成一套既独具地方特色又与国际接轨的公示语翻译准则。郑州,尤其是航空港区目前发展势头良好,其公示语翻译亟需规范化、系统化和人性化,这样车站、道路、酒店、超市……的公示语翻译工作才能有章可循、有据可依。此外,统一规范的公示语翻译准则,对于解决航空港区之外的地方公示语翻译问题也具有参考和借鉴价值。

4. 建立开放完善的公示语修正渠道

城市的发展日新月异,公示语也不能是一成不变的。要使公示语建设与城市的发展保持一致,建立开放完善的公示语修正渠道是必不可少的。目前互联网快速发展,可以成立城市双语公示语纠错平台,使广大市民能够实时提出自己的意见和建议,相关部门及时作出回应,相信这样一来公共场所的公示语建设会日臻完善。

四、结语

城市形象是一座城市历史文化底蕴与外在表现的综合体现,而作为城市形象象征的双语公示语标识,直接反映了一个城市的现状和风

貌,折射出其发展前景和未来。公示语翻译不仅仅是单纯的译者行为,它还涉及政府的政策、管理等多方面的工作。因此,成立专门的公示语翻译团队,规范公示语翻译原则,加强公示语制作管理,统一公示语翻译市场,建立开放完善的公示语修正体系,是改善目前郑州航空港区公示语翻译现状的有效方法。希望政府各级部门能携起手来,努力为郑州航空港区设计出规范的公示语,使其真正地与国际接轨,以重塑郑州的城市形象。

参考文献:

- [1] 大河报. 郑州火车站附近路牌现神翻译 专家:近半翻译错误[EB/OL]. (2015-12-29) [2016-12-28]. http://newspaper.dahe.cn/dhb/html/2015-12/29/content_1349714.htm?div=-1.
- [2] 大河报. 公园名字翻译错误被小学生指出[EB/OL]. (2012-10-16) [2016-12-28]. http://newspaper.dahe.cn/dhb/html/2012-10/16/content_795416.htm?div=-1.
- [3] 吕和发,蒋璐等. 公示语翻译[M]. 北京:外文出版社,2011.
- [4] 人民网. 铁道部:火车站名含“东、南、西、北”英译改拼音[EB/OL]. (2012-09-18) [2016-12-28]. <http://js.people.com.cn/html/2012/09/18/161085.html>.
- [5] HORNBY A S. Oxford advanced learner's English-Chinese dictionary [M]. 6th ed. Oxford: The Commercial Press & Oxford University Press, 2004:600.
- [6] 国家语言文字工作委员会政策法规室. 国家语言文字政策法规汇编[M]. 北京:语文出版社, 1996:23.
- [7] 卞建华. 传承与超越:功能主义翻译目的论研究[M]. 北京: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2006:82.
- [8] Christiane Nord. Translating as a purposeful activity: functionalist approaches explained [M]. Shanghai: Shanghai Foreign Language Education Press, 2001:54.